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会刊 2018 年总第 8 期

The IFF Magazine www.iff.org.cn

IFF | **15th**
2003-2018
ANNIVERSARY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15届全球年会 (F20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18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特刊
MEETING COLLECTION

新全球化：未来之路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5 届全球年会以“新全球化：未来之路”为主题，汇聚各方之力，共同打造全球金融领域 F20 峰会，探讨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寻求化解危机、合作发展之道。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15届全球年会 (F20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18 ANNUAL MEETING

关于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是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 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 G20 国家和地区、新兴经济体, 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及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 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 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Finance 20)”。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从创立至今, 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 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共计 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 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历届年会和相关活动, 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好作用, 取得了广泛国际影响。

宗旨

自 2003 年创立以来,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 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 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 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 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 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实现以下目标:

1. 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 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 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本特刊稿件主要来源于 IFF 第 15 届全球年会, 部分文章未经本人审核, 特此说明。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会刊
2018 年总第 8 期
www.iff.org.cn

主办单位 / Host
国际金融论坛 (IFF)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大会主席 / Chair
周小川 ZHOU Xiaochuan

联合主席 / Co-chair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陆克文 Kevin Rudd
赫尔曼·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巴罗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理事会 / IFF Board of Directors
周小川 韩升洙 肖卡特·阿齐兹 赫尔曼·范龙佩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ZHOU Xiaochuan, Han Seung-soo, Shaukat Aziz,
Herman Van Rompuy,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让·克洛德·特里谢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Jean-Claude Trichet, Edmond Alphandéry, Domenico Siniscalco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周汉民 祝宪 林建海 梁锦松 梁维特 洛朗·法比尤斯
Sultan Bin Nasser Al Suwaidi, ZHOU Hanmin, ZHU Xian, LIN Jianhai,
Antony Leung, Leong Vai Tac, Laurent Fabius
珍妮·希普利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埃内斯托·塞迪略
Jenny Shipley,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Ernesto Zedillo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 吉耶尔莫·奥尔特兹·布莱恩·佩斯科 戴青丽 李纪珠
Mehmet Simsek, Guillermo Ortiz, Bryan Pascoe, Deborah Lehr
Dr. Jih-Chu Lee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安雅山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 钮小鹏 方风雷 李梅
Alessandro Golombiewski Teixeira, Yasser Elnaggar
James Rothschild, Rick Niu, FANG Fenglei, LI Mei
史蒂芬·格罗夫 张红军 弗兰克·里斯伯曼 李彤
Stephen P. Groff, ZHANG Hongjun, Frank Rijsberma, LI Tong

编委会 / Editorial Board
张继中 祝宪 林建海
ZHANG Jizhong, ZHU Xian, LIN Jianhai
宋敏 聂庆平
SONG Min, NIE Qingping

编辑部 / Editorial Department
庄珏 申钢 吴立新
Joanna Zhuang, SHEN Gang, WU Lixin

地址 / Address
广州市南沙区明珠开发大厦 22 楼
F22, Pearl Development Building, Hengli Town,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邮编 / Post Code 100095
Email / info@iff.org.cn
www.iff.org.cn

版权声明 / COPYRIGHT STATEMENT
本刊内容由国际金融论坛 (IFF) 独家拥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或摘抄。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an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IFF, and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excerpted
without permission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5 届全球年会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广州南沙举行。本届全球年会以“新全球化: 未来之路”为主题, 邀请国际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 200 余人汇聚一堂, 深入探讨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积极寻求化解危机、合作发展之道。

2018 年, 国际贸易争端加剧, 国际金融竞争激烈, 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风险凸显, 世界经济增长及全球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特别是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努力受到广泛关注与赞许。

在此关键时间节点上,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迎来了成立 15 周年志庆。作为创立于中国, 由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其领导人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外交及战略智库平台,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与全球 200 多位财经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和合作伙伴关系。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继续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实践创新、研究智库和人才培养五大平台功能, 积极促进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

我们特别出版本期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5 届全球年会 (F20 峰会) 特刊, 以共享智慧与真知灼见。



张继中
CEO / 创始秘书长
执行委员会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新全球化：未来之路
New Globalisation: A Path to the Fu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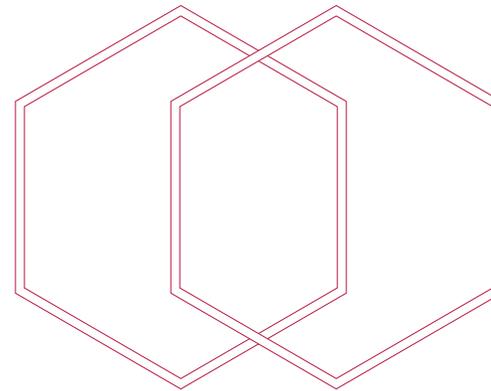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Global Finance 20 (F20)
Finance serves the world

国际金融论坛(IFF)
全球金融F20 · 金融服务世界

战略对话 · 交流合作 · 金融创新 · 全球智库 · 金融人才
Dialogue · Co-operation · Innovation · Think tank · Training





目录 CONTENTS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5 届全球年会以“新全球化：未来之路”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财经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领导人分析研判经济形势，共同探讨应对之道。



P8 / 大会开幕致辞

- 马兴瑞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 拉加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
- 周小川 IFF 主席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P12 / 大会主旨演讲：新全球化——新时代、新格局、新未来

- 巴罗佐 IFF 联合主席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
葡萄牙前总理
- 韩升洙 IFF 联合主席
韩国前总理
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 阿齐兹 IFF 联合主席
巴基斯坦前总理
- 阿罗约 IFF 理事
菲律宾前总统
- 郑之杰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P23 / IFF 政策对话 (1) 全球贸易问题探索

- 贸易保护主义
- 全球供应链冲击
- 全球贸易、投资和服务协定

P31 / IFF 政策对话 (2) 全球金融问题探索

- 全球金融开放、稳定与合作
- 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
- 新兴市场货币冲击



P41 / IFF 政策对话 (3) 下一次金融危机何时到来

- 全球金融危机 10 周年反思
- 对经济增长前景和金融市场的预判

P48 / IFF 政策对话 (4) 技术创新与全球发展

- 从中美竞争、AI、芯片等谈起
- 创新与制度环境
- 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制高点

P54 / IFF 圆桌会议 海上丝路金融合作：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P64 / IFF 峰会 (1)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专题峰会

-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 中国金融开放 40 周年
- 中国模式与经验：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影响

P76 / IFF 峰会 (2) 2018 年丝路国际联盟大会

- “一带一路”5 周年：回顾与展望
- “一带一路”5 周年：新阶段、新机制
-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市场合作

P90 / IFF 峰会 (3) 全球金融科技峰会

- 数字货币 / 区块链 / 大数据 / AI：未来发展与创新
- 数字经济治理：平台治理、数据隐私
- 金融科技与金融制度变革



P101 / IFF 峰会 (4) 环绿色绿色发展峰会

- IFF 绿色发展中心推介及成果发布
- 绿色发展：金融助力绿色低碳创新

P117 / 广州南沙开发区 (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 推介会

- 南沙营商环境推介
- 携手共创大湾区未来：南沙与港澳金融合作展望

P125 / 中朝经济合作对话会

- 中朝经济合作机遇
- 朝鲜自贸区和中国经济
- 朝鲜经济展望与发展机遇

IFF 落户广州必将为广东乃至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带来重要机遇

■ 马兴瑞 /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我们非常高兴的与各位嘉宾朋友相聚在广州，共同迎来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5 届全球年会的隆重开幕。

在此受李希书记的委托，我谨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本届年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出席年会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习近平主席对经济金融工作高度重视，强调要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国际金融论坛（IFF）作为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的全球性金融年度高峰论坛，日益受到国际金融界和社会各方的关注，IFF 永久会址落户广州必将为广东乃至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及发展带来重要的机遇。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东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地源优势，积极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勇于先行先试，大胆实践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7 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了 8.99 万亿元，连续 29 年居全国首位，五年年均增长 7.9%。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6229 亿元增加到 1.13 万亿元，成为全国首个超万亿元的省份。进出口总额连续五年超 6.8 万亿元，出口占全国比重达 27.5%。与此同时，广东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建设国内第一条民间金融街，设立全国第一家民营银行及互联网银行，成立国内首家外资控股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国内首个跨境金融指数等，全省金融业增加值、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境内上市公司保费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多项主要金融指标连续居全国首位。截至 2017 年底，全省金融业总资产达到了 25.8 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 6850 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7.6%，目前金融业已成为广东重要支柱产业。广东实体经济的稳健增长与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注入密不可分，金融业为广东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民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进一步巩固了广东经济大省的地位。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个场合，习近平主席



马兴瑞

多次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明确提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习近平主席对广东一直高度重视，寄予厚望。

今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亲临广东视察指导，对广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强调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利的举措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广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把广东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特别是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历史性机遇，认真落实中央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海内外企业在广东发展，创造更多的商机，提供更好的服务。

IFF 第 15 届全球年会以“新全球化：未来之路”为主题，就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未来如何发展，进行深入系统地研讨，既顺应时代潮流，也符合各方期待。诚挚希望大家借助 IFF 平台加强交流研讨，提出更多促进经济金融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举措，为推动全球共同繁荣做出新贡献。

大会开幕致辞

- | | |
|--|----|
| IFF 落户广州必将为广东乃至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带来重要机遇
马兴瑞，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 9 |
| 祝贺国际金融论坛（IFF）迎来 15 周年志庆
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 10 |
| 以“新全球化：未来之路”为年会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小川，IFF 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 11 |

祝贺国际金融论坛 (IFF) 迎来 15 周年志庆

■ 拉加德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



拉加德

我很高兴参加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5 届全球年会。我的发言虽然很简短,但我想在此对 IFF 取得的两项巨大成就表示热烈祝贺。

首先,祝贺国际金融论坛 (IFF) 迎来 15 周年志庆。在过去 15 年中, IFF 践行使命,

为国际社会深入探讨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化解危机、寻求合作发展之道提供了平台。

今年年会的主题——“新全球化:未来之路”恰合时宜,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质疑,让全球经济受到了严重威胁。

我相信,本届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年会定会成为下一个 15 年的里程碑,继续展现 IFF 的智库领导力。预祝大会一切顺利!

在过去 15 年中, IFF 践行使命, 为国际社会深入探讨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以及如何化解危机、寻求合作发展之道提供了平台。

其次,我祝贺周小川阁下,继陆克文先生之后,担任国际金融论坛 (IFF) 大会主席。同样,也祝贺陆克文先生结束任期。我的老朋友周小川行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5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行长。在任职期间,他成功调整了货币政策,有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保持了良好发展。

在周小川主席,以及其他新任理事成员的领导下, IFF 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为世界经济金融领袖提供宝贵的对话平台,为全球经济增长与稳定政策提供支持。

以“新全球化:未来之路”为年会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周小川 / IFF 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周小川

今年举办的是国际金融论坛 (IFF) 15 周年的特别年会。大家知道, IFF 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过去 15 年中, 200 多位历届成员参与 IFF 创立、关心其发展和支持其成长,许多国际政要和财经官员出席了 IFF 组织的年会和领袖对话会,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此,我谨代表国际金融论坛 (IFF) 对他们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期盼今后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 IFF 这个平台,广交朋友、广泛交流、深入探讨全球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共同寻求合作发展之路。

过去的一年,对国际金融论坛 (IFF) 而言,是成果丰硕的一年: IFF 筹备完成了新一届大会主席和理事会换届;与丝路国际联盟 (SRIA) 一起,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一带一路”倡议 5 周年调查报告;继续联合英国《中央银行》杂志发布了品牌报告——《2018 IFF 中国报告》;先后举办了“全球气候行动峰会——气候投融资论坛”和巴厘岛会议等等。2019 年,我们将充分利用国际金融论坛的平台作用,进一步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办好品牌会议,

发好品牌报告,同时不断拓展、创新,努力朝着将论坛打造成全球 F20 (Finance 20) 这个目标迈进。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长期关注国际经济、金融热点问题。过去曾经围绕全球金融改革、全球债务风险、世界增长新动能、绿色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主题举办了年会,获得多方面关注和高度评价。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遭受重大挑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风险挑战加剧。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今年年会的主题设定为“新全球化:未来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各位嘉宾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国际贸易体制和机制、创新与全球化发展、改革开放等议题等进行深入研讨,贡献智慧,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为全国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2012 年 12 月和 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广东考察,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地方,宣示把中国改革开放继续向前推进的决心,强调要“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并希望广东继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

当前,广东迎来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相信,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广东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2017 年,国际金融论坛 (IFF) 决定将南方总部和永久会址设在广州,并与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IFF 秋季年会,一方面是受到广东“敢为人先”精神的感染,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尽一份力。

旧体制渐失权威，新机制尚未建立的特殊历史阶段，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

■ 巴罗佐 / IFF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巴罗佐

抬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 20 世纪 30 年代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也曾出现保护主义，可以说全球性危机总会有保护主义随之蔓延。但是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因为 G20 首脑峰会阻止了保护主义蔓延的历史重演，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领袖们携手合作阻止了保护主义抬头，并维护了全球金融的稳定性。2009 年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也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 G20 机制并不完美，但愿意分享、愿意合作交流，这可能是 G20 最宝贵的资源。每年 G20 峰会，世界各地的首脑和财经领导们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不是为了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本着务实合作的精神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欧盟当年与中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央行，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中国为世界金融做贡献的努力和诚意。今天，我们仍然有 G20 的精神吗？还有当初精诚合作的意愿吗？我个人认为并没有。G20 应该是一个畅所欲言的智囊团，应该可以非常坦率地讨论。我认为如今不仅在欧洲，在其他地方都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本土优越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使世界各地的贸易摩擦频发。

这绝对是一个严峻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需要一个机制框架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甚至双边主义。当年世界贸易组织部分成员并没有接受全球贸易协议，所以多哈回合谈判多次停滞。多边主义框架就是一个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是参与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是各方都能尊重和执行的一套治理框架。世贸组织缺乏一个确实能化解矛盾

的诉讼机制，所以我们需要加强世贸组织这类全球治理

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对于中国很重要，对全球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从欧洲的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都希望中国能继续改革开放，尤其希望金融部门能对境外企业进一步开放，能搭建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确定性。

我们身处的时代非常特殊，全球化，因其规模、强度与速度，给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就是很好的例证。2008 年，爆发了缘起于美国雷曼兄弟破产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时，我任欧盟理事会主席，我和好友——当时的法国总统力促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召开 G20 峰会，自此 G20 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级会议。G20 峰会每年都会召开，它的重要性远超 G8，因为 G20 相较 G8 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也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我参与了 G20 初创时期的所有会议，直到 2014 年我离职之后才没有参加。我认为 G20 在抵抗保护主义

大会主旨演讲： 新全球化—新时代、新格局、新未来

旧体制渐失权威，新机制尚未建立的特殊历史阶段，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

巴罗佐，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13

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找到应对去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韩升洙，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15

全球化建立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新常态，也带来了一系列新变革

阿齐兹，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17

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中国的历史作用

阿罗约，IFF 理事、菲律宾前总统

19

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郑之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21



框架。我们不仅要在国际层面，也要在国家层面加强多边主义理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去解决，有些问题也需要在国家层面解决。比如说依法治国，或者说法治建设，比如说全球层面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当然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社会上不可避免竞争。关键是竞争发生在有规则、有秩序的环境中，还是发生在无序冲突的环境中。所有坚信开放原则的人们，都应该争取建立一个稳定的具有规则的竞争环境，即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下进行竞争。

因此我认为应该支持联合国，应该支持世贸组织，支持所有多边的机构，当然也要促进互联互通，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让世界能连接得更加紧密。我相信这是大势所趋。此时此刻，全球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过去的一些机制已经失灵，而新的框架、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因而会产生一些疑问，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一些未知数，这是很自然的。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我认为没有一个是明确、稳定、可预见的一套规则。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和投资界更多的疑心，进而会带来更多的增长风险。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到底要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具有规则的环境里，还是要生活在一个狭窄、封闭的环境里。我的立场是支持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在

未来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坚持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对于中国很重要，对全球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从欧洲的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都希望中国能继续改革开放，尤其希望金融部门能对境外企业进一步开放，能搭建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确定性。目前有两股力量——流动性和摩擦的对立，在贸易、投资、政府间的合作产生投资流、贸易流；摩擦则减少贸易、投资、政府间的交流。目前世界面对很多挑战，包括气候变化、金融稳定、生物科学、流行病、反恐等等，这些都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挑战。这些挑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就可以解决的，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只有全球齐心协力，才能战胜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找到 应对去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 韩升洙 /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在 19 世纪末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国家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使经济、商业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当然，全球化不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

计划经济理论的丧失，使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理念崛起，就是说资本、货物和人员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在不同国家之间，这已经成为 20 世纪的一个主流理念。我认为这种理念其实是非意识形态的，是比较倾向市场的。

一战前，世界秩序基本是没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包括俄罗斯帝国在内的大部分大国，当年基本上都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当年的世界体系也算是比较相互依赖的。二战后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功带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乌拉圭回合谈判要求发展中国家改善其贸易相关的机制和政策，虽然发展中国家对于乌拉

圭回合谈判的最终成果有所失望，但是在谈判期间他们进一步放低了其制造品的关税，加强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取消了农业以及其他部门的一些补贴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 (GATT) 等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在二战后出现的国际机构一直是国际合作和谈判的重要平台，在管理经济竞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一体化，欧盟为世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 1956 年西欧六国进行《罗马条约》谈判，到 1962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再到 1993 年欧盟的诞生；从 199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带来了欧洲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一体化，再到 1999 年欧元诞生实现了欧洲货币政策一体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使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地在欧洲流动，欧洲境内的国界因而越来越没有意义。

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和非经济的一体化都可以带来客观的好处，亚洲的南部、中部和北美以及非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已相继开始。为了更好地学习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东盟于 1967 年成立并积极探索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南美和北美也有很好的区域一体化的例子。在亚太地区 1989 年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我当年作为韩国的贸易部长是 APEC 的发起人之一。

当然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互联网和电子通讯使资本市场快速全球化，数码技术变革不仅创造了新的互联网空间，更让世界变成“地球村”，让亿万人都能够通过手机跨越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边界，让人类有了一个无国界的世界。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提升了全人类的生活水准，也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了更多挑战。比如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在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国内是不均衡的。还有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也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凸显，



有些人开始怀疑全球化的益处。全球化极大地影响国家之间的互动，影响联合国的议程，比如少数族群、老人和儿童都受到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影响，再比如说环保、扶贫以及恐怖主义也深受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比如，2001 年的 911 事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我们体系当中的漏洞，国际恐怖主义者很容易到那些破产的国家找到历险和藏身的地方，而要在全球范围采取防控措施战胜恐怖主义是相当不容易的。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日益不平衡，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分裂。全球化在极大提高全球经济效益的同时未能使之均等化，但不能因此将全球化带来的益处一笔勾销，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和关注那些欠发达和落后国家的福祉。

不幸的是，近几年来全球化在倒退，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去全球化的思潮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比如英国脱欧、世贸组织不能有效运作以及很多新的贸易协定胎死腹中。去全球化过程进行的时间越长带来的损害就会越多，所以希望世界各国领导能拿出智慧和勇气共同扭转这个倒退的进程。如果世界在他们的号召下采取一致行动，相信不仅他们自己的国家，全世界都能够获益。现在全球化倒退不只表现在贸易领域，还有其他领域和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领域以及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逃

税等等问题。现在积极的一面是，已经有不少国际合作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比如 2015 年 9 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计划，这样一个新的联合国议程把全球发展转向可持续性。现在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机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失业、全球卫生问题以及日益增多的自然灾害、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灾难。现在全球自然资源面临枯竭，而环境的恶化包括沙漠化、干旱、土地质量下降、缺水、生物多样性降低等。除此之外，气候变化是人类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它导致全球升温、海平面升高以及极端天气，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有幸的是 2015 年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通过了《巴黎气候协定》，确定了温控目标，即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C 以内，努力控制在 1.5°C 以内。要实现这一全球温控目标，需要新的多边主义，需要更多国际合作。随着信息和通讯科技的发展，世界将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进行联系与合作，衷心希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能够给人类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局面。

全球化建立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新常态，也带来了一系列新变革

■ 阿齐兹 / 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阿齐兹

全球化给世界不管是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都带来了重大的变革性的影响，而且涟漪式的作用非常广泛。全球化带动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开放，为全球脱贫带来了新机遇。全球化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地缘经济的新常态，让我们不断看到全球事物的新变革，给世界地缘政治局带来了巨大变化。

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变化也越来越快，冷战结束之后，诞生了新的全球秩序。我们所熟悉的全球秩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迅建改变，其中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化使世界形成了新的权利平衡。亚洲在几千年前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通过丝绸之路将财富和文明传递给世界，亚洲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现在又处在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节点，在不久的将来——大概十年之后，中国很可能将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与此同时，因为人口和经济力量的发展，亚洲也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促进人类平衡发展和经济繁荣重要推动力。我认为一个多极的世界要比单极的世界好，产生新的世界强国是一件好事，当然，有些人从中看到的不是机会，而是风险。有些国家不希望一个新的强国崛起，

害怕其会对原来的强国产生威胁，也许 200 年前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现在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世界经过全球化，传统的边界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意义了，因为你几乎可以随时在任何地方获得从世界其他地方传送过来的东西。

要繁荣、要发展就要拥抱全球化的机遇，因为全球化能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创新动力，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各个国家之间不应争抢更强的影响力，而是应该更多的互相依存，合作才能共赢。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政策幻想，其实现在很多大国已经在努力实现。我觉得 21 世纪有潜力实现从战略竞争向全球合作的转变，与此同时，应该把这种思维变成人类 DNA 的一部分。国家之间要相互联系、依存、合作，就要鼓励贸易、投资和人员交往。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互相之间的信任度，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才能够帮助化解问题。和平应该始终是人类最核心的追求，当然，各国国内具体的目标可能是一样的，但我们应通过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来实现我们各自的目标，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一带一路”的倡议是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巴基斯坦从“一带一路”当中获益良多，现在已经有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在巴基斯坦落地。“一带一路”推动了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巴两国之间的联系。在我任巴基斯坦总理时，我就认识到中巴两国之间的关系是最坚韧、最长久的，是由和平和谐、互相尊重和共同利益所推动的，而且两国的合作关系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是纯粹的双边关系。

亚洲和世界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全球未来的增长点在哪里？全球实现更高自动化的时候，就业情况将怎样？不断发展演进的人工智能将如何融入我们的社会？我认为科技变革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发展的机遇。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增强社会的流动性、完善市场，能改变传统的交易方式。第二，互联互通的世界能够消除更多障碍和隔阂，能够促进合作，提供更好的解决争议的机会，避免争议发展成冲突。全球化让我们能



够感受到世界另一个角落所发生事情带来的影响。第三，科技发展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能够带来更透明的治理。最后科技的进步给我们带来知识和力量。比如我们人手一个的手机，它的智能化已经让其成为我们的一个百科全书、一个工作介绍人、一个银行……它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而且会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我们带来方便和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会导致一些就业岗位的失去，而这正是政府应该想办法去应对的。我认为科技变革是一个创造者，而不是一个毁灭者，它不是来毁灭工作岗位的，而是来创造工作岗位的，因为随着那些低技能岗位的失去，一些高技能工作岗位被创造了出来。我们需要教育孩子学习如何创新、如何具备创新思维。我认为机器如何智能化也还不能够替代人类的头脑。

全球化也应该是更加民主化，互联网以及新的商业模式会给我们带来新机遇，可以让我们获取更多资源，让我们比以往更加包容。比如，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开公司，而且从自己的电脑上就可以操作。现在跨境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互联网还可以让所有消费者和小企业获取以前只有大企业才能获取的资讯。

我认为亚洲的未来可期，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区域能有亚洲在人口方面的强大潜力，这是亚洲活力的源泉。很多亚洲国家人口结构很年轻，有很高的劳动力潜能，这代表着机遇与挑战。比如说就业、基础设施开发、教育等必须跟进时代、跟进年轻人的需求。应该进一步提升生活标准和平均工资，同时加强财富合理分配，

这样才能够使所有人都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商贸需要改革，我们的价值观也需要改变，政府和民间社会都各自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够保证世界的和平和包容性，所有的宗教都需要有包容性，必须加强相互了解，要避免偏见和宗教冲突，更要警惕极端主义的出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移民，中东冲突其实就是大批移民带来的难民危机。我们首先应怀有一颗慈善之心来面对移民问题，既不应建立高墙杜绝其他国家游客和移民进入，也应谨慎对待移民以减小安全风险。

现在一些大国出现了不和谐的情况，欧洲面临民粹主义的挑战，英国脱欧将抑制经济增长并带来不确定性。建立互联互通，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共同合作，才能够保有和平。虽然出现政治的不同声音，但这些阻碍不可能彻底阻止我们的合作。我们需要关注对话和合作，要找到共同利益的领域以寻求合作，比如气候变化、减贫、人权保护等领域。要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必须注重教育，投资年轻人就是为未来投资，当前的很多学校课程并不能使年轻人学习到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政府、NGO 组织、企业都在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建立更完善的全球贸易合作架构，才能更好应对当前的挑战、满足新经济的需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在建立新架构的同时，当前的一些体系，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需要改革。

全球化的进程 以及中国的历史作用

■ 阿罗约 / IFF 理事、菲律宾前总统



阿罗约

全球化的讨论、研究和分析非常深入和广泛，一位历史学家说全球化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中国的汉代。现代意义上全球化的第一个分水岭应该是二战，1944 年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自此全球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金融秩序，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美国的经济体系也成为了西方最主流的模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同时，还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关贸总协定。之后就是冷战时期，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冲突，反映了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差异。

“全球化”这个词第一次进入字典应该是 1961 年，但在之后的 30 年并没有经常使用。1978 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1984 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当前世界是开放的，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就是闭关自守。1989 年柏林墙倒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表明西方世界在冷战

中取得了胜利。西方体系，尤其是其经济体系逐步成为全球的主流经济模式。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十年，全球化进入高峰，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们都经历了全球化的高峰期，并且在各自领域比如政府、多边机构、学界或者是商界参与其中，每个人都体验了全球化的进程。

菲律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也就是全球化的高潮期，履行所做的承诺，降低了关税。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 2001 年的 911 事件，对菲律宾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财政、外交、贸易都受到了削弱。现在菲律宾需要加强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增加关税鼓励自己的制造业。所以菲律宾采取的政策就是放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就是进入了拉弗曲线的最低标准。我当然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但我也知道，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处于经济政治社会变革的同一个角度和状态，所以全球化这个概念可能有时候要适应当前的现实，而每一个国家当前的现实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国家必须要自己决定如何应对全球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化。菲律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定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去提高生产力。他又说，中国不能闭关锁国，不能孤立发展，要与全球一起融合。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

寻找不同的方式使其包容性，以便中小企业受益其中。1978 年到 2018 年这 40 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 40 年，也是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 40 年，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后的将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来到中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应该如何

解释过去 40 年，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呢？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定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去提高生产力。他又说，中国不能闭



关锁国，不能孤立发展，要与全球一起融合。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霍普金斯曾经用分析法和西方的起源预判过全球化，但是 21 世纪的全球化并不是西方的模式。

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反全球化和反开放的情绪兴起，尤其以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民族主义抬头为代表。这是一个短暂的趋势，还是正在开始的大趋势？一些悲观主义者说经济全球化已经结束了，但是习近平主席重申中国要继续开放反对保护主义，而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迫使中国支持区域经济合作，RCEP 可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集团。乐观的分析认为，新型的全球化将更加包容，而且不会由西方一方主导，这不是异想天开。看看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一带一路”，可以理解为全球化进阶版。有一位知名教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提出，全球化不仅是投资基础设施，它更多是像 RCEP 这样的区域性协议，相当于一种软件可以让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繁荣起来。但是除了软件之外我们也需要硬件，这正好是“一带一路”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一带一路”会为我们提供国际贸易和投资繁荣不可或缺的实体基础设施。麦肯锡咨询机构曾经说，全球化并不是在退出，而是在数字化，在这个新型的全球化里面，腾讯、阿里巴巴已经跻身全世界估值最高的大公司行列，这并不应该出乎我们意料，因为中国是科技创新的肥沃土壤。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快

速发展和经济现代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它只需要一个宏伟的愿景，明确坚定地政治意愿以及开放和负责的国际关系。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并愿意与其合作伙伴共同争取发展和增长。相信这么一个开明的态度可以让中国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能够为未来的新型全球化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开辟一条顺畅的道路。

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 郑之杰 /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郑之杰

当前，经济全球化大潮不断向前，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资本、商品、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客观要求。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也要看到现在的全球化与以往的全球化有很大不同，已经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

从经济增长看，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动能不足，需求不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目前，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从贸易体系看，以 WTO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冲击，贸易争端加剧，全球贸易体系受到巨大的挑战。从产业布局看，产业分工不断调整变化，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国际竞争与合作关系呈现新的态势。从金融市场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更加明显，大规模资本流动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拖累长期的经济增长。

从治理体系看，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增长的比重达到 40% 左右。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前进，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和曲折，只有加强开放合作，共

同应对风险挑战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为建设开放的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从积极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从学习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到加入 WTO，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扩大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滞。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130 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2017 年人均 GDP 超过了 8800 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并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30% 以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中国将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个重要的转型关口如何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认为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切实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水平，面对深层次的矛盾和发展的瓶颈，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二是继续走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子，在经济低成本优势逐步下降的条件下，要进一步提升科技研发能力，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资本投入转变为依靠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三是切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尊重市场规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市场的失灵和降低试错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四是逐步缩小收入上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加大对乡村脱贫和振兴中西部的支持力度，



补齐民生的短板。五是鼓励金融多元化发展，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完善金融生态，建立多元化金融发展的合作体系，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已经并将继续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中国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多年来国开行服务国家战略，大力支持“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服务社会民生、生态科技环保等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力量。与此同时，国开行大力开拓国际合作业务，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发起设立上合组织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银联体、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联体、中非金融合作银联体，为推动多边金融合作、促进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化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面向未来，国开行将继续开发金融银行的优势和作用，打造国际一流的开发国际金融机构，助力国际金融机构高质量的发展和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在国内继续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紧扣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化、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在国际上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以市场化方式支持“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增进沿线国家的民生福祉，助力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化开展与全球各金融机构的合作，凝聚合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可持续且风险可控的金融支持。

IFF 政策对话 (1)

- | | |
|---|----|
| 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是与世界共赢
周汉民，IFF 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 24 |
| 《中国制造 2025》和中美贸易争端
尼古拉斯·霍普，IFF 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 26 |
| 支持区域双边合作的同时，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叶辅靖，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 27 |
| 华南美国商会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
哈利·赛亚丁，华南美国商会会长 | 28 |
| 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以及企业从中国搬迁的风险
邢自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 29 |

中国努力融入世界， 是与世界共赢

■ 周汉民 / IFF 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

最近一年，在美国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国非常后悔当年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此言谬矣，说得很不完整。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的 23 个创始缔约国之一，中国用 15 年零 5 个月的努力从“复关”（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入世”（加入 WTO），终于在 2001 年 12 月 11 日完成“复关”和“入世”的任务（1995 年 WTO 取代关贸总协定，中国的“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这 15 年零 5 个月是中国努力融入世界的艰难岁月。唯其艰难，值得珍惜。

中国有一个热词叫做“与国际接轨”，我认为“与国际接轨”就是向国际惯例靠拢，向国际规则看齐。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时至今日没有一个规则、没有一个惯例是中国人创设的。但是，中国在努力地接近、靠拢、遵循、参照，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努力中，中国一步一

步走向强盛。

1978 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206 亿美元，在世界的占比为 0.8%，连 1% 都没到。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加入 WTO 之际，外贸进出口总额已经上升到 5000 亿美元。2017 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出口 5050 亿美元，从美国贸易进口 1300 亿美元，连续第四年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融入世界，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世界经济每年的贡献率都超过 30%。

在中国 15 年零 5 个月的“入世”谈判中，最艰难的谈判是与美国的谈判，也是时间拖得最冗长的谈判。美国完全知道中国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要求，同时符合美国最苛刻的“入世”条件。美国是同意中国入世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规则的中文翻译叫“协商一致”，因此这是美国的一个国际承诺。有人说美国今天要反悔，甚至有人说要把中国从 WTO 驱逐出去，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狂妄了。我认识制定 WTO 规则的一位大使詹杰森教授，我对他的贡献始终表示最高的敬意，他如今已经作古了。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阶段，我曾在他门下研读 WTO 的有关规则，我的

我认为“与国际接轨”就是向国际惯例靠拢，向国际规则看齐。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时至今日没有一个规则、没有一个惯例是中国人创设的。但是，中国在努力地接近、靠拢、遵循、参照，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努力中，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强盛。

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得到过他的指导，至今难以忘怀。WTO 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制定的，今天弃之不用不仅是可惜，也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于中国而言，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穷期，融入世界，永远是一个进程。

世界银行每年发布一次的《营商环境报告》极具权威性，它连续跟踪全球 190 个经济体，对其营商环境做出评价、排名和提示。中国连续两年在该报告的排名中名列第 78 位。在世界银行 2018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最新一期《营商环境报告》排名中，中国向前“跳跃”了 32 位，名列第 46 位，首次进入前 50 名。而且 2018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明确列出了世界上最努力改善营商环境的 10 个国家，中国位列其一，但没有美国。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说中国做得有多好，只是想说明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将义无反顾、一直前进。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努力，及其对人类社会发进步贡献有目共睹。道可道非常道，什么是道？道就是世界潮流。中国一定会选择顺潮流前进。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中国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6 天时间达成协议合同额 587.3 亿美元。这是首届，今后将继续办下去，年年办，而且会越办越好。我以为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中国和世界相比较的不足；它又是一把尺子，让我们领悟如何为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断地拓展外贸进口。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旨演讲中谈到，未来 15 年中国进口货物贸易总额要达到 30 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要达到 10 万亿美元。这两个数据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及过，中国提及就是一个承诺。

我用三句话总结今天的发言：

第一句话，中国改革开放是自觉、自主、自为的选择。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第二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深化，对世界改革的呼声会积极听取。比如全球化。对一些弊端也要革除，

比如世贸组织 (WTO) 需要与时俱进进行改革，中国会积极参与。

第三句话，美中两国分别为世界第一、第二经济体，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太平洋两岸最重要的国家，对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所以，中美两国应当携起手来，共同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中国制造 2025》 和中美贸易争端

■ 尼古拉斯·霍普 / IFF 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尼古拉斯·霍普

目前的世界五大贸易国是中、美、德、韩、日。第一，中国贸易出口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急剧增长；第二，虽然 G20 保证要保护国际贸易，不让其受保护主义的影响，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 10 年，世界五大贸易国的贸易额普遍出现明显倒退，只有中国超过了 2008 年以前的水平，日本、韩国持平，美国下降了很多。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后，当时世界上很多企业都想搬到中国进行生产制造，2005 年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亚洲其他国家都要大，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加在一起和美国差不多。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是东亚的顺差，也就是说全球各地的半成品很多都是在中国加工后，再销售到经合组织 OECD 国家，尤其是美国。

全球过去 30 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商业活动自由化和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一直希望建立他主导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中国本来应该同样受益，但美国政府却觉得这样对美国是不公平的，所以现在美国不打算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而是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特朗普政府要抛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又要推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还要撤出对 WTO 的支持。习近平主席一再重申中国要继续开放，我们通过在上海召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及东盟峰会和 APEC 会议，可以看出中国开放的决心和诚意。

作为外界的观察家，我们觉得现在很难解决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美国对中国有这样的质疑：首先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其次美国觉得中国操纵货币；再次就是认为中国市场不够开放，不管是货物、服务还是投资，对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企业有很多限制；最后美国很担心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总之，美国认为美中之间的投资规则是不对称的。还有《中国制造 2025》规划的目的是什么，这也是美国担心的。特朗普政府下手很重的贸易政策我觉得很不合理，而且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我现在最担忧的是，哪怕中国大幅度降低了贸易顺差，美国仍不满意，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放弃或者大幅度改变《中国制造 2025》。中国不可能因为怕冒犯美国而放弃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对于实现《中国制造 2025》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现在还不太确定，可以确定的是，要想通过谈判进一步扩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或者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都不太可能。中国现在说要扩大开放，当然恐怕不包括美国公司，因为美国的外资委员会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来审批中国的投资。现在可能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企业，在美国不能获得投资批准。

我认为应支持世界贸易组织 (WTO)，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WTO 成员，有什么争议中国总是向 WTO 提起仲裁。以前有一个最惠国待遇，现在更多是追求自贸区的开放或者区域性的多边自贸协定，另外还有允许市场来确定人民币的汇率，这个中国政府已经在做了。中国可以与非美国的供应方签订供应合同，在更多的美国以外的地区采购。中国应继续接受外资，因为有些领域以前做的承诺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金融、能源、通讯等等领域。最后中国还要试图跟欧洲谈双边自贸协定。与此同时，中国也把对欧洲在贸易方面的让步适用于美国，这样对美国来说是积极的，也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

支持区域双边合作的同时，坚决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

■ 叶辅靖 /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叶辅靖

我要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对改革要有紧迫感、危机感。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为核心的多边体制真的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切有志之士都应该维护这个体制。第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出了退出 WTO 的威胁，而且已经退出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所以美国要退出 WTO 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能仅仅理解为讹诈或者其他目的。第二，美国要价非常高，很多方面已经触及了中国制度红线，是中国无法接受的。第三，美国在双边和多边协定，包括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方面的对等开放，以及对发展的重新定位、技术转让等方面也对美国回包围，使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第二个观点是，中美有必要加强合作，也有可能加强合作。从中国角度来说，第一，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多边体制，不中他人圈套。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融入世界体系，这是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第三，吸取苏联前车之鉴，不能另起炉灶，不能把这个世界人为碎片化、人为脱钩。第四，要坚持合作的理念，虽然有很多 WTO 的改革措施对中国要价太高，有些甚至触及了中国的底线，但有些符合改革方向的东西，我们应该有选择性地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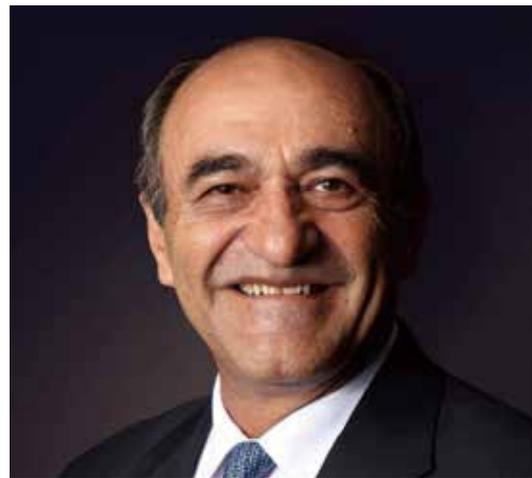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也有合作的必要。第一，美国在欧洲都离不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第二，很多全球性问题要应对、解决，离不开中国的配合和支持。第三，美国盟友包括美国自身并不都是支持去全球化、碎片化、脱钩论的。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WTO 改革应该公平合理，要把握两个平衡。一是不能只对发展中国家提改革要求，而发达国家自己不改革。既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转让政策、国有企业、市场转入、对外开放、发展对等地位等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问题、监管政策问题、滥用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大量补贴扭曲市场竞争问题以及大量非关税壁垒、滥用贸易救济等问题。二是权利义务平衡问题。比如，不能只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要求知识产权保护、要求不能强制进行技术转让，当然我们也没有强制进行技术转让，但是也不要忘记 WTO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就是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发达国家不能闭口不谈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不能只谈同一种产品、同一种关税而不谈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有义务要求在关税减让方面有差别化待遇，这都是 WTO 的基本规则。总之，我的第三个观点就是：改革应该公平合理，要保持两个平衡。

第四个观点是，双边的自贸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是现有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主渠道的重要补充。第一，双边的自贸体系有很多议题，我们是回避不了的，包括现在新的自贸协定，很多东西背后贯穿着多边体制改革需要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第二，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应坚持对发达国家的开放，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是中国开放的重点。中国有一句成语是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什么是目，发达国家是纲，其他国家是目。我认为要积极支持区域双边合作，同时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华南美国商会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

■ 哈利·赛亚丁 /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



哈利·赛亚丁

我想讲两项华南美国商会做的研究。

第一，现在很多美国人觉得 90% 的美国工作岗位好像都被中国抢走了，老百姓当中甚至有人觉得中国正在伤害美国经济，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消费的很大一部分用在购买中国商品上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美联储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 GDP 的 70% 是消费，消费中只有一小部分约 17% 流入了中国。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所做的一项研究，美国的 GDP 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消费，二是政府支出，三是商界的支出，四是进出口贸易差额。贸易逆差就是一段时间内，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总量超过了向国外出口的商品总量。2017 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 3750 亿美元。听起来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但其实只占美国 GDP 的不到 2% 而已。

所以，问题来了，美国到底要争什么？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有些人认为是知识产权之争。而知识产权专家普遍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做得足够了，问题主要在执法方面。而在知识产权案件的执法实践中，中美知识产权纠纷所占比例很少，99%

的知识产权纠纷实际上都发生在中国人之间。因为中国经济是创新型经济，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当然对于外国科技的保护也非常重要，中美在这方面是可以合作的，只有合作，才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

华南美国商会的公司有 2000 多家。2018 年 11 月，我们商会在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企业所受的损失要大于中国企业。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财富、路透社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中美贸易战不仅影响了中美两国企业，还影响了其他国家的企业。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物流、供应链、营商环境、投资、人员流动、运输以及技术创新等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香港大学一位学者对中国投资政策的研究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比较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数据。中国 GDP 的 30% 是外资企业带来的。外资企业比较集中的上海，其 67% 的工业产值、9% 的高科技产出、30% 的就业岗位都是外资企业贡献的。新疆也有 50% 的就业岗位来自外资企业。辩证地看，一方面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也给外资企业提供了盈利和发展空间，这是市场经济的选择，是双赢互利的。

总之，中美贸易战不但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 以及企业从中国搬迁的风险

■ 邢自强 /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

最近一段时间，我与 31 位做经济和战略分析的同事合作，通过样本调查、案例分析、大数据以及国别比较等方式（包括涵盖 75 家跨国企业、133 位行业专家的调查问卷），研究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对全球产业链产生的冲击，以及一些跨国企业从中国搬迁的风险。得出如下结论：

目前来讲，全球观察者也好，市场也罢，可能都低估了供应链冲击对经济、对企业盈利及营商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的影响。全球产业链现在的分工复杂程度比一二十年前提高很多，而且供应链搬迁耗时长、难度高、成本大。我们的国别研究分析发现，目前还缺乏合适的经济体去承接现有的在华产业链。

为什么我说产业链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被低估了？第一，产业链受到关税和贸易摩擦的冲击很难评估。第二，最近一段时间，产业链冲击还是一个新话题，企业界还没有大规模公开讨论。第三，很多企业包括一些政策观

察者还对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得到缓解抱有一定期望。我们觉得全球产业链的弹性非常不足，如果大部分跨国企业面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关税加强，不去改变其生产布局，将会对其经济和企业造成很大影响。

我们根据全球的投入产出表，以及上游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投入产出表来计算，随着关税的激烈程度不等，会对经济造成 0.1% 到 0.4% 的拖累。比如，一旦美国对华所有产品都征收 25% 的关税，将对美国 GDP 产生 0.1% ~ 0.5% 的影响，对中国 GDP 的影响是 0.2% ~ 0.7%，这是宏观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还做了两个具体案例分析：一个来自美国零售行业，另一个来自欧洲电子元器件行业，发现产业链关税的冲击不可低估。

过去 10 年，因为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在内的中国生产成本不断提升，有不少中低端产业搬到了东南亚。中国则开始走上一条更高附加值升级的道路。美国目前有约 30% 的著名服装品牌仍然在中国生产制造，10 年前这一比例约为 39%，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企业开始在东南亚建厂，但是美国中高端服装品牌还是来自中国大陆。而且这种情况很难做出及时调整，把订单放到东南亚地区避免关税。我们的测算表明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比较困窘，想转嫁给消费者也艰难，因为历史上美国的服装价格只跌不涨。2018 年美元有一定升值，这部分缓解了关税对美国企业的影响，但是如果美国明年加息步伐放缓，美元贬值，对美国企业就是雪上加霜。美国大型服装装饰品零售商的利润率可能会由于关税的影响下滑 1.6%。

全球工业设备、电子元器件市场规避关税影响也很困难。表面上看，中国制造的工业制成品只占全球份额的 10%，但是全球工业制成品的很多元器件、零部件来自于中国。以 PCB 线路板为例，全球 50% 的 PCB 是中国制造，而电脑、打印机、洗衣

如果大部分跨国企业面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关税加强，不去改变其生产布局，将会对其经济和企业造成很大影响。



机以及医疗设备都离不开 PCB。很多欧美跨国企业发出预警：因为关税问题，已经面临元器件短缺，但又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替代中国供给 PCB。我们估算美国标普 500 指数上市公司明年的净收入，可能由于关税摩擦下降 1.5% 左右。

从长期来讲，跨国企业是否会从中国搬走，改变产业链布局？从中国劳动力供给、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市场规模的大小等各个角度讲，在中国的产业链都有很大优势。如果将产业链迁移，那么搬到哪个国家能与中国旗鼓相当？第一，中国约占全球制造业出口份额的 18%，相当于除中国和日本以外的整个亚洲总份额。虽然近些年中国人口有老龄化趋势，但是中国高技术的劳动力充足，比如过去 5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达 3400 万，相当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三个国家大学生数量的总和。所以搬到中国周边经济体，将面临高技术劳动力有限的困境，况且中国周边经济体劳动力价格也在上涨。当然，中国周边国家目前劳动力价格每小时不到 4 美金，比起一些发达国家还是便宜很多。第二，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广东珠三角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在深圳周边，从研发到设计再到商业化，零部件方圆 10 公里可以完成，如果搬到其他国家要从零开始，这也是很大的障碍。第三，中国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具有研发能力。一些欧美企业，比如生产电子元器件和电力设备的相关企业，像 ABB、通用电子、西门子、霍里威尔企

业等，为什么在中国布局？主要是中国的研发能力比较强。2017 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国际专利申请第二大国家，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广东，可见广东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比较强。第四，中国本地消费市场巨大。ABB 企业 90% 的产能在中国，其产品的大部分又销售到了中国市场。我们预计到 2030 年中国的消费市场大概会上升到 12 万亿美元，这将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生产产业链搬到别的国家，产品再运回中国市场，物流成本又会增加。

我们认为短期内，产业链很难从中国搬走。但是如果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关税增长持续 5 到 10 年，甚至包括其他方面的摩擦，很多企业经过计算以后，搬走的风险就会很大，而这将影响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世界高技术水平跨国企业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有必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提升对于全球产业链和高技术外资的吸引力。第一，加大开放的力度；第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第三，减税降费；第四，落实国企的竞争中性原则和产业政策的所有制中性原则。对内支持民营企业，恢复其信心，对外缓解对中国模式的质疑和不解。比如在政府采购、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税率监管等方面，对国企、外企、民企应一视同仁，这样既能增强外企、民企的信心，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IFF 政策对话 (2)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10 年来，世界金融领域发生的五大变化	32
李扬，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为新的经济全球化注入动力	34
祝宪，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需在政策和国家层面进行合作和沟通	36
Javier Guzman Calafell，墨西哥中央银行副行长	
与全球金融开放、稳定与合作相关的货币问题	37
陈志英，广州市常务副市长	
全球政策、意识形态、经济增长预期以及技术进步分化带来的挑战	39
万喆，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10 年来， 世界金融领域发生的五大变化

■ 李扬 / 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10 年来世界金融领域主要发生了五个变化。

第一，全球金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有了普遍改善。因为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可以说商业银行承担了大部分损失，很多大型商业银行因此倒闭。后来很多商业银行，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商业银行被国有化了，经过 10 年的发展，商业银行普遍都有所改善。这是金融结构发生改变的一个方面。

2. 资本市场筹资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比较显著。正如第 1 点所讲的，因为金融危机导致银行相对收缩、重整资产负债表、处理不良资产，这时候资本市场异军突起，各国资本市场在本国筹资额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当然中国是一个例外。

3. 影子银行持续发展。在金融危机之初，很多人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影子银行的无序发展。各国货币金融

当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或多或少采取了相应措施，有一些国家还出台了法律、法规，规范影子银行的发展。但是影子银行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低迷发展之后，现在又逐渐蓬勃发展起来。中国的影子银行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我们曾出版一本书叫《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详细阐释了在中国影子银行主要是银行的影子。但是我要指出，影子银行其实代表金融界的发展方向，只是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没有受到严格监管，发展得有些过度了，现在全球影子银行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4. 市场集中度普遍上升。金融危机过后，头部银行和头部保险公司在业内所占比重全部上升，这主要因为金融危机的优胜劣汰作用，毕竟能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风暴的，当然是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并且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小的金融机构承受不住压力，经过金融系统并购重组，结果就是集中度上升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只是这几个因素影响比较突出。

第二，全球真实利率持续走低。

金融最重要的变量是利率，真实利率就是扣除通货膨胀的利率。从 2004 年开始，全球真实利率从 5% 左右开始往下走，有一段时间甚至是负的。如果再往前追溯，当时全球真实利率下降得很快，这是实体经济因素，反

映的是资本收益率下降。如果我们把问题归结到资本收益率下降，说明全球还在危机中，还没有一种创新能够全面提高劳动生产力，把我们

从危机的泥坑中带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正是因为有这个情况，现在货币政策出现了很多难以理解的情况，比如欧洲的负利率以及民营企业的利率，真实利率很低，这是几十年来很少遇到的现象。

第三，通货膨胀走低。

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通货膨胀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反通胀。最近几十年来

如果物价长期走低，不利于企业发展、不利于创业也不利于投资。这与真实利率放在一块讲，我们会看到全球可能进入长期的低迷时期。



通胀率一直较低，细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段：1995 年到 2004 年的去通货膨胀时期和 2004 年之后的通货紧缩时期。从宏观上讲，如果物价长期走低，不利于企业发展、不利于创业也不利于投资。这与真实利率放在一块讲，我们会看到全球经济可能进入长期的低迷时期。

第四，国际收支格局发生了变化。

各国政府说的经济失衡，指的是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差额很大。失衡不仅包括赤字，还包括盈余，无论是赤字还是盈余都是失衡。金融危机 10 年后，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规模在不断缩小。与此同时，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失衡在不断扩大，也就是资本流动即借钱、投资，尤其是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非常显著。所以今后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国际收支格局，金融因素很可能变得比实体经济因素更重要，甚至可能出现金融周期主宰整个经济周期的局面。现在我们讨论经济危机，是传统型生产过剩的危机，还是金融危机，还是说两种因素都有，而其中金融因素越来越重？我们倾向于后者，如果是这样，以后宏观政策就要重新调整。

第五，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利率不断增加。货币政策要恢复常态，原来利率为零，Q1 是不正常的，要恢复正常，利率就不断增加。美联储主

席预计 2019 年美联储还要再加几次息，加息后美元走强，国际资本就会剧烈流动，新兴市场国家就可能出现货币贬值危机。另一方面，就是在数量方面。金融危机过程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两倍，主要购买市场上有问题的机构或有问题的资产。现在危机已经基本过去，于是要把过去特殊时期购买的权益和资产卖掉。如果这类事情持续发生，在美国的市场上就会出现卖出的领域经济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其他领域相对来说获得优势。因为该领域中的债券甚至权益，是全世界投资者资产组合中很重要的资产，因此也可以通过资产组合的变化对全国投资者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进而对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作为国家最高的金融智库，这些年来我们跟踪全球金融变化，看到了很多过去没有见到的事情，全部的意义现在还没有分析出来，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变了，我们必须跟上这些变化。现在在做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必须用一种变化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很多过去的教条甚至写到教科书中的东西，有可能已经过时，我们必须根据新的实践制定新的政策。

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为新的经济全球化注入动力

■ 祝宪 / 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祝宪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退,贫富分化在加剧,金融市场出现波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在抬头。许多国家仍在为走上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不断探索和试错。由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政治经济体制各异,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在借鉴、模仿、试验中,探索真正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

不幸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而言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元周期脆弱性。2018 年 4 月以来,随着美元指数超预期上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相继出现金融动荡,资产价格大幅度调整。10 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源在于债务杠杆过高、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等等,金融危机 10 年后的今天,虽然许多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债务杠杆方面,全球债务已于 2018 年 1 季度攀升

至 250 万亿左右的新高位;在金融机构领域,美国五大银行控制的金融资产达到 47%,1% 规模最大的基金管理着 45% 的资产;在影子银行方面,保守估计规模为 45 万亿美元,控制着全球大约 13% 的金融资产,远高于 2010 年的 28 万亿美元。

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一方面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由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主导者和维护者,转变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坚持和突出美国优先双边原则,给全球经济带来越来越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科技创新,特别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等种种影响,全球价值链在流程和架构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迁移和重构,由此引发全球金融投资贸易结构和产业链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全球化动力已在减退,急需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注入新的经济全球化动力。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北之间,价值链上下游之间,以及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各层面的分配不均衡,也都亟待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得以逐步解决。

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希望通过发展解决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难题,包括贫困、收入分配不均衡等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8 年 11 月 18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坚持规则导向完善全球治理。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体系是一个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导向并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国际多边金融体系并不完美,还存在许多弊端,应该予以改革。

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希望通过发展解决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难题,包括贫困、收入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在开发金融的角度上,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则集中在宏观政策和公共治理领域,在其影响和压力下,许多多边开发机构经常会偏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但是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必须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许多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也认识到,在当今的全球化过程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多边金融体系应该进行深度改革,但如何改,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弊端,不断提出批评,并要求增加在这些机构中的话语权,然而至今仍缺乏具有理论深度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改革方案。与此同时,不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受不同发展阶段、收入水平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很难再与发达国家拧成一股绳。很多人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并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全球金融前景尚不明朗的时候,国际多元开发金融机构在引导基础设施投资、帮助成员国进行逆周期调整、稳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等方面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2015 年到 2016 年,在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领域,成立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两家新机构——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这一新兴事物抱有很大期望。在全球基础融资需求巨大的情况下,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本着开放、包容、共赢理念,与现有多边机构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

探讨开展包括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联合融资等在内的多种业务模式,共同提升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融资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同时在今后的岁月里,也可以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发挥自己的作用。

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需在政策和国家层面进行合作和沟通

■ Javier Guzman Calafell / 墨西哥中央银行副行长



Javier Guzman Calafell

2018 年 4 月以来，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在增加，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原因很多，既有新兴经济体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原因，比如说美国加息、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冲突、中美贸易战的波及、市场指数的下降、油价下降等等。从内因看，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国内金融紧缩。

美国低速前进的经济政策持续推行，全球经济都会紧缩。还有其他什么影响因素呢？比如货币政策、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以及市场形势。在很多经济体中，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市场形势，比如中美贸易战将会影响到全球市场形势。很多情况下，外部冲击和自身的脆弱性都会让新兴经济体受到影响。全球利率非常低，而且持续了较长的时间，由此产生的问题和其他情况融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当然，利率上涨速度太快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会产生市场骚动，影响市场情绪。

还需要强调一点，全球金融体系近几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首先市场流动性细化进一步加剧，这个细分市场在有一些阶段没有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流动性，跟其他的情况综合考虑下，流动性在下降。流动性太低，也有可能造成全球金融局势的动荡。更多外资进入新兴

经济体债券市场，这会产生什么问题？合理推测，外部投资可能会加剧经济振荡，进而推动不稳定的局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全球金融情况将决定国内金融估值的 40% ~ 60%。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将对新兴经济体产生的影响，要更加注意。新兴经济体必须做好准备去应对外部风险，那么国内的政策还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当地或者区域的市场动荡，没有政策的监管肯定不行。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都有相似性，主要是它们的经济支柱不是特别稳定，所以更容易遭受金融风险的影响。投资者在不同经济体中必须要有投资差异策略，政府则要有政策差异管理。在新兴经济体中，有一种传染效应，即有一个经济体遇到麻烦，可能会传染给其他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因为存在一些相关联的因素，比如说外汇回归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问题会互相传染，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不强。我们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国内经济政策非常重要，是可以帮助新兴经济体跨过风险的。但是，如果相信新兴经济体能够自己战胜风险和挑战，这是很天真也很不公平的想法。我们必须清晰地表达出我们支持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立场，我们必须集合所有的智慧，也就是团结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一起在源头寻求解决方案。经济危机的源头是什么？我认为与高新精技术相关联的，所以新兴经济体需要得到发达经济体的帮助。

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确实会影响整个拉美经济体。所以在国家层面上，必须出台应对政策，才能抵御风险的挑战。发达经济体的关注点应该在哪里？我强调三个关注点，一是需要进行货币政策的沟通，以避免动荡的产生。二是发达经济体要考虑溢出效果的反向作用。三是新兴经济体应提供安全的金融环境，有了安全的环境，可以保证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安全发展。总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必须在政策层面、国家层面进行合作和沟通。

与全球金融开放、稳定与合作相关的货币问题

■ 陈志英 / 广州市常务副市长



陈志英

一、关于全球金融开放、稳定与合作

2018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近年来，中国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田，一直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加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着力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提升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广州的区位优势明显，“一带一路”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国家级战略叠加实施。2017 年广州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998.76 亿元，同比增长 8.6%，占全市 GDP 的 9.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益快速提升，广州地区的银行机构 2017 年末贷款余额 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06%，在北上广深和天津五大城市中排名第一，其中中长期贷款约占六成。广州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成功举办了财富全球论坛、中美金融研讨会等一系列国际金融活动。2018 年 9 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广州进入了

全球金融中心 20 强行列，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面对新时代、新起点、新机遇，广州将充分运用“一带一路”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广东自贸区建设等政策的叠加优势，谋划广州金融国际化，推动将广州建设成为向世界展示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金融思想的窗口和示范区。下阶段广州将研究并制定加强国际合作，建设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中心行动方案，推动落实广州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金融开放水平的若干措施，积极利用外资，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境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促进更多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加强与港澳台、世界湾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等境内外主要国家和城市的沟通对话。建立国际湾区联盟等交流平台以及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并积极举办有世界影响国际会议和高端论坛项目，构建多层次国际会议体系，不断扩大国际金融的朋友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

二、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化和新兴市场货币冲击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陆续推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复苏，比如美国推出了数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欧洲推出长期再融资、全面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央行实施大规模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等等。

随着经济复苏态势较为稳固，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扭曲资源配置、提升资产价值、威胁货币政策独立性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成本日益显现，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先后收紧货币政策，特别是美联储连续加息，逐步推动货币政策化进程。加上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经济增速较快的亚太地区，货币政策稳中趋紧；在拉美地区和中东、东欧、非洲等受大宗商品市场影响较大的地区，货币政策则还仍然保持宽松。但目前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持续低迷，仍为宽松货币政策保留一定空间，同时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短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利率下行空间受限，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对货币政策的实施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启动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步伐不宜过快，应为未来货币政策预留更多空间。



2018 年 4 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 “中国仍将实施审慎货币政策, 我们没有任何量化宽松、零利率政策。现在主要央行都在收紧利率, 开始退出扩张, 也会进行缩表。我们期待这样的政策发生已经有很长时间, 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他同时提到: “虽然我们有基准利率作为一个指导, 但是在未来, 借款和存款利率也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

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是在可控范围内。2018 年 9 月,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8 年第三季度例会, 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 要松紧适度, 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引导货币信贷以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按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 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相适应,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推动形成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

广州作为国家金融中心城市, 推动金融系统以习近平主席视察广东精神为指导, 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加大产融对接, 资本市场服务, 解决货币传导机制不畅,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促进资金流向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 促进实体经济融资可得性提高,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 推动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同时, 把握好监管政策实施力度和节奏, 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 有效促进重点领域的风险, 加强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 打造金融安全港, 维护地方金融的稳定。

全球政策、意识形态、经济增长预期 以及技术进步分化带来的挑战

■ 万喆 /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万喆

2018 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除了全球金融危机 10 周年之外, 也是分化加剧的一年。我认为 2018 年预示出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分化上:

第一, 全球政策的分化。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进入加息通道, 这一轮加息已经加了十次, 接下来可能会继续, 但是其他国家的加息步伐并没能跟得上, 所以货币政策的分化是很明显的。包括发达经济体, 比如日本、欧元区。据说日元不会进一步加大刺激, 宽松货币政策不会结束; 欧元区多次表示可能会结束宽松货币政策, 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另外, 即使是美国国内也同样发生着货币政策收紧, 特朗普就对美联储有诸多怨言。在中国也能发现类似情况, 先是加杠杆后来又去杠杆, 不断出现异向分化, 需要重新找到一个稳杠杆平衡点。政策的分化表现为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落实发生着分化。至少这两年来, 美国经济的发展或复苏势头表现良好, 但是其他经济体尤其新兴经济体面临很多风波, 这些风波会不会继续集聚起来演化为更大的困难? 从历史的走势中看到, 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之后一两年内, 往往伴随地区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当然不能说它们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但是一定有较强的

影响。这一次究竟会怎样? 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另外, 政策的理论基础或者政策架构, 也在发生变化, 包括通货膨胀率。在泛金融化市场情况下, 使用过去的政策工具、政策理论分析金融框架, 会发生一定的偏差。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政策分化使全球经济、金融系统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二, 全球意识形态的分化。

各种意识形态的崛起, 加剧着地区乃至全球的冲突。所谓的意识形态, 包括新冷战言论, 以及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内部的各种族群撕裂和阶层冲突。很多政治学的学者用“身份政治”的崛起解释目前美国阶层撕裂的现象。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背后肯定有很强的经济背景或者很深的金融影响。比如,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政策明显偏向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但是我们不能孤立看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特朗普能作为一匹黑马当选美国总统, 其实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结果。

2008 年左右的时候, 美国人已经深深感觉到经济繁荣带给大家的满足感和获得感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贫富分化在加剧。虽然大家普遍变得更富裕了, 但是富裕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当时奥巴马也是以黑马姿态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 他提出的口号是“我们需要变革”, 八年执政是不是做到了他承诺的以及当时选民们期许的变革呢? 并没有。特朗普提倡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赢得了共和党过去不能赢得的中下层选民——铁锈带和农民的支持。实际上美国的“身份政治”问题背后还隐藏着比较大的由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 也就是说近 10 年经济复苏解决了金融危机的重新清算、重新复原问题, 但是并没有解决结构性的根本问题, 可以说只是止血, 没有去疮, 疮痛还会发生。

第三, 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期产生了分化。

特朗普总统说他上台后, 美国的经济非常好, 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化。是不是新的危机在酝酿? 美国经济繁荣或全球经济复苏是不是到头了? 最近原油价格继续大跌, 一个月前很多人说, 石油



价格可能会上涨，现在看来却是背道而驰，跌幅已超过 30%。在石油价格问题上，可以看到所谓的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包括伊朗、沙特等中东问题。美国汽油和柴油的消费数据呈收缩状态，汽油消费量从 2018 年 2 季度开始已经转为负增长，柴油消费量的增幅也在不断降低。

因此，石油价格的下降不只是产油端即供应方面的问题，因为美国、俄罗斯、沙特等主要产油国现在的产量都超过了 1100 万桶；更多是需求端的问题，因为跌的不只是油价，还有美股，以及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的下调。所以，油价下跌是全球经济走向虚弱、疲软的一个表现。如果这个拐点真的在现在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出现，会是非常大的挑战。

第四，技术进步带来的分化。

前段时间，我参加达沃斯的一个会议，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银行业非常重要，但是银行都不行了。也就是说银行业发展尚好，但是银行遇到了很大困难；商业还很繁荣，但是商场遇到了很大问题。或者说也可以说，市场化仍然在不断向前迈进，但是传统的市场在消失。因为技术革命带来的去中心化，导致商业或者金融的分散效应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大数据使流动性的速度比过去要快很多，所以头部效应也很明显，我们会在同一个市场中看到头部效应和分散效应同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金融或者商业系统，都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因为头部效应产生一些巨头，甚至产生新的商业帝国，也就是越大越不能倒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厉害；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

使得越大就倒得越快，因为任何一个转弯处没有跟上，就轰然倒下了。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不只是金融系统，经济整体的治理上，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在金融方面，我们说金融科技的产生，比如 AI 的产生，会不会使一些人失业？可能在就业上，一部分领域减少就业岗位，另一部分又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但是对治理水平产生很大挑战。从一种淘汰的职业迅速转换到另一种社会需求的职业，是非常高的挑战。监管也受到很大挑战，我们想想是银行出现得早，还是社区出现得早？当然是社区出现得早。银行的建立取决于人与人之间交互关系和消费习惯的建立，但是现在新科技使社会关系场景、背景和交互关系等发生了变化，因此传统行业尤其是过去非常好的行业需要转型。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 2018 年分化的一年里，全球的政商企各行各业的领导、专家、学者，一直在考虑未来全球的结构改革，我想应该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改革和重建。在全球的协调机制上，也将面临结构性改革的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框架范式在不断崩塌中，金融领域也是一样，未来的结构性调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现在全球包括中美之间是结构性转型的较量，谁能先完成这个结构性转型，就能更好地平衡好繁荣和公平的关系，更好地在全球化和泛金融化的潮流中找出一条新路径，我想这是赢得下一场挑战的关键。

IFF 政策对话 (3)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42
韩升洙,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四大危害	44
朱光耀, 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优化国际金融治理	45
阿什法克·哈桑·汗, 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阿联酋中央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应对及反思	46
苏瓦迪, IFF 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行长	
1997、2008 两次金融危机起因及应对策略的分析与对比	47
宋敏, 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 经验和教训

■ 韩升洙 /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我今天要重点讲一讲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的四个经验教训。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任韩国总理，当时韩国为了应对危机提出“绿色增长”倡议，获得了世界环保组织的赞扬。2009 年第四季度，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里唯一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在 2008 年小布什即将卸任，奥巴马总统马上就任的过渡期间，两位美国总统与世界其他首脑共同创建二十国集团 (G20)，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最重

要的多边平台。当年，能亲眼见证世界那么多国家的领导人团结合作，共渡难关，令我印象深刻。真心希望未来如果再次遇到危机，还能够重新找到这种合作的精神。

接下来讲讲我们应该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当年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G20 的创建，是在全球经济陷入至暗时

刻，全球决策者们出的奇招。他们通过 G20 这个平台，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协调与务实、有效的合作。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们齐心协力协调了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比如说量化宽松和央行的负利率。这些大胆的决策帮助世界经济避免一次大规模的崩溃，但是它们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我们现在仍在处理这些后遗症。通过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我们可以吸取四个经验教训。

第一，社会凝聚力是经济调整的关键。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而深，而经济复苏相较而言要慢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缓慢的经济复苏和加剧的不平等，导致了一系列民粹主义运动，包括英国脱欧、反移民危机、贸易摩擦等等。那些最穷困、最弱勢的群体需要得到额外关注和保护，以避免他们因为短期的财政政策或结构性改革而受到伤害，因为一个会加剧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或者改革措施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普遍有一个知识缺

陷就是不懂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连接。在金融危机之前，决策者们一般都会重视通货膨胀，却没有关注金融周期。金融危机之后，决策者们开始更多关注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连接。其中也有一些取舍，尤其是在货币政策方面，比如信用量增长过快

的经济体可能会放宽货币政策来缩小产出缺口，而这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稳定风险。

第三，需要更准确的评估。

财政政策的空间和金融危机之前不一样，我们现在把财政政策当做一个反周期性的政策工具，正好和货币政策是互补的。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需要一个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而深，而经济复苏相较而言要慢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缓慢的经济复苏和加剧的不平等，导致了一系列民粹主义运动，包括脱欧、反移民危机、贸易摩擦等等。



全球财政体制政策、前所未有的低利率，使得我们质疑债务对 GDP 的比例是不是应该是中期债务可持续性的最重要考量。决策者们也开始质疑，一个政府到底能不能减少税率的同时保护市场准入和债务的可持续性。他们采用一个新方法，有针对性地投资和扩大需求供应的总量，在一些情况下是好的。所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能够实现良好的协调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宽松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一个万能药，它也离不开足够的财政空间，那就是在平常的非危机的时候，我们要保持比较温和、稳定的财政政策，给自己留出一些缓冲的余地。

第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过程中，结构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研究发现，在短期内结构性改革的效率高低不齐。

总体而言，财政市场改革比如说优化竞争政策，能够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不一定会在整个经济周期内，都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果。那么反过来看，劳动市场的改革，确实是取决于总体的经济条件，比如说降低失业红利，或者放宽就业保护措施，让就业和裁员更加灵活，会在经济景气的时候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走低。

在吸取了全球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我们如何展望未来呢？在经历了 10 年比较缓慢的经济增

长之后，2017 年全球经济终于表现出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全面复苏的迹象。不过，我们仍然面临经济增长的风险，包括金融市场波动、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以及更高的石油价格。决策者们应该采取行动以提高应对短期和中期风险的能力。多边合作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者们应制定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政策，同时加强财政缓冲空间，经济结构性改革要注意提升生产力和平等性。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 四大危害

■ 朱光耀 / 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朱光耀

我们现在面对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挑战，是多年未见的、非常强烈的，其危害在 2018 年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我认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危害。

第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危害着多年来形成的全球供应链。

经过二战以来 70 多年的努力，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产业链逐渐稳定下来。但是近期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冲击着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作，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而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到了 3.9% 和 3.7%。

第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危害着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是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因此，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冲击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 WTO 面临停摆。WTO 的上诉法庭最少需要有 3 名法官才能正常运作，而目前只剩的 3 名法官中有 2 名 2019 年 10 月就要到期。由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干预，WTO 迟迟不能填补上诉法庭法官的空缺，

WTO 因而面临停摆的危险。所以，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着严重威胁，甚至可以说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

第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危害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全球化。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威胁着全球化，影响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群体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例如留学签证拒签率增高、文化和学术交流减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各国人员往来、文化和学术交流的减少，意味着未来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衰减。

第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危害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促进世界可持续、平衡、包容发展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 (G20) 一直坚持的努力方向。但是现在只强调一个国家利益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对多边主义形成严峻挑战，并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018 年对全球所有国家来讲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年，因为这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自由贸易原则与贸易保护主义直接交锋的一年。我真诚希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特别是希望以 WTO 为核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系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

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优化国际金融治理

■ 阿什法克·哈桑·汗 / 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阿什法克·哈桑·汗

二战以来美国快速发展，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是具垄断性的庞大经济体。二战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等关键的国际金融机构。

中国近 40 年来发展速度也非常快，甚至在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美国。2017 年世界 GDP 的总量是 75 万亿，其中美国的 GDP 是 19 万亿，中国紧随其后 GDP 是 13 万亿。按照美中两国目前的经济增速，预计 2030 年中国的 GDP 将达到 32 万亿，而美国的 GDP 只有 23 万亿。也就是说，12 年后中国 GDP 的总量将超过美国 39%。如果这个预想真的变成现实，那么十几年之后，二战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否需要变革？中国是继续作为全球金融治理追随者，还是会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领导者呢？毕竟那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了。

还有一个疑问，现在美元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那么十几年之后，美国如果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元还能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储备币种吗？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后，人民币会不会成为各国外汇储备当中最重要的一种货币呢？中国是不是正在积极准

备引领全球经济？做全球金融治理的领导者呢？中国是不是正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准备？这些问题中国也应该问自己，我相信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和行动，沿着这个方向逐步推进。

现在全球大概有 32 个国家已经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当中。我相信 12 年后，全球会进入到一个多币种的外汇储备体系当中，美元仍然是外汇储备货币之一，但人民币会跻身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币种。为此，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会应运而生。亚洲也会跻身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先者，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构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体系。

一直以来，如果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很多时候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求助。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IMF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它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帮助到那么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IMF 就更加无能为力了。世界银行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应运而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是 IMF 的有力补充。世界银行的成员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也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帮助，可是很多时候世行却拒绝了。AIIB 成立后，给予了发展中国家大量资金支持。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有像 AIIB 这样的区域性金融机构补充 IMF 的不足，进而完善全球金融体系。

阿联酋中央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应对及反思

■ 苏瓦迪 / IFF 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行长



苏瓦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爆发？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因为高度结构化的金融衍生产品或热钱的涌出，亦或是因为监管不利所致？无论是什么原因，2008 年 9 月美国第四大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了。可以说，雷曼兄弟的轰然倒塌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我记得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央行负责流动性的官员跟我说，现在根本没有流动性，各家银行都动不了资产。我们立即召开战略委员会会议，决定放宽流动性的门槛，向阿联酋金融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并为此临时调整了从央行借钱的相关规定。因为当时阿联酋的银行业已非常繁荣，不需要大量借款，所以最后我们央行没有投入太多。当时阿联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大概是 5% ~ 7%，购买的大多是中期债券，债券到期后没有延期，短期的存款都结算了，阿联酋银行之间的合作还是不错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国际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召开了首届 G20 峰会，商讨应对策略，并在第二届 G20 峰会上决定成立金融稳定

委员会 (FSB)。

在 2008 年 9 月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关注到了哪些事情？在三四月份，我们看到了经济过热、热钱积累，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海湾地区，在世界很多地方，大量财富被创造出来。为追逐高利润，当时不少大型投行进行投机，他们认为美联储将进行利率调整，所以投了很多钱。一些投行也把钱放在阿联酋银行，我们告知他们不能把钱放着不动，要么投资，要么买央行的债券。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们发现阿联酋不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他们就会撤资。后来这些投行意识到阿联酋不会调整货币政策，于是他们开始撤资。阿联酋银行的流动性是足够的，所以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阿联酋经济还好，但非金融部门确实有一些债台高筑。所以，我们要管理好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更容易管理，因为货币政策是央行能够拍板决定的，而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很难抵抗政治的影响。

金融危机过去后，我们做了很多清理和完善工作，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虽然还有一些遗留的不良贷款，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另外，现在已经没有金融危机时期那么多的热钱，也没有像雷曼兄弟之类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银行或机构，所以我认为近期不会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可能会有一些区域性的危机。因为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可能会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会给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做好金融风险防御，保护好本国经济，在国家财政方面控制好借贷，尤其是对外的借贷。

1997、2008 两次金融危机起因及应对策略的分析与对比

■ 宋敏 / 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宋敏

10 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 20 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与债务危机有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是超发货币，通过 CDO、MBS、CDS 等金融创新产品把高杠杆的风险向全球金融体系传导，而且监管对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监管滞后，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所以，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次贷危机也是债务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债务危机，当然主要是美元、日本等外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双错配”。第一个错配是本币外币错配。亚洲发展中国家外债借的是外币，但是外债在国内做投资用的是本币，因此如果国内投资没有利润，就没有办法换外币偿还外债。第二个错配是期限错配，就是通过银行的短期贷款借外币进行长期投资。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亚洲很多国家都是采取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外汇储备比较少。

1997 年、2008 年爆发的这两次金融危机，应对政策很不一样。2008 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中国购买 4 万亿美债，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虽然 4 万亿只有 20% 左右进入实体经济，其他都进入了股市和楼市，埋下了潜在危机，但也确

实有助于度过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所以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资本市场恢复较快，实体经济相对复苏较慢。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政策应对，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发达国家的指导下收紧货币、财政政策，结果是加剧了金融危机。为什么这两场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如此不同？因为 1997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在亚洲，而应对的决策者是发达国家，所以采取了紧缩政策，让亚洲勒紧裤腰带还贷款。但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所以采取的是超发货币的量宽政策。当然了，也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办法通过超发货币度过危机，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超量印发自己的货币，只会导致货币迅速贬值。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应对，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没有对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体系弊端进行结构性的改革。金融危机带来的资产泡沫加剧了贫富不均，引发了民粹主义抬头。另外，美元加息一般会导致美元升值，而美元升值又会加大美国贸易逆差。众所周知当年美国曾通过广场协议，逼迫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如果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是否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而且，随着美元的升值，全球的资金会流向美国，这也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挑战。比如，有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几乎腰斩、股票也跌了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处于危机中了，只是没有扩大成区域性的危机。当然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在监管体系上确实做了很多变革完善工作。而且我认为下一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可能与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一样。

过高的债务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因素之一，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高债务问题？并没有。美国是家庭债务转换成政府的债务；中国的债务是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里。全球最大的风险是贸易摩擦、贸易战以及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都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叠加性的危机。

科技发展不仅仅是推动和普及， 更重要的是原始创新

■ 陈炳才 / IFF 学术委员、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巡视员



陈炳才

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包括潜在性的增长有赖于科技的进步，尤其有赖于科技的普及和推广。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方面，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离不开科技发展的助力。科技发展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推动和普及，更重要的是原始创新。

原始创新主要是思维方法的革新，没有思维方式的革新，原始创新很不容易。

第一，创新要从解决人力入手，替代人工和人工的经验。英国在 18 世纪阿克赖特发明水压纺纱机后，又将蒸汽机用于纺纱，再后来又用机械动力纺纱。而中国的黄道婆在十三十四世纪就发明了纺纱机，但在之后几百年并没有多少改进。所以纺纱工业的革命是在英国开始的。不仅是纺纱、织布，中国的农耕文明最初在全球也是走在前面的，但中国靠牛马耕田几千年都没有变革，即使工具改进也没有考虑替代人工。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一开始发明农业、工业工具的时候就是要替代人工，所以发明了拖拉机、收割机等机器。机器替代人工的优势主要有：工作标准始终一致，没有疲劳、疏忽以及经验不足等问题。所以要有通过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和人力的思维方式。技术原始创新首先第

一条就是要解放人力。

第二，把经验、技术、技能等程序化、数据化。十八世纪之前，中国瓷器闻名世界，价格超过了黄金。欧洲人也想造瓷器，于是建立实验室，尝试着用各种材料调制出瓷土配方，并不断调试瓷器烧制的温度，经过反复实验，终于烧出了精美的瓷器。这个过程中，3 万多次实验都有完整的记录，因此能及时发现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所以欧洲造瓷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正是依靠经验、技术、技能等程序化、数据化，等到蒸汽机发明之后，欧洲瓷器开始了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瓷器制作再往前走就是人工智能化。总而言之，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把经验、技术、技能等程序化、数据化。

第三，应特别重视技术研发的数据记录。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然而重农抑商、重科举轻科技，所以许多曾经领先世界的科技并没有记录传承下来。从 15 世纪到 16 世纪，欧洲无论是冶炼还是机械制造，都会对生产工艺、程序、配方等做详细记录，因此后人可以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改进、创新、完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缺乏技术研发的数据记录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要从专业化分工走向智能化。我们都知道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其代表形式就是流水线作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是不是就不需要专业化分工、流水线作业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也离不开专业化分工，否则就难有科技原始创新。

IFF 政策对话 (4)

科技发展不仅仅是推动和普及，更重要的是原始创新

陈炳才，IFF 学术委员、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巡视员

49

中美在人工智能 (AI) 和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和未来发展

黄乐平，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电子及技术硬件行业首席分析师

50

创新生态环境，优化科技成果转化

韩军，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秘书长

52

科技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玛莎·万德博格，IFF 学术委员、太平洋养老金协会 (PPI) 前 CEO

53

中美在人工智能 (AI) 和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和未来发展

■ 黄乐平 / 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电子及技术硬件行业首席分析师



黄乐平

人工智能 (AI) 和半导体是中美竞争的重要领域。据麦肯锡的调查报告显示,未来 10 年 AI 将推动 GDP 增长 1.2%。人工智能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首先是替代或放大作用。比如以前五个人做的工作,现在通过数字技术智能化可以降低到一个人完成,相当于把一个人的能力放大了。AI 也是一个颠覆性的工作,就是涌现一些新领域的同时有一些领域会消失。

人工智能对过去的一些工作流程再造,引入新技术,以前的技术和人力都会被放弃,很多 AI 公司因此应运而生,比如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四小龙:商汤、云从、依图、旷视。在制造业领域,我觉得中国的机会比美国大,因为中国制造业在 GDP 的占比超过了 40%,而美国制造业在 GDP 的占比远低于中国。制造业是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的下一个金矿,目前它的数字化的程度远远不如互联网行业,而制造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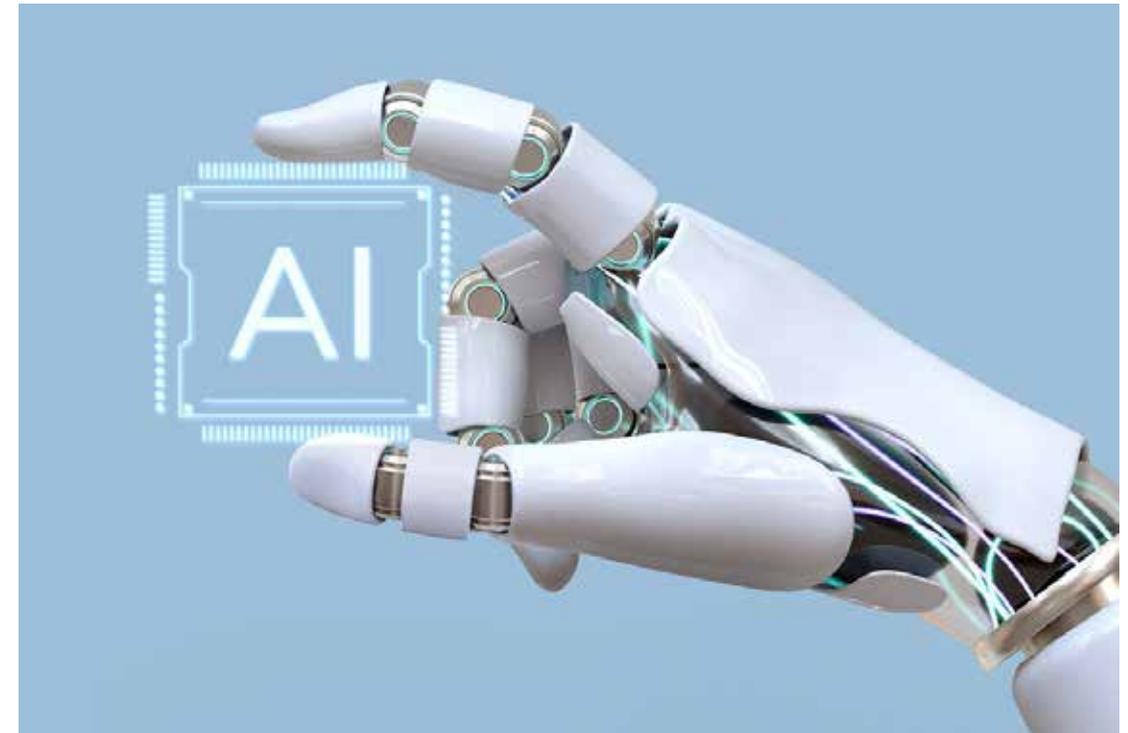
我对中国和美国近一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做了一个简单比较。在风险投资 (VC) 市场,中国其实从 2017 年开始已经超过美国。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目前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并不多,但

最近中国商汤科技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 60 亿美元。商汤科技规模扩大得非常快,但在应用基础领域,比如芯片或者基础计算框架等方面距离美国头部公司还差得非常远。

在计算机视觉特别是应用方面,其实在很多场景下中国已超过美国,比如由于中国特殊安防的需求非常大,在计算机视觉中的安防领域,中国无论在市场规模还是在技术能力上都已超过美国。不只是计算机视觉,包括语音语义语言处理等很多领域中国的发展都非常快。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数据的可获取性、完整性是人工智能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现在中国在什么领域的的数据最完整呢?第一是移动互联网,第二是安防,第三是智能家居。智能家居行业很赚钱,而像科大讯飞这类公司就没赚到多少钱,赚的是亚马逊、小米等电商类的公司。

有两个行业最近非常热,其中一个行业是汽车无人驾驶,但是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其落地的速度都远远低于大家的预期。主要原因一是技术的难度大,二要获取大量完整的数据非常困难。第二个热门行业是医疗,但医疗人工智能落地的速度也低于大家的预期。比如美国 IBM 和美国一家医疗肿瘤医院的合作被取消,中国的医疗人工智能落地速度也非常慢。原因之一就是医疗数据的可获取性、完整性难度非常大。我觉得不要神化人工智能,有些领域落地慢,但是也有很多领域发展速度非常快。比如说物流,特别是物流的配送车,还有零售,以及制造业,这些领域的人工智能接下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发展。

接下来讲讲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从中国和美国的布局来看,全球超过 50% 的半导体行业是在美国,也就是以美国为总部的公司占全球半导体行业 50% 以上。中国从 2002 年开始关注发展半导体行业,目前中国半导体行业在全球的占比只有 3%。但是在电子元器件方面,中国占全球 25% 左右。美国是不是会把苹果的生产地搬回美国?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供应链、产业基础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了,搬回去



的话,要把整个供应链重新做一遍成本非常高,所以搬回美国基本上不可能,但搬出中国,搬到印尼、泰国是有可能的。

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按市值来看,基本上是对等的,中国有 BAT,美国有谷歌、Facebook 和亚马逊。亚洲半导体公司只有三星和台积电,而且几乎是被美国公司所垄断。所以现在中美竞争,中国现在要走的路就是把美国硅谷从 1950 年开始做的半导体产业重新做这一遍,这是一条非常艰辛的路,因为中国缺乏产业基础,但是中国互联网比较强,数据存量非常大,这些地方是有发展机会的。

2016 年半导体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升周期,背景是云计算和芯片的发展,内存、存储器涨得非常快。但是从 2018 年 3 季度开始往下走,原因是手机销售额的下降,接下来会跌多深不知道。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因为全球半导体行业处于一个很明显的下行周期,中国又在加速资本开支,对企业来说折旧的费用会上升,盈利压力非常大。但是由于中美关系的摩擦,一些事情又不得不做,所以通过财政或者政府的支持解决公司短期盈利压力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看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机会?我们通常把

半导体行业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市场规模大的先进制造,也被称为“大国重器”,包括存储器、芯片,这些行业的特点是规模大、开支大、重要性大,所以基本上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第二块是竞争壁垒不很高的行业,包括人工智能 (AI) 和 5G 技术,现在 5G 也是中美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争夺点。第三块是半导体设备,这个行业已经存在了 40 年,而且壁垒非常高,但是行业规模不大。这个行业不得不做,因为这是半导体生态链的一部分,这个行业的资本开支不会太大,只要有技术以后都能做起来。

总的来看,半导体行业中美竞争主要有两个焦点,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半导体。人工智能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中国有数据和人才的优势,但在算法和计算芯片上有点落后。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劣势更加明显,因为半导体行业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

创新生态环境， 优化科技成果转化

■ 韩军 / 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秘书长



韩军

中美贸易战也好，贸易冲突也好，虽然国内国外叫法不一样，大家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是都与科技创新有关。

我想与大家分享几个科技创新相关数据：1. 2017 年中国在科技研发上的总投入是 1.76 万亿，占 GDP 的 2.13%，位居世界第二；2. 2017 年中国 SCI 论文 32 万篇，1988 年中国 SCI 论文只有 5600 篇；3. 2017 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是 138 万件，1988 年申请量只有 4780 件，目前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方面中国排名世界第一；4. 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名列世界第一。

这些数据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中国政府在近几年倡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了科技创新投入、改善了科研设施条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忧的是，中国在科研尤其是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原创性、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不足；第二，科研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第三，高质量专利十分缺乏。虽然 2017 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高达 138 万件，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其中高质量专利占比很低。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有缺陷、不完善，比如评价高校老师、科研人员优劣以及对其进行奖惩，主要是看发表的论文和

专利数量，导致论文充数，专利为了申请而申请。第四，在创新生态环境方面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技成果和技术应用的供给方，而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2018 年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做了大量调研，发现了一些问题。2015 年 10 月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的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目前仍有一些财政部门在固定资产管理方面的做法与这个法是冲突的，因此还需要在创新环境方面修订一些不适合创新发展的政策。

当初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主要是借鉴了美国法律一些比较先进的地方，在中国实施落地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该法律规定成果转化后或者技术转移后，不低于 50% 的净收益须奖励给科研团队。不低于 50%，也就是 50% 以上都是合法的，100% 全奖励给科研人员也是合法的。但是如果 100% 全奖励给科研人员，那么做技术转移、做服务和支撑、做市场分析等负责科技转化人员的积极性如何提高？这些人没有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意义何在？目前中国科研院所基本上是把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的 70% ~ 90% 奖励给科研团队，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科技在中美关系中的 重要作用

■ 玛莎·万德博格 / IFF 学术委员、太平洋养老金协会 (PPI) 前 CEO



玛莎·万德博格

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和美国的治理模式非常不同，美国很多事情都是自下而上的，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在斯坦福度过一段时间，当然我跟我的同事们不同，我不是一个技术人员，但是我对技术在美国及全球经济中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硅谷是美国科技的一个基石，现在硅谷在盈利以及个人数据保护等方面面临挑战。如果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就可以看到马克·扎克伯格他们在国会听证会被质疑很多问题，包括科技公司是不是规模过大，其商业模式是否正确。有些人认为硅谷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我认为硅谷仍然有竞争力，而且硅谷所在的整个旧金山地区依然在蓬勃发展，我认为硅谷有能力应对其面临的挑战。

科技是中美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我是国际金融论坛 (IFF) 的学术委员，我记得 2013 年参加 IFF 全

球年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振奋，因为当时刚刚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明确了市场体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该公告也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也就是中国政府在明确市场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

下面我想谈谈美国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一个历史性的选举，2018 年大概有一半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此次竞选活动是分裂、肮脏、不文明的，是民主的污点。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分裂的国会，共和党仍然控制着参议院，民主党赢得了众议院。除此之外，中期选举给了民主党一个机会，为 2020 年奠定一个基调。另外，本次中期选举对于女性来说是一次胜利，现在众议院有 102 位女性，占据了众议院近一半的席位。女性还将担任重要的国会委员会的领导职务，而且还有可能担任议长。全世界注视着美国中期选举的

结果，对于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担忧，这种不确定性是美国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隐忧。因为每四年美国就会举行一次总统大选并选举出一名新的总统；每两年美国就会进行一次中期选举并改选议员。有人说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人平等受益，我认为，美国中期选举拉开了一个序幕，随着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有可能反击一些逆全球化的议程。

全世界注视着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于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担忧，这种不确定性是美国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隐忧。因为每四年美国就会举行一次总统大选并选举出一名新的总统；每两年美国就会进行一次中期选举并改选议员。

促进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三点建议

■ 罗扬 / 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



罗扬

我想结合丝路基金的投资实践，谈一谈对促进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一些看法。

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专业化转型期，需要开发大量对经济发展起支柱作用的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类的大型项目。但是这些国家由于自身资金实力不足、财政投入不足，需要市场提供期限长、金额大、成本合理的资金支持。传统上提供这类投融资的大多是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市场上的长期资金来源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出于对资金安全的考虑加上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不愿意或难以为大型项目提供融资，因此需要加强金融合作，鼓励金融创新，更好促进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匹配，这是各国基础性、发展性项目的开发建设。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这方面拥有天然优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金融合作，发挥多元化优势，搭建多方合作的平台。

发展中国家面临中长期投融资缺口等发展瓶颈，决定了“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需要众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通过不同地区各类机构间的多元化合作和优

势互补，实现各方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拥有大量优质高端的科技制造业企业，可借助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专业化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产业投资人的作用。香港作为资本市场资金量巨大、金融服务功能强的地区，能够发挥“一带一路”大型项目金融媒介服务和资金池的角色。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和合作的桥梁，有利于资金方更好地了解葡语国家的项目，一定程度上为项目提供征信支持。

丝路基金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尝试通过多方合作方式，为“一带一路”提供投融资支持。2016年开始，丝路基金就与韩国开发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以及亚投行等金融机构，共同作为有限合伙人（LP）投资了世界银行亚洲新兴市场基金。普通合伙人（GP）是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主要投资于亚洲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医疗、农业、服务业等行业。目前已投资位于孟加拉、印度、缅甸等国的若干项目，包括印度的一个大型医疗供应项目的股权。世界银行亚洲新兴市场基金积极践行多方合作理念，将中、日、韩三国的基金引入第三方市场，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动力。丝路基金还与深圳的投资机构、香港监管局、澳门监管局等机构保持良好沟通，积极探索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平台，希望未来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

除了跟日韩官方金融机构合作以外，丝路基金还与欧洲、美国的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展开了良好合作。比如，丝路基金跟美国的 GE 公司合作建立了联合投资平台投资第三方，跟欧洲投资银行合作建立了投资基金，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签订了 OEM 合作协议。

第二，推进金融创新，特别是人民币产品的创新，持续完善市场机制。

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大型项目存在融资缺口的主要原因是项目风险很难得到有效管控和缓释，资金方的收益和风险不匹配。2017年丝路基金获得1000亿

IFF 圆桌会议

促进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三点建议	55
罗扬，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大有可为	57
周诚君，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需形成互补、协同发展	59
陈兴动，IFF 学术委员、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建设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要着力打造其风投创投、财富管理、科技金融等功能	60
刘少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海上丝绸之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中国保险走向国际带来了发展机遇	62
吴保军，众诚保险董事长兼总裁	



人民币增资后，积极推动人民币海外投资项目的落地。我们发现 3 年以上的人民币套期保值工具数量有限，成本较高，导致人民币的中长期汇率风险很难被有效对冲，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境外业主接受人民币投资的意愿。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地缘优势，鼓励金融机构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工具和架构方案，不断推动金融工具创新，完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以 PPP 模式开展相关项目建设，发挥股权投资作用，帮助项目所在国减轻债务负担，提高项目建设运营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促进可持续融资，注重绿色金融，提升“一带一路”项目的综合效益。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环境效应日益关注，可持续融资也得到越来越多投资人的认可和推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各国对项目 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的监管日益严格。二是相关研究也表明，大部分项目的 ESG 表现与长期财务收益呈现正向相关的关系。由此市场上出现大量将 ESG 作为重要评价因素的投资方，以及以 ESG 为投资主体影响力的投资基金。有关机构的数据表明，目前全球约有 600 支主要关注医疗健康、新能源、教育培训等 ESG 相关领域的基金，管理基金规模约 2000 亿美元。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国际金融业等新经济产业基础，在加强可持续金融发展方面具有优势，应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重视项目的 ESG 表现，引导项目投资方和所在国提升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

丝路基金一直积极践行可持续投资理念，注重评估项目在 ESG 方面的表现。例如，2015 年丝路基金携手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 (IFC) 和中国三峡集团，共同投资了巴基斯坦卡罗塔水电站和风电项目，主动对接中巴经济走廊。这个项目引入了 IFC 在公司治理和项目融资建设方面的国际标准和经验，对该项目的建造、施工和管理进行全流程严格把关，注重履行 ESG 理念和标准，确保该项目建设成为拥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典范项目。该项目的合作对提高三峡集团的国际化水平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目前该项目已经建成投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大有可为

■ 周诚君 /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周诚君

人民币国际化始终也必将是大湾区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枢纽的重要核心内容。在建设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过程中，香港的金融核心作用将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建设和发展，也将给予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更强的支撑。

怎样发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首先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性质说起。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在国际贸易过程当中大量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已成为一种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很多海外投资者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被广泛用于结算，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在升值。从 2005 年到 2014 年人民币升值了 36%。2014 年以来，人民币的升值趋势不再延续，甚至一度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是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3 年到 2016 年间，国际市场人民币的持有度从 18% 上升到了 36%。在人民币可能贬值的情况下，为什么国际市场还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因为人民币已经从早期的贸易结算货币，变成了国际投资和官方储备货币，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

民币加入了 SDR 的一揽子货币。所以，2015 年以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大门不断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境外投资者越来越多。

非居民投资者投资持有人民币，仅仅因为人民币相对收益比较高吗？不见得，因为持有人民币意味着跨币种到一个新的市场，所以一个理性投资者要持有人民币资产，必须通过外汇交易市场，这个市场能够帮他更好地应对投资持有人民币的风险管理、期限匹配、流动性转换以及汇率风险问题。所以随着人民币加入 SDR，人民币从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变成了国际投资储备货币，下一步将是国际外汇市场货币，这样人民币从贸易结算到投资储备再到风险管理的资产交易，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人民币在交易环节上就完整了。

我们需要一个人民币的离岸资产市场、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市场、人民币离岸国际金融交易市场。这三者的基本特征就是：第一，它不一定有贸易的基础；第二，有非常频繁交易；第三，要有较大规模。所以从性质上讲，应该是一个国际人民币资产外汇交易市场。功能上首先帮助微观市场主体管理好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包括币种错配风险、流动性管理、信用风险等等，有一个比较好的人民币货币市场、人民币资产市场、人民币外汇市场，帮投资者解决好流动性管理问题、风险管理问题、资产配置问题，让投资者在预期发生改变的时候、想进行资产转换的时候、想变现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市场顺利实现。

从宏观角度讲，这个市场要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必须是有深度的、交易活跃的、流动性充沛的、价格形成是基于市场原则的，而且是能够达到有效均衡的。这么一个市场的宏观意义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定价。通过市场机制发现人民币的汇率所谓的合理均衡水平究竟应该在哪里。随着跨境或资本项目和金融账户的不断自由化，从宏观上就可以看到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的形成充分市场化、有弹性且能反映市场供应需求，中央



银行只考虑作为国内货币的汇率。

中国在当前全球绿色金融市场中已经走在了前列，成为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的引领者、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甚至已逐步成为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者。如果能够借助香港这个平台的人才和技术优势，让各类人民币资产具有更多绿色性质，尤其在“一带一路”推动过程当中，如果尽可能让我们的企业和市场主体在“一带一路”的每一笔投资都是贯彻 ESG 原则的，即是尊重环境的、讲社会责任的、基于良好公司治理的，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接受和包容程度一定会进一步提升。

离岸人民币的国际市场在基础设施上应该相应地配套。目前香港已经有了全球最好的离岸人民币的基础设施，比如香港有人民币的 RGTS，可以说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已运行得非常成功，以此同时内地基础设施也应配合跟上。比如境外非居民投资者持有人民币，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持有人民币的存款，一种是持有人民币的资产。从理论上讲，所有海外人民币资金的清算都在中国境内，因为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所有人民币资产是中国的实体经济所支持的。如果所有人民币的发行都集中在中国境内，境外投资者以什么方式来持有这些资产呢？这涉及到资金账户

和资产账户的开立问题。资金账户已经实现了所谓名义持有，资产账户目前还不行，为什么？因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境外非居民要投资中国的债券、股票，必须到中国的托管机构开立实名账户，但是海外投资者要到中国市场开户是很困难的。要形成完善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应像存款账户一样考虑多级托管、名义持有，方便境外投资者在海外各地以及香港形成具有比较完整物权的资产存托管理体系。这些资产账户进行各种各样的衍生品交易、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好的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交易结构、风险管理结构。在这方面，香港依托目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需形成互补、协同发展

■ 陈兴动 / IFF 学术委员、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陈兴动

从 2009 年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已经九年时间过去了。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被世界所了解。现在发展得如何了？

首先，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还有什么强大的增长动能？毫无疑问，第一个就是科技创新。第二个就是新型城市化。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地区整合。比如北部的京津冀一体化；中部以上海、杭州、南京为核心整合周边 16 个城市的长三角；南部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省的 9 个市加香港、澳门共 11 个城市，面积达 5.6 万平方公里，GDP 总量超过 1.5 万亿美元，人口约 7000 万，所以大湾区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战略。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人均 GDP 刚刚 1 万美元出头。相信借助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国经济一定能够进一步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经过 9 年的发展、整合或者说合作，现在如何了？粤港澳大湾区包括 11 个城市，但其中最主要的是香港、深圳和广州。这 3 个城市紧密合作、取长补短，形成合力，而不是互相竞争、排斥，大湾区才能

发展。目前为止 3 个城市好像还没有形成协调合作中心，对它们进行统一规划，我认为需要在这方面往前推动。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其实金融枢纽已经有了，就是香港，它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国际金融中心。现在深圳已经成为南中国的金融中心，而且有许多灵活、创新的金融产业在深圳成长起来。广州也在发展，但比起深圳还相对薄弱一些。但其实城市整合发展，就要取长补短，不能你是中心，我也是中心，要找到比较优势，避免同业竞争，否则效益会在竞争中互相抵消了。

第二，如何改进金融生态。中国的金融业一直不够发达，是受抑制的金融业。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要求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中国“影子银行”恰恰在那个时候开始发展，“影子银行”的发展给民营经济带来融资的便捷。但是 2016-2017 年，中国金融业出现了一些乱象，扰乱了金融秩序，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为此频繁出台严厉的监管措施。我觉得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利用粤港澳大湾区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发展，改进金融业的生态。

第三，下一阶段粤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个人觉得有几个特点。1. 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2. 中国的储蓄率不可能出现大规模下降，这就必然出现金融资本过剩。这部分资金去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的问題一是需要投资的人找不到钱，过剩的储蓄找不到很好的投资渠道，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提供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把其他的金融机构吸引到大湾区来，让他们发挥作用，而大湾区可以为其提供更好、更宽松、更加自由的营商环境，助力它们更好地发展。

建设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要着力打造其风投创投、财富管理、 科技金融等功能

■ 刘少波 /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少波

百年金融发展史说明一个道理，金融始终是由实体经济决定，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虽然金融有它本身发展的路径和规律，但是如果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很容易演变成空中楼阁，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发展不管是建什么中心还是建什么枢纽，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离开了这一点，给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群贴上什么枢纽、什么中心的标签都没有意义。

因此，讨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首先要明确大湾区的发展建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第一，要着力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风投创投中心，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而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产业中心，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发展到今天，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源。从大湾区

的具体情况来看，首先香港正在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有非常好的条件，比如在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的基础设施排名中，香港在 126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一位。其次，广东现在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创新势头。2017 年广东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全国第一位。2017 年全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9.8 件，而广东达到 18.96 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从专利质量来看，广东省有效发明专利量达到 20.85 万件，连续 8 年位居全国第一。广东专利国际化特色突出，2017 年全省申请的 PCT 国际专利数量达到 6.28 万件，占全国总量的 57%，连续 16 年位居全国首位。广东的专利申请质量非常高，2017 年获评“第 19 届中国专利奖”金奖 6 项、优秀奖 208 项，专利获奖数量名列全国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数量也已远超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专利数量。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与深圳创新及科技创业组成的深港科技集群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集群。从研发投入的指标来看，2017 年中国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2.15%，广东为 2.65%，已经接近日美等发达国家水平，深圳的研发投入尤其高。从以上数据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劲的创新势头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创新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创新发展又会改变产业结构，进而改变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大湾区金融结构是不是与其创新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匹配？我们感觉不匹配。大湾区现在的金融体系主要还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而创新发展需要更多资本市场的支持，需要大量的风投创投，需要各种各样的基金，包括天使基金、私募基金等等。所以建设大湾区金融枢纽就必须进行金融供给侧改革，创造适合创新的金融结构和模式，其中的重点应该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风投创投中心。

第二，要着力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财富管理越来越



重要，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财富管理需求已经非常大。2017 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广东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拥有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地区，2017 年达到 26.8 万个家庭，北京、上海分别居于第二、第三位。香港是高净值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每 34 人就有一个千万富豪，每 600 人就有一名亿万富豪，可以说香港是富豪聚集地。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逐渐深入，财富的集聚也越来越明显，从企业家的数量看，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富豪人数达到 467 位，可以说傲视全国。既然大湾区的财富管理需求这么大，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应该是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第三，要着力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金融科技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甚至颠覆现行的金融模式。要建设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就要积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特别是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突破一些金融体系上的障碍。大湾区的建设无论是金融还是其他方面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粤港澳三个地方有三种不同的制度，这种制度上的障碍已成为大湾区发展的制约。但是区块链这种去中心化的金融科技也许可以在技术上解决一些问题，从而促进大湾区金融的融合发展。香港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德勤发布的 2017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报告显示，香港

已经位列全球最重要的金融科技中心的第六位，内地在这方面还相对落后一些，所以可以和香港合作，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推动内地金融科技的发展。

第四，要着力将大湾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金融服务基地。

第五，要着力将大湾区打造成为金融监管合作以及不同监管体系融合的试验区。金融发展离不开金融监管，否则就会脱轨。但是大湾区里有三个不同的制度，不同制度下金融体系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也有很大的差异，如何在这种差异基础上进行监管合作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也许可以创造出不同金融体系监管上的合作范例。

第六，要着力将大湾区打造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海上丝绸之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中国保险走向国际带来了发展机遇

■ 吴保军 / 众诚保险董事长兼总裁



吴保军

海上丝绸之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给金融业的深度开放和融合带来了发展机遇。保险业作为现代金融的一个重要支柱，可以促进大湾区保险互联互通，助力大湾区保险企业走向国际。

第一，促进大湾区保险的互联互通。

金融要素的互联互通是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金融互联互通已经有了先例，比如内地和香港在证券方面已经开通沪港通、深港通、证券通等，在满足两地投资需求的同时，也有效激发了不同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活力。随着大湾区的建设，内地和港澳之间的经济、金融往来愈加活跃，大湾区保险业的互联互通需求也越来越突显。

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和 1 小时经济圈的打造，使三地三岸的车辆跨境来往更加频繁。跨境投保和理赔需求也增长得非常快。目前广东省银保监局已经联合港澳保险监管部门，建立了符合港珠澳大桥通行需求的三地车险承保理赔工作机制，将粤港澳保险机构互相提供金融投保便利的试点范围由原来的珠海横琴扩大到整个广东省，推动了港澳和国内车辆互相投保和电子保单互认，为跨境车主提供了很多便利。

保险企业可以根据需求开发期限灵活、保障全面的其他车险产品和服务，最大程度地降低跨境车辆和跨境车主的通行成本。同时保险机构也积极研发符合三地跨境车辆需求的创新保险产品，制定三地认可的理赔服务标准和实施细则。在三地开展业务机构之间相互确认备案，享受通保通赔服务，促进服务理赔一体化，解决跨境三地车辆和车险的问题。

第二，促进大湾区寿险的协同发展。

随着大湾区建设的深入，内地和港澳地区贸易流通、人员流动速度都有大幅度提升。目前作为家庭支柱的 80 后、90 后内地年轻人在拥有了一定财富积累后，对于人寿保险的投保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加上港澳地区的寿险和医疗、重疾类保险产品保障范围和保障条件更加具有优势，产品的选择也非常多，内地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跨境购买寿险产品、跨境理赔。相关数据表明，内地客户在香港购买保险的保费 2008 年是 32 亿港元，2016 年达到了 726 亿港元，增长速度非常快。2017 年因为受到外汇管制的影响，在香港购买保险的保费约为 508 亿港元。可以说内地客户对医疗和保障类型保险，包括重疾类、医疗类、人寿类等的需求非常旺盛。

香港的保险为什么那么受青睐？因为香港保险很多都是美元保单，保费便宜，分红非常高，疾病保障方面比国内超出大概 30 到 40 种重疾。因此，寿险产品跨境互联互通互认也是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一个课题。三地保险企业可以从多方促进保险协同发展。比如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发展，三地保险企业应该互相借鉴产品服务和创新经验，内地保险业应该学习港澳与国际标准更加接轨的服务和条款，包括监管上的一些政策和方法，从而提高内地保险产品与客户需求的吻合度。另外，通过三地监管体系的对接，也能够推进寿险产品的互认和跨境理赔。随着寿险产品和理赔的互联互通，香港、澳门和内地保险企业可以在异地设立服务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为投保人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第三，推动大湾区保险资金的跨境融通。

保险资金现在规模大、期限长，非常稳定，是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保险资金的跨境融通可以推动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但是目前国内的保险业资金的投资方向主要还是内地资产，所以我希望通过债权、股权或者私募基金包括丝路基金等形式参与到“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建设项目。希望能够参考沪港通、深港通等平台模式，开拓通畅粤港澳三地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使保险资金的配置能够全球化，使收益更加稳定。也可以通过设立粤港澳保险基金等方法推动三地共同繁荣。大湾区的保险资金也不能仅仅服务于当地，希望能有更多资金配置到境外资产上，加快保险资金走出去，充分发挥保险业的风险管理、资金融通价值，推动全面服务“一带一路”。

第四，推动大湾区保险企业走出去。

海上丝绸之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催生了各种各样的保险需求，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承接工程、拓展业务，因而催生出工程险、出口信用险、海外投资险、航运险等需求。大湾区的保险企业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海外投资、经贸往来、海外人员及其财产提供保险，实现大湾区保险企业走出去的进程。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保险业走出去的基地和支撑，港澳地区以其区别于内地的法律体系、监管规范、市场体系等，可以为大湾区保险企业提供宝贵的国际化管理和运营经验，推动保险企业更快更准与国际接轨，加快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经济成就

■ 朱光耀 / 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朱光耀

1978 年 12 月 18 日到 22 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这次伟大的会议，拨正了中国这一艘巨轮的前进方向，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从这一天开始。4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全世界也空前地提高。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中央。40 年，中国经济的规模，从 1978 年的 2684 亿美元发展到 2017 年的 12.34 万亿美元，增长 15 倍之多。中国的外汇储备 1978 年只有 1.67 亿美元，今天超过了 3 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 220 美元，2017 年中国的人均 GDP 超过了 8800 美元，中国正在向突破人均 GDP1 万美元的大关前进。这个目标毫无疑问很快就要实现。中国的经济 40 年来平均增长 9% 以上，中国的变化造福了中国人民，中国的变化也影响了世界。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反映中国人民的要求，满足中国人民的愿望。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对外开放的事业开启了伟大的篇章。就是在这次具有历史会议的一年之后，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

要进程，中国在经济范围内同世界的融合在起步、在深化。我想它的标志是中美 1979 年 1 月 1 日建交，在此之后中国开启了同全世界交往、融合的历史进程。1980 年 4 月 17 日，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1980 年 5 月 15 日，中国加入世界银行，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从此，在重要的全球国际金融体系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银行，中国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起到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开放促进了中国同世界的融合；中国在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等方面，也受益于同世界的融合。中国曾经是世界银行软贷款的接受国，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40 年来，中国已经从世界银行的软贷款接受国变成了世界银行软贷款的重要捐款国。

中国正在对世界的扶贫事业发挥着历史性的重大影响。中国的成就首先是自身扶贫事业的伟大成就，7 亿中国贫困人口的脱贫是中国对世界扶贫事业最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在自身经济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积极回报世界。中国增加了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增加了对国际金融机构的赠款，中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2001 年 12 月，中国经过 15 年的艰难谈判，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重要成员。从这时候开始，无论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的经济治理。中国的开放事业不断地向前推进，也促进了国内的改革，改革又奠定了开放的基础，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在 40 年来不断地向前发展。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主席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久前，《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对中国 2017 年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作出最新判断，《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确认中国 2017 年度全球营商环境的排名从 2016 年的第 78 位上升到了第 46 位，提高 32 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明我们的改革开放在继续向前推

IFF 峰会 (1)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经济成就	65
朱光耀，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大宗商品贸易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	67
姜洋，IFF 副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底层逻辑	69
陈文辉，IFF 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金融机构改革的三点经验	71
陆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功经验和心得	73
祝宪，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改革开放中“香港模式”的作用	75
赵晓斌，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进。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个突出的例证。但实事求是地说，第 46 位的排位仍然有着巨大的改进空间。当今社会生产力的竞争空前激烈，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我想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地对外开放，要坚定不移地全方位地参加全球的经济治理。我们一定要借纪念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40 周年之际，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地向前推进，让中国的改革再出发，让中国的开放更包容，让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让中国人民更加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大宗商品贸易 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

■ 姜洋 / IFF 副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姜洋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我们从原来的大宗商品输出国转变为进口国，大宗商品贸易给进口国和出口国带来不同的好处。

第一，大宗商品供求影响全球的经济。伴随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交往非常密切，改变了过去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 40 年来，各项改革措施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时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大宗商品涉及的面非常广，大宗商品贸易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中国 40 年前在世界经济中微不足道，但是今天已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前两天我参加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成就展览的时候，看到 2017 年中国的 GDP 是 82.7 万亿人民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基本没有到达到 34%，进出口总额从 0.02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1 万亿美元。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为全世界带来了好处，是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合作共赢的范例。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下一步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引领将起到积极作用。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投资贸易的分工合作、取长补短，

将帮助各国迈向共同致富。

大宗商品作为产业链前端投资的原材料，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牵动着各国间的利益关系，保障大宗商品供应和价格的稳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十分重视大宗商品的供应和价格的稳定。但大国间地缘政治的博弈经常影响经济，尤其是对重要的大宗商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三类大宗商品是：原油、铁矿石、大豆。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意义重大。期货市场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稳定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它的交易、它的合约产生了它的杠杆，大宗商品市场从金融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期货市场，因为期货合约到期就是现货。所以影响大宗商品安全的主要因素除了它供应的不间断性，另一个因素就是价格波动。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与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密切相关，所以需要金融工具来稳定价格，需要由市场来进行风险对冲，套期保值。

从国家层面来看，小型经济体如果要建立本土的期货市场成本太大。比如韩国的期货市场，它主要是金融期货市场，没有商品期货市场。期货市场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就非常必要了。如果大型经济体不去建立这个市场，全世界就没有套期保值的场所。如果大型经济体这么多企业不利用本土市场，反而到其他市场去参与，那大型经济体就没有制定自己规则的机会了。一个大国、重大的经济体要有担当和责任，要为全世界对冲风险建立一个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原油期货已经建立起来并开放，我们的铁矿石期货市场也已经建立并开放。现在全世界在美国、欧洲都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但是仅仅参加美国的原油期货市场和欧洲的期货市场是不够的，很多亚洲国家希望在亚洲这块地域上有自己的期货市场。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应该有担当，建立本土的期货市场，让愿意到这个市场来进行风险管理的国家和企业都有机会。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至关重要了。现在中国的棕榈油 99% 是进口的，橡胶超过 90% 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的，这都需要



市场。有的国家经济体量小，参与的人少，如果中国能建立本土市场，参与者众多的话，对全世界希望进行风险管理的国家、机构和企业而言，就是一个贡献。这是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机会，也是给世界带来的机会。

从企业层面来看，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可以帮助企业增强竞争力。其实这么多年中国的金融改革，更多的是重视银行的融资、重视证券的融资、重视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利用证券来进行风险管理，因为金融行业就是风险管理的行业。但真正用衍生品来进行风险管理，在这么多年以来没有排到适当的位置上。国际上需要中国做贡献，中国也应该做贡献，那么这个期货市场的开发和开放就非常重要。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有的企业应用期货比较好，比如有色金属企业连续 8 年利润都在增长，而其他行业波动就非常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参与伦敦期货市场和上海期货市场，95% 的定价、50% 的库存管理，他们所有的大宗买卖都利用这个市场来进行。所以，有色金属行业在中国发展不错。中国的铁矿石 2018 年 5 月份已经向国际开放。PTA 是一种塑料化工原料，也是石油的初级产品。全世界都没有，就只有中国建立了 PTA 市场，意大利和所有纺织大国都想利用这个市场。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给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带来广阔的空间。“一带一路”对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会带来非常大的益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大宗商品的合作来看，在能源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气管道在全球的占比为 80%，原油储量在全球占比 59%。在矿产资源方面，铁矿石、铅锌矿等占全球 20% 到 40% 之间。农产品方面，天然橡胶占比达到 90% 以上。玉米大豆也是如此，黑龙江很多农民跑到俄罗斯那边去种大豆，中国的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产量每年 1000 多万吨。有报道说现在俄罗斯的土地如果开发可以替代中国进口的三分之一。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的合作是非常广泛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的商品如棕榈油、橡胶、原油占中国进口总量的比例分别达到 91%、78% 和 67%，这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非常重要。

从大型基础设施合作来看，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交通至关重要。中国人讲“要想富先修路”，中国这些年“一带一路”的建设在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中缅的油气管道、中俄远东输气管道等等，给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合作带来了广阔的空间。

大宗商品贸易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从金融的角度分析，建立期货市场有利于稳定大宗商品的价格。建立本土的期货市场，提供这种市场交易机会和场所，能够密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关系，从而促进合作共赢，共同迈向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 底层逻辑

■ 陈文辉 / IFF 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陈文辉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曾召开了为期 1 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个广泛解放思想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做了总结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会议对于整个 40 年的改革开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对这 40 年金融的改革、发展、开放做一个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我重点讲一下中国金融发展的底层逻辑，有几点思考。

第一，关于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金融的发展状况。中国金融的发展不仅是总量的增加，由几千亿增加到几百万亿；也不仅是规模的增大，比如好几家银行都是世界五百强，全球最大的银行都在中国，还有中国的保险公司里有 6 家是世界五百强。1998 年保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保险业的总资产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型保险公司的规模。更是因为这 40 年的发展，中国诞生了许多新的行业——证券业、基金业、信托业等等，应该说这

40 年的发展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金融业的发

展和整个经济发展相伴随，其对中国 40 年经济奇迹成果的取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从金融的角度看待 40 年改革开放与发展的逻辑关系。

应该说这 40 年的发展是改革推动下的一种超常发展。国际上都认为这是奇迹，这个奇迹是改革开放强力推动下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从金融来说，金融是一个舶来品，我认为金融是改革开放推动下的一种发展。在金融的改革、开放、发展三者关系中，可能开放处于更重要的位置，因为金融开放才能带来金融的改变。过去金融是财政的附庸，当时财政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是资金融通的工具和风险管理的手段，现在这个观念已完全转变。

还有一个是技术的引进，这些年来引进的技术有很多。我读大学的时候，数学专业是很不好的，因为数学不大好找工作。后来人家告诉我读数学好，搞金融的人都是读数学出身的。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精算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学数学的人能够去学精算。精算到现在为止在美国还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这个职业既稳定，薪酬又高，还不用像投行一样加班。金融开放还引进了一些制度，比如监管制度、公司治理等等。

总之，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开放处于更主导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阶段，金融开放的力度更应该加大，应该在新形势下通过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

第三，讲一讲竞争的问题，中国金融这 40 年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垄断到竞争的关系。

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开放处于更主导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阶段，金融开放的力度更应该加大，应该在新形势下通过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

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的核心和精髓就是市场竞争。事实上，这 40 年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竞争史。在当初垄断情况之下，有些东西现在听来有点不可思议。比如当初垄断之下金融的利润很高，高

到从事金融的人都说不好意思。现在市场主体不断增

加,供给在不断增加,需求增加得更快,市场更加繁荣,服务确实更好,市场活力不断迸发出来。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怎么样进一步促进竞争,特别是促进公平竞争,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特别是作为金融监管部门,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第四,关于审慎稳健经营的金融文化。

40 年来,金融机构为了审慎稳健的金融文化付出了大量的学费。1998 年,我到人保广西分公司清理系统不良资产。造成这么多不良资产的原因,就是小马拉大车,保费并不多,却拼命地去搞投资,什么都可以投,弄出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前几年一些激进的投资带来了危害,到现在我们还在处置这些风险。应该说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血的教训。

随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发展,它的盘子越来越大,风险集聚也是越来越大,处置起来实际上也越来越难。现在这个时候更要重视审慎稳健的金融文化。当然我们现在的处理能力也更强了,因为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审慎稳健的金融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的人说无知者无畏,但是在金融行业却是会越做胆子越小,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这就是审慎稳健金融文化的形成。

第五,专注主业,回归本源。

想扩张、想扩大是人类的本性,但管理能力有限,这又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一个人不可能既懂银行又懂证券,懂期货还懂基金,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人无完人,没有人是全才,也没有哪个公司啥都能干好。此类教训很多,记得 20 多年前我在信托公司工作的时候,信托公司就是不断地整顿,整顿完了又一次大干快上,出了问题再一次整顿。那个时候我们称信托为“金融百货公司”,不管是实业、房地产等等都可以做,后面就出现金融控股盲目扩张所带来的风险,这个教训也是非常惨重的。在新时期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真正地回归本源,专注主业。

第六,从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到监管资本的概念和透明度的问题。

金融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为什么说是特殊行业?因为它是信用行业,比如说银行和保险公司就是凭着一张纸开展业务。银行给你开一个存单,保险给你开一个保单,现在电子化连一张纸都不要了,就是一个承诺,他就可以收钱。过去我们不理解,也还是觉得很有道理。过去某国一位金融机构人员跟我说,他们银行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就创造了庞大的资产,为国家赚取了巨

额财富。可他却不知道,一张存单之所以能够卖出去把钱收进来,正是因为国家提供的信用担保。

说到开放,金融这个生意也是要本钱的,要本金的,这个资本金不仅是用来发工资、租办公场所、买原材料的,更多的是用来覆盖和吸收风险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也是这么来的。这些年来整个金融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的意识已深入人心。资本监管这个概念已经由过去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发展到监管机构对于资本的刚性要求,其实这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最后,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简单说两句。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要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现在我们的这个意识正在跟国际接轨,大家都认可上述几条。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这个目标并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自觉不自觉地把怎么样促进发展当做了监管的目标。关键是由于这个目标不是非常清晰,就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有些还是很致命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征程中,明确金融的监管目标非常重要。

金融是一个舶来品,用开放来推动改革和发展,我们付了很多学费,也有很多的教训,现在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资本充足率是底线,风险管理是护身符。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吸取了很多国际上的最佳实践,市场化和专业化两个轮子一个都不能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金融机构改革的 三点经验

■ 陆磊 /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陆磊

金融机构改革仅仅是金融改革的一部分内容,金融的核心作用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体现。一条是宏观渠道,主要体现在需求端,货币、信贷、外汇政策毫无疑问会对经济增长、物价等起到影响。第二是微观渠道,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我们称之为供给侧。改革的复杂性往往就体现于我们必须同时在需求和供给两条线上发力。40 年的金融改革开放一言难尽,因为金融是非常复杂的,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货币调控体系改革、外汇管理体系改革、金融市场制度设计、金融机构改革以及金融业开放。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它自身是否存在一个内核,这个内核的演变遵循什么逻辑,我们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金融机构体系是全部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我们谈金融改革,本能就会想到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做什么、是否安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存在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争论,现在提出金融机构是全部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一定会引起分歧。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金融体系显然还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性,

比如中国的金融体系和美国一样吗?日本金融体系和印度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同时各国都有类似的货币当局,都有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功能趋于一致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在这些层面上大家都是雷同的。为什么说它不一样,主要就是微观主体导致了它的差异,也就是金融机构。

具体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金融机构的差异来自于体制差异。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 年恢复分设农行、中行、建行,逐步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到 1984 年随着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家,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7 年提出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由此明确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推动金融机构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朝着商业化经营目标迈进。1993 年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差异也是显著的。

金融业仍然面临法人治理变革,其中的关键问题是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的参与。时至今日中国的金融机构敢说自己的约束是完全硬化的吗?为什么会会出现资产扩张以后仍然要不停补充资本金?这实际是改革早期的预算软约束穿上了不同的外衣,内核还是一样的。一些大机构具有系统重要性,甚至在一些区域当中,中型机构在当地也具有系统重要性,产生很多问题需要由政府、监管部门和中央人民银行来承担。“影子银行”的风险十分突出等等。

金融机构的改革仍然是基础性内容。因为金融机构的现象或者说运行特征决定了改革的难度。1993 年中国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构想,1996 年放开同业拆借利率上线。2000 年开始,按照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的思路全面推进改革。这样的改革效果何在?我们发现价格只有对真正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才能完全发挥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问题是金融机构的行为

往往具有不完美性质，利差要能够覆盖风险，否则就一定会导致资金的内部循环。简单来说，就是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基本策略一定是净收益应该能够覆盖风险。如果做不到，它就会更多发展同业业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经济下行期会是关键问题，而在上行期往往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好，有收益，但是在下行期就会成为一个问题。风险演化为一方面货币传导机制因风险溢价而效果不好，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运作泡沫化现象在很多领域出现。

第二个观点，金融机构的必要条件是开放。如果金融机构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必要不充分条件，那么金融机构改革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是开放。改革有的时候会缺乏内生动力，而开放是重要的先决条件，或者说是开放促进了改革。我认为开放的基本含义：一是引进规则，二是引进制度。

第一从规则来看，整个金融改革过程是按照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逐步引进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体现市场原则的法律体系、制度规则、计量标准和实践准则。有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改革进程就能更加规范。

从商业银行看，自身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低导致不良贷款快速累积，我们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保证了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空间应对金融风险，资本金多少决定了银行的实力，不仅可以保证银行的金融活动正常运行，还可以维护存款人的正当权益。国际上发生过多起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由于资本金不足且承担过高金融风险导致资不抵债，最终使广大存款人受害的案例。这就需要银行自我约束，而资本充足率正是这样一种约束。中国对于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经营约束比其他行业要严格得多。

第二从制度来看，所指的是产权和治理。本世纪初叶，中资银行引进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银行业的改革，建行、中行、交行在改革过程中引进境外投资者并在该境内外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国有银行改革经历艰难的探索，先是办成专业银行，然后成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剥离给政策性银行，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事实证明，如果不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银行不可能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从 2004 年开始的改革，再次剥离不良资产合计超过 1 万亿。之后又经过多轮改革，可以说成效是显著的。

2001 年颁布的第一部规范外资银行在华设立机构

的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在金融行业引进竞争的开始。我认为保险业是最佳实践，该行业开放力度更大，比其他金融行业提早 2 年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根据加入 WTO 的成果，进一步取消外资保险机构公司设立的地域限制。2005 年中国取消法定分保政策。这说明如果把金融的子行业、子机构领域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发现开放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高，反而带来这个领域的繁荣。

第三个观点，当前核心问题还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可以说金融改革表面是防控系统性风险，而实际问题是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的问题。就是谁来配置金融资源，谁来保证有效且适度的风险。核心实质是什么？40 年的改革经验可供未来的金融改革设计做参考。

第一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这是自 1979 年以来被改革反复证明的真理。但是，我们很容易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赋予中央银行过多的职能，特别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际上中央银行应在事前或事后纠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资源错配，但绝非直接配置者。

第二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但解决杠杆问题应该更多从机构的资本约束出发，而不是从总资本出发。中国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一方面我们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要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依靠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恐怕这两个目标很难兼顾。

在金融市场高度关联的今天，针对跨市场行业的金融行为所引致的收益和成本需要更加清晰地研究，创新带来超额收益，但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我们试图建立更为规范的制度，高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检验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走向现代化中高端的标准，我想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机构的改革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 成功经验和心得

■ 祝宪 / 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祝宪

40 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40 年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一点来讲，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对资源、产品、劳动力甚至消费资料都采取计划分配的方式，对外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也采取关门发展的方式。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1978 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当时中国人均 GDP 只有不到 200 美元，而同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 GDP 平均数大概是 400 多美元。当时中国 80% 人口的生活费用达不到每人每天 1.2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进出口贸易中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4%，进口约占 GDP 的 5.6%，两项加起来不到 GDP 的 10%。也就是说当时中国 90% 以上的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是脱轨的。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乃至本世纪上半叶，全世界最瞩目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见

证者和受益者，切实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带来的重大进步，以及各方面条件的不断改善。这些亲身经历也使我们坚定地认为改革开放必须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这一代人是跟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

习近平主席把改革开放称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体现了对改革开放本质的精准把握，也向世界明确宣示了中国将改革开放进行下去的决心。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几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指导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引领中国走出了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封闭状态。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学习国外经济理论、国外科学技术，对于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在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过程中，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经验和技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以中国与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合作来具体说明这一点。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提出了许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1985 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与可选方案，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也提出了许多体制上的改革建议。方案中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后来都通过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得到了很好解决。但是在当时是颇受争议的，其中提出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我认为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当时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的种种弊端以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举措，提出了几个基础性的建议。我还记得有两个重大的经济政策概念，在今天的形势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第二个是软预算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一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距离，这是体制改革和开放技术引进带来的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但下一阶段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在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和提升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一个新的格局。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为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认为仍然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仍需要有进一步的突破，并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要打破过去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包括银行系统普遍的软预算约束，改革难度还是很大的。改革初期常说的打破“大锅饭”，用经济概念来讲就是破除软预算约束的问题。从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来看，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在宏观，都应打破软预算约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在鼓励良性竞争以及在有退出机制的领域普遍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和效果。

举例来说，在现有条件下，许多地方政府名义债务不高，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包括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在国有企业方面，即使在竞争性领域，政府兜底、

财政买单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所以要打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银行部门的软预算约束，破除民营资本背后一道道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这本身就是释放改革红利的手段，并且能够切实提高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广东考察，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发出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努力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号召。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改革开放中“香港模式”的作用

■ 赵晓斌 /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赵晓斌

首先实际上“二战”以后香港启动了所谓的“香港模式”。香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做的项目正好是后来珠江三角洲做的，也是中国现在很多地方还在做的出口加工。这种以贸易为导向的大规模工业化，带来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变。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香港整整走过 40 年的工业化时期，也是 40 年高速增长时期。在这个时期，香港的工业就业率高达 50%，产值就更不用说了。从 90 年代开始，香港产业开始向珠三角外移，产生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前店后厂”，香港制造在整个珠三角区域非常普遍。从这个模式来说，实际上香港是全球化最早先驱、实践者。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概念应该是从 80 年代开始的，而香港 50 年代就开始了。当然包括亚洲四小龙，这个模式成功才使得 80 年代大规模地出口、贸易加工业发展。实际上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模式。中国经济就是从这个模式开始成长发展的。

其次，香港对中国内地的支持以及内地向香港的学习。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土地财政模式，内地的土地财政模式完全是从香港学的。到目前为止，内地的土地财政也高不过香港。但香港有 52% 的人口住在公共房屋和公

共资助房屋，香港拍卖土地的每一分钱都要进入到土地基金，从土地来的每一分钱一定要回到土地，每一分钱的应用都得要立法会的批准，这也是一个香港模式。

中国内地改革开发 40 年的高速发展确实参考了香港模式。有一段时间百分之七八十的境外投资都是从香港来的，现在中国内地的境外投资的 60% 还是从香港过来的。香港服务于祖国，这是很好的。香港模式是一个全球化的模式，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离不开这个模式。

香港的路径、香港的模式，香港今后在中国内地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尤其在新全球化中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机构、体制开放，香港应该说是做得很好，甚至是在世界上也是做得很好的。新的全球化要新的规则。首先要成为规则的典范，大家才会跟你来往，这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做的。中国改革也要往这个方向迈进，香港在规则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我们再想一想，全球的经济载体是谁做的？是企业做的。企业参与全球化的精髓在哪里？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而香港就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包括监管、规则等等，很多东西都是如此。香港的监管部门与实体经济、企业之间是相对独立的，这是其根本的体制。中国内地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未来要做的事，实际上很多内地改革要做的事，香港都有现成的模板，比如银行治理的监管、股市、证券，直接学就行了。但其实香港还有更大的作用，香港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引领新全球化的大使。展望未来，香港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 带来新型全球化的机会

■ 达莱马 / 意大利前总理



达莱马

程中抓住机遇发挥了自身发展潜力，比如中国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但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怎么从全球化中受益或者受益不多。

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的影响就不明显。当然对金融界精英来说，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机会，所以他们积极拥抱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上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增长幅度远远高于贫困人群，造成了贫富差距加大、文化冲突增加、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全球化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在全球经济增长的时候，矛盾虽然存在但并不明显，当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时候，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就凸显了。

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企业会选择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办厂。这些会影响所在国的税收，也会影响收入的分配。对于欧洲一些国家的公共预算来说，再去支持养老金、支持福利制度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个制度现在已经被破坏了，已经对全球资本流动造成影响。如果人们心中有恐惧，有痛苦，有一些人就会对全球化采取敌对态度，他们要求关闭国家的边界，不仅对移民关闭，而且也不让外国进口本国商品。有一些理论家说，现在欧洲的政治场景更多是进步者和保守者之间的冲突，是全球化和国家主权主义的冲突，这可能会造成欧洲政治平衡的严重内部分化。

我坚信这种带着冲突的国家主权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我们的出路，因为现在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而且很多社会问题也在加剧。有一些人说，我们相信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正在酝酿的危机，不能忽视这种危机可能带来的倒退风险。无监管的全球化已经不可持续了，我们必须采取政治行动，才能让世界的体系转向更和谐的全球化。

我们不可能从自私的保护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中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些政治上的指导意见，不能把所有决定权都交给市场，同时我们也要保护社会当中最弱势的群体。

“一带一路”倡议发布五年了，这一倡议改变着全球的现状，同时也在促进经济的复苏及发展。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同时给地缘政治平衡带来了极大的转变。

“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广泛支持，而且受益者众多，但也不乏怀疑和反对者。比如美国政府把中国看成对手，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提高关税来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可以投资、可以取得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他们又担心中国可能会借此加强在欧洲的影响力，影响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平衡。美国不仅对中国保持敌对态度，对欧洲也是如此。我希望中欧峰会的召开能够带来中欧关系的改善。

谈及全球化议题，首先要了解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源头是什么。不仅美国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欧洲国家也有。全球化便捷的信息交流和密切的国际合作，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和繁荣。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进

IFF 峰会 (2)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新型全球化的机会

达莱马，意大利前总理

77

丝路国际联盟 (SRIA) 之未来五大工作重点

马儒沛，中国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79

中巴经济走廊促进中亚经济合作

阿什法克·哈桑·汗，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82

“一带一路”给尼日利亚带来机遇

Shakirudeen Adewale Oloko, 尼日利亚总领事

84

对“一带一路”新阶段新机制的展望

史育龙，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

86

中吉经贸往来新展望

Maksat Ishenbekovich Tentimishov, 吉尔吉斯斯坦总领事

88



这些目标看起来可能过于宏大，也许解决不了当前的冲突，我们需要一些现实的策略，才能有真正的合作。眼光长远的人会重视改善中欧关系的质量，“一带一路”项目能够促进欧亚大陆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也会不可避免地让非洲受益。

我相信“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会，怎样才能让怀疑和敌对主义情绪不再蔓延，怎样才能让合作的精神成为主流？如果中国可以做出有效的决定，我相信这种怀疑和不确定性是可以克服的。做出决定的速度越快，达到目标的速度就越快。欧洲必须把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看作是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关键词包括互惠、合作，而不是一种留给政治家决定的单边主义政策。

最后，中欧必须加大对话和合作力度，尤其是政府以及文化层面上的对话，这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消除公众的误解。我坚信“一带一路”倡议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所以从最开始我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一倡议。意大利和中国的往来源远流长，13世纪，17岁的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启程，和他的父亲、叔叔一起前往中国，他们穿过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经过长达四年的漫长跋涉，终于见到了忽必烈大汗，在中国侨居17年后又回到欧洲。古代丝绸之路有欧洲，现在的丝绸之路也有欧洲，

欧洲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意大利也必须勇于担当自己的角色。中意两国代表两种伟大的文明，双方互相了解、尊重已经有千年历史，现在我们应该比过去更加友好不断加强交流合作。

丝路国际联盟 (SRIA) 之未来五大工作重点

■ 马儒沛 / 中国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马儒沛

2016年在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13届全球年会上，IFF 联合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的力量，邀请“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前政要、专家学者，经济金融机构领袖共同发起成立了丝路国际联盟 (SRIA)。SRIA 的成立对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注入新的活力，增添新的动力。两年多来，SRIA 积极开展务实合作，重点打造金融优势，影响力与日俱增。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及全球化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丝路国际联盟何去何从，使命担当尤其重要，我们任重道远。

20世纪后半期，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快速发展，价值链理论广泛传播，经济全球化呈现出爆发式发展，主要表现为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以及劳务的全球化。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极大促进了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在于，建立了高效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国际利益融合，加快了世界多级化发展的趋势，促进了国际组织发展，重塑了全球治理体系。

然而，这一传统的经济全球化也存在弊端，主要

是利益分配不平衡，一些发达国家主导传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然而又没有很好地处理一国主权与全球公共利益的关系。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放缓，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在美国优先思想的影响下，贸易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缺少全球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的顶层设计。逆全球化虽然带有地域性、周期性和阶段性特点，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虽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我们坚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我们高兴地看到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如亚太地区顺应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顺应各国人民携手应对挑战的共同需要，坚持开放与合作，已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亚太经济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

多边贸易体制给各国带来共同的机遇，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坚持走新全球化之路是正确的选择，中国等新型经济体为新全球化的推动做出了贡献，从而使新全球化的特征初见端倪。我认为这就是坚持平等合作、实现各国利益互利共赢。坚持与时俱进，提高全球贸易投资的包容度；坚持创新驱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坚持平衡发展，塑造多元货币格局；坚持包容开放，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新全球化未来之路，对丝路国际联盟工作提出新要求，我从具体工作层面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丝路国际联盟要以金融优势为先入，抓住绿色、普惠、诚信三大重点，发挥金融资本雄厚、技术通道先进、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特点，为新全球化推动出力献策。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践行正能量，产生正效应，闯出正路子，总结好经验。

第二, 丝路国际联盟要以金融助推为先导, 抓住产业、贸易、基础设施三大领域, 引导和影响国际金融机构, 按照五通原则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输入金融血液, 增添金融动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 30 亿, 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 沿线国家在多边和双边交流中秉承和平友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 充分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愿望。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 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但是该地区交通不够便利, 自然环境较差, 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经济圈存在较大的差距, 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

如何助推丝路经济带健康持续发展, 我认为丝路国际联盟要充分彰显金融优势的先导作用, 用好金融杠杆, 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健康发展, 特别是针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 引发国际产业格局和经贸关系的变化。金融资本应该在新旧动能相互转换的市场大海中, 找到用武之地。要用金融的力量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当务之急应积极鼓励、全面影响和大力支持国际金融机构, 加大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产业、贸易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 加大金融合作, 加快货币流通, 加快区域内本币结算, 推进货币互换, 在推进项目对接上再下工夫。在推动区域内产业、贸易、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上上下功夫。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三部曲上下重功夫。

第三, 丝路国际联盟要以深度融合为先, 引导影响国际机构, 为丝绸之路经济社会发展增添金融资本含金量, 增加金融杠杆的撬动力, 增强金融手段创新力。当前重要任务是面临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 这些技术创新使地球变小了, 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 追求利益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 地区、行业之间的繁荣与衰落对比鲜明, 资本和国界矛盾凸显,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进程, 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问題, 略显突出。

我们必须回答如何在区域内建立科学完备、包容

公正的金融环境问题, 如何在区域内加强金融制度体系化问题, 如何在区域内创新金融服务产品的问题, 如何在区域内制定金融安全法律法规的问题, 如何通过金融助力推动经济全球化, 创造平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解决好上述问题, 就能把握好金融的规律, 发挥好金融的活力, 运用好金融的动力, 服务好实体经济,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深度融合。

第四, 丝路国际联盟要以人才资源为先行, 抓住华侨、华人、海外留学生三大资源, 引导和影响国际金融机构, 在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金融业态催生经济质量提升上, 发挥好三大资源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华侨、华人、海外留学生是中国独特重要的人才资源优势。据有关部门统计, 中国海外华侨华人超过五千多万, 分布五大洲 198 个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 66 个国家有四千多万。2017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 60 万大关, 这三

大资源具有很大的能量和优势。他们熟悉驻在国国情, 对驻在国资源禀赋、法律法规、人文历史、经济社会发展都比较了解, 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为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发挥重要的作用, 拥有广泛的政商人脉, 拥有驻在国良好的沟通渠

道, 拥有良好的产业实力和社会网络, 拥有民间优势。这一群体的重要作用一旦得到最大化发挥, 产生出的正能量是不能低估的, 可以为金融疏通连接实体经济的经络, 为金融反馈投融资状况的社情民意, 为金融探寻产品项目落地生根的渠道, 为金融创造财富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 为金融服务丝路经济发挥人才智库作用。

第五, 丝路国际联盟要以创新开放为先机, 抓住三大变革。这三大变革: 一是新全球化发展, 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 要以开放的胸怀、创新的姿态, 组织引导国际金融机构, 积极主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重组、资源整合, 开发联合体, 始终把握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丝路产业的有效模式, 拓展金融与

丝路国际联盟要以人才资源为先行, 抓住华侨、华人、海外留学生三大资源, 引导和影响国际金融机构, 在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金融业态催生经济质量提升上, 发挥好三大资源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实体经济融合的成功方式。要始终把信用建设、诚信金融摆在国际产能合作的前端, 体现以人民为本、以丝路为先的理念, 打造更具专业、便利、高效、绿色、一流的金融服务。要始终把激发丝路产业新活力、共创开放共赢新格局作为工作的落脚点, 为努力打造更安全、更公平、更繁荣的丝路经济建言献策, 贡献丝路智慧、丝路方案, 为丝路经济向前迈进注入持久的动力。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习近平主席连续出席四大主场外交活动, 深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增添中国动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这一思想的有力佐证, 体现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决策。来自全球 15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17 家企业参展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成交意向 47.2 亿美元。尽管未来在“一带一路”进程中, 我们还会遇到考验, 面临大风大浪的严峻挑战, 但是新全球化未来之路必定是前途光明的。

中巴经济走廊 促进中亚经济合作

■ 阿什法克·哈桑·汗 / 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阿什法克·哈桑·汗

2018 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布五周年，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化已经受到挑战，最近几年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很多西方国家都受其影响。

这种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可能伤害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事实，所以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引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这种新型全球化的基础是各方面的连通。要理解“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就要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认为，一方的繁荣离不开邻里的繁荣，不能靠剥夺别人的财富让自己富裕，所以“一带一路”倡导与人为善，共同繁荣。

过去的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差距加大、民粹主义情绪泛滥等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 - 巴基斯坦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

议中六条经济走廊之一，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旗舰项目，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石。中巴经济走廊是双边项目，将有力推动巴基斯坦经济转型，促进其在 15 ~ 20 年间从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中巴经济走廊涵盖的合作项目范围广泛，不仅包括能源以及公路、高速公路、海港、机场、通讯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包括几个经济特区。

其实中国有一大地区和巴基斯坦毗邻，经过巴基斯坦海岸线和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将会缩短中国将货物运送到西方国家的距离和时间，差不多可以缩短 80% 的距离和减少 75% 的时间。这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意义，也是瓜达尔港的重要意义。

今天，瓜达尔港有能力处理 100 万吨的货物，到 2030 年瓜达尔港完全投入运营之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之一，有能力处理超过四五亿吨的货物。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瓜达尔港投入运营后将会带来多少蓬勃的经济活动。

中巴经济走廊还可以有效促进包括阿富汗、阿塞拜疆、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中亚经济合作。可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促进中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便利化，运用能源贸易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让阿富汗也参与进来。

我们相信中巴经济走廊将有助于巴基斯坦发展基础设施、消除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缓解能源危机，以及引领推动巴基斯坦工业化进程。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立的 9 个经济特区，将促进巴基斯坦产业发展，在这里建设的采矿、采石、能源等企业将会创造出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加强地区间的连通，这些都是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将会做出的贡献。现在巴基斯坦已经可以看到“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好处。

中巴经济走廊不只是一个双边项目，更不只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项目，它是一个富有宏



伟愿景的重大项目。该项目起初的五年以巴基斯坦为重点，而在接下来的五年至十年当中，中巴经济走廊将发挥它在地区当中的作用，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

中巴经济走廊还可以有效促进包括阿富汗、阿塞拜疆、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中亚经济合作。可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促进中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便利化，运用能源贸易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让阿富汗也参与进来。阿富汗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瓜达尔港建成之后如果成为它的出海口，对于阿富汗来说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伊朗的领导人也表示希望加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目前伊朗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了 600 亿美元，主要是天然气和石油。伊朗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在未来五到七年，使伊朗与中国的贸易额翻十倍达到 6000 亿美元左右。伊朗相信借助中巴经济走廊的力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瓜达尔港可以使伊朗充分发挥其优势。未来土耳其、俄罗斯也可能加入，所以中巴经济走廊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

“一带一路”给 尼日利亚带来机遇

■ Shakirudeen Adewale Oloko / 尼日利亚总领事



Shakirudeen Adewale Oloko

五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给沿线国家带来了许多发展机遇。尼日利亚是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国家之一，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悠久。“一带一路”对于非洲、对于尼日利亚来说，都是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策略。为什么这么讲呢？40年前，中国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还非常巨大，而改革开放政策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成功脱贫，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政策引领和推动了中国快速发展，我认为“一带一路”也是能给非洲和尼日利亚带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和策略。

在非洲，对于全球化确实存在争议，因为我们很清醒地认识到是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但

非洲所需要的贸易和援助，只有参与全球化才能获得并发展。我们希望“一带一路”能给全球化相关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突破。当我们讨论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时，会有一种焦虑，担心全球化的弊端会渗入“一带一路”，从而导致“一带一路”也会出现传统全球化的问题。比如，伴随“一带一路”而来的金融和人才支持，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债务陷阱？帮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各种授信支持，我们到底有没有偿还能力？我们不能把未来用作抵押。

邓小平先生说过，无论是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一带一路”是真正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和实惠的发展策略，我觉得就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正确策略。前几个月，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先生曾到访北京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在尼日利亚，中国承建的铁路正在修建，并将不断延伸，直到东南西北的偏僻区域。中国进出口银行

邓小平先生说过，无论是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一带一路”是真正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和实惠的发展策略，我觉得就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正确策略。前几个月，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先生曾到访北京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在尼日利亚，中国承建的铁路正在修建，并将不断延伸，直到东南西北的偏僻区域。

为水电站建设提供资金，并积极探索合作方式。这些都是“一带一路”给尼日利亚带来的发展项目。虽然尼日利亚与中国相距几千公里，但是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取得的进步，展望未来五年的发展。我希望“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时候，大家都能给予积极的评价，庆祝“一带一路”带来的共同发展，并能够非常骄傲地回顾我们所做的一切。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就是中国决策者需



要认真对待“一带一路”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非洲国家希望基建项目能尽可能多地本土化，希望“一带一路”能把新的技术带到非洲来，在当地创造就业。非洲人民只有亲眼看到收入提高了、就业机会增加了、自己的生活真正改善了，才会由衷地支持“一带一路”策略。这样也才能避免出现债务陷阱问题。

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到中国，保持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平衡才会有共同的发展。

谈及“一带一路”的前景，我们还要注意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社会、文化也各有不同，在落地相关项目时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因地制宜。

国际金融投资肯定是要有回报的，在非洲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结合当地国家的愿景，要多宣传、多沟通、多交流，才会有合作、投入以及发展、增长，才能真正实现共享和共同发展进步。

对“一带一路” 新阶段新机制的展望

■ 史育龙 /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



史育龙

过去五年全球贸易处于低迷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仍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和沿线国家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增长速度。在对外贸易中,中国进口增长速度又显著高于出口增长速度,可见过去五年中国对外贸易突出特点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快速增长,尤其是从沿线国家的进口快速增长。2018 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整体增长速度是 9.9%,和沿线国家贸易增长速度达到 13.2%。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达成将近 600 亿美元的成交意向,未来五年中国进口将超过 10 亿美元,既包括产品也包括服务。如此巨大的进口总规模,未来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也会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以投资为例,过去五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超过 700 亿美元,2017 年达到了 144 亿美元,2018 年前三季度已经超过 100 亿美元,这些投资也正在转化为沿线国家实实在在的项目,转化为这些国家新的就业机会。因此面对西方的一些质疑和关切的时候,有不少沿线国家的领导人、学者、媒体

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一带一路”好不好应该由沿线国家、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说了算,也就是说鞋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

在“一带一路”取得成效的同时,现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的一些媒体、学界、政界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面对这些声音,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保护主义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在当今世界,即便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是经济全球化整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为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研究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必须讨论开放合作。只有进一步开放合作,才能克服上一轮全球化所带来的不足,才能更好地促进共同发展。退回封闭、保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仅解决不了已经存在的问题,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存在的问题。

具体来说,一是不能固守已有的标准规则,不能一味坚持自己一方的标准和规则。比如说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我们注意到欧盟的一些机构,坚持欧盟的标准、欧盟的规则,但这些项目是两方、三方甚至更多方开展的合作项目。如果说一方坚持自己的规则和标准是不可动摇的,是不可讨论、不可商量的,那么结果必然是影响项目的进展。

二是相互调试,彼此适应,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有利于让项目顺利推进,尽早造福沿线国家和地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地方和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去五年,欧美不少企业已经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企业从合作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未来,有关政府和国家要鼓励支持地方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大力度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而不是像现在看到的,个别国家和政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对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围堵、对抗的做法,这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

第二,未来我们要谋划“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制,



需要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共同完善共建“一带一路”的长效机制。

在“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面向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长效机制,我有几点想法。

首先要探索可持续、风险可控的融资机制。这里除了现有的以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为主力的融资保障机制以外,要更多吸引商业金融,吸引其他社会资本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探索吸引多边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方式。

我们在建立完善融资机制的同时,要强化风险防控机制,风险防控机制不是哪一方的责任,是相关各方共同的责任。在风险防控方面,所有参与方,无论是出资方、出技术方,还是项目的东道方,都有共同的责任。风险防控方面,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建立起切实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

未来在推进“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过程中,要充分对接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把绿色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使得“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能够更好地促进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使“一带一路”建设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要运用现在的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把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放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为沿线国家提供适合本国国情、发挥当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先进适用的技术,能够更好地引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中吉经贸往来 新展望

■ Maksat Ishenbekovich Tentimishov / 吉尔吉斯斯坦总领事



Maksat Ishenbekovich Tentimishov

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始于古代，古代丝绸之路跨过吉尔吉斯斯坦，促进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也促进了两国人民文化上的交流。我非常高兴地了解到，我们两国在文化上、历史有不少联系，比如据说唐代中国著名诗人李白，他出生在古代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一座城市（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

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一直是友好邻邦，两个国家一直以来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一直保持外交关系的健康发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2018 年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间领导层的交流以及睦邻友好关系。在访华期间，我们总统描绘了未来双方关系发展的良好路径。

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中，每年有两次高层访问。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和主要的投资国之一。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有很多投资项目，包括基建、能源、矿产等等。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资金来源国，所以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油气管道、高速公路，尤其是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项目都已经开展建设。

丝路经济带是习主席提出来的，后来演变为“一带一路”倡议。吉尔吉斯斯坦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对于这个倡议的回应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它给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会，我们对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推进区域一体化非常有信心，这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坚信中吉之间的合作会越来越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中吉两国的经济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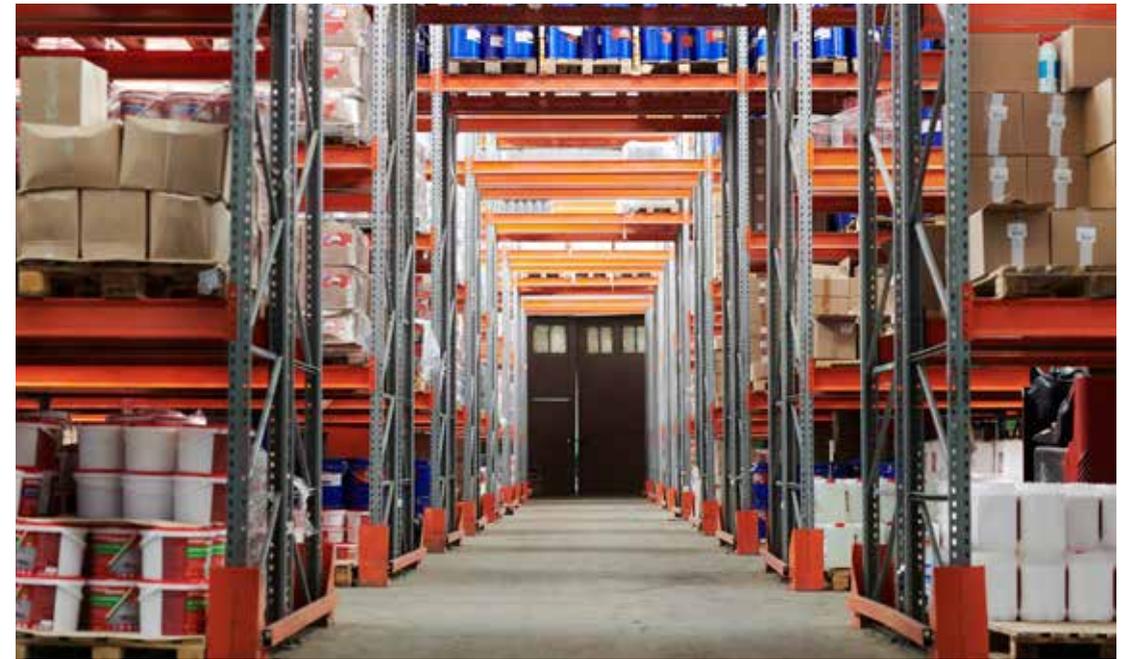
互补的作用，中国有资金、有技术，而吉尔吉斯斯坦有资源，而且两国的合作基础非常好，可以进一步发展。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过去一年，在“一带一路”峰会上，热恩别科夫总统宣布要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中欧之间的物流中心，这将会加强中亚、

非洲之间的联系，包括交通网络建设。铁路的修建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和和中亚之间的联系。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希望中吉两国继续发展这些项目，并将其纳入“一带一路”框架。吉尔吉斯斯坦非常重视这些项目，正在大力将其推向前进。

建立水电站和生产清洁能源，也是“一带一路”合作当中的重点项目。吉尔吉斯斯坦有着丰富的水力

我坚信中吉之间的合作会越来越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中吉两国的经济有着互补的作用，中国有资金、有技术，而吉尔吉斯斯坦有资源，而且两国的合作基础非常好，可以进一步发展。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发电潜力，有 1500 亿的水电发展产能，现在利用率只有 10%，吉尔吉斯斯坦希望可以增加电力出口。现在中亚地区的国家也在不断地推广各种项目，将电力出口到巴基斯坦等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开始着手实施这些项目。输电项目方面，已经建起了电网，连接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输电网项目预计将在 2021 年完工。

我们的水力发电量有剩余，我们会进行出口。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可以支持我们建水电站，满足出口的需求。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只有 600 万人口，但是却拥有着 1.8 亿的大市场。因为吉尔吉斯斯坦处于欧亚大陆中间，罗马尼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自由经济区，没有关税。中国的企业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就可以有机会进入亚欧经济联盟。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欢迎中国的投资者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既满足中国产品的市场需求，而且可以供应整个欧亚市场。吉尔吉斯斯坦可以提供优越的投资条件，包括劳动力和土地等等。

我期望，中吉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将会变得更紧密、更高效，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关于金融科技、生态环境及金融改革的思考

■ 韩升洙 / 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我分享一下关于金融科技、生态环境以及金融改革的思考。有两个报告值得重视，一个是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学院发布的2018年金融科技指数，另一个是毕马威发布的2018年100位领导全球金融科技的创新者。毕马威报告显示，全球排名前五位的金融科技中，来自中国的科技公司有三个，其中蚂蚁金服第一，京东第二，百度第四。浙江大学的互联网金融学院发布的指数显示，由上海、杭州、南京组成的长三角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科技中心，领先美国硅谷。

从根本上来讲，金融科技的特征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创业公司对金融行业的渗透。因此，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在主体方面和创业的生态系统是相似的。根据研究者的立场不同，影响生态系统的主体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我看来，我更倾向于从IT行业、人口、政府、大型企业、初创企业、加速器、孵化器、私人投资者、大学和研究机构等方面来研究金融科技生态系统。金融科技是IT和金融行业的一个混合体，这意味着如果没有IT的话就没有金融科技。因此，IT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成熟是金融科技产业兴起的最基本的前提

之一。

在这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和金融技术的采纳是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根据美国研究的数据，2016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是34亿，同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是46%，一年之内增长了10%以上。2017年北美、欧洲和部分亚太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也是很高的。韩国的普及率是最高的，达到了96%。其次是美国89%，英国88%，日本76%，中国71%和印度25%。智能手机渗透率最高的是韩国94%，其次是美国77%，英国72%，中国68%，印度22%。根据2017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金融科技的采纳率定义为金融科技用户在数字活跃人口中的占比。中国网民的比例最高为69%，其次是印度为52%，第三是英国42%，然后是美国33%，韩国32%，日本14%。结合智能手机普及率和金融科技的普及率，我估算了主要国家和金融科技密切相关的人口比例，表明中国是最高的。2016年利用金融科技的人占中国总人口的47%，其次是韩国、英国、澳大利亚，各占30%。2016年有25%的美国人人和11%的印度人使用金融科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融部门出现了连续创新，包括20世纪60年代信用卡的出现，70年代和80年代ATM等终端的出现，在90年代债券和资本市场放松管制之后新的金融产品出现等等。然而，随着2007年苹果iphone的出现，也就是十年以前，智能手机开始影响人们的融资方式。人们从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向更加直接的融资方式转变，这种方式往往涉及各种中介机构，导致成本的增加和效率的降低。

我们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就是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传统银行业的声誉日益受到质疑，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在加快。如今，传统银行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金融科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对银行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994年预言了银行的命运，他说银行业是必要的，而银行不是。

IFF 峰会 (3)

关于金融科技、生态环境及金融改革的思考	91
韩升洙,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金融科技的全球影响及治理	93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西班牙对外银行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探索	96
夏乐, 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 (BBVA) 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金融科技的三个观点	97
杨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	
关于征信领域改革发展的三点思考	99
唐磊,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处长、百行征信有限公司顾问	

事实上，在智能手机出现的十年内，银行正面临着自 15 世纪末意大利北部的锡耶纳银行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威胁，我必须把这种现象称为第一场金融革命。我敢肯定，随着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进一步的发展，第二场金融革命可能会随之而来。

随着中国近一半的人口在使用金融科技，中国在这个领域正在逐渐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和监管机构在早期的新监管中，支持了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利用现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国的金融科技服务不断发展，比如几个关键领域：非银行数字提供商的第三方支付，P2P 贷款，包括小额贷款在内的互联网信贷，基于互联网的银行和保险，数字财富管理 and 信用评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大型金融科技企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市场，进入了金融供应链领域，构建了将客户和企业联系在一起综合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很薄弱，信任文化也比较低，当时信用卡的渗透率低于 10%。大约 10 年前，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 1%，但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升至 40% 以上。电子商务在中国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目前是 15%，美国只有 10%。

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 2004 年推出了支付宝，吸引了很多的金融客户，它是一种安全可靠的电子支付服务。旨在缓解消费者对金融的不信任，阿里巴巴利用贷款服务，通过结算存款作为电子商务信用担保，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由此，智能手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范式。这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由于货币市场利率超过央行控制的存款利率，2013 年阿里巴巴推出了基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余额宝，推动了金融市场的竞争。电子商务公司能够凭借长期积累的海量客户数据，在市场上占据优势。自余额宝成功以来，IT 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了金融的各个领域。

传统金融行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同时也面临着金融科技行业的挑战，金融科技行业正在迅速地颠覆着现有的银行业传统。银行面临着创新的金融科技和区块链技术的挑战，这两项技术通过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以更低成本、更快效率进行货币兑换，开始对传统银行业服务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金融科技对市场效率、包容性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监管都带来潜在的利益，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提高效率。它还促进获得金融服务提高监督管理的有效

性，鼓励有潜力的新商业模式创造者进入金融行业，并有利于为大多数用户提供友好和廉价的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可以通过加强金融发展和包容性，来支持潜在的增长和消除贫困。金融科技可以通过增强互惠性和普惠性，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和中小企业以负担得起的成本跨越式地获得金融服务。

但是这种快速的发展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中国在线支付服务提供商在影子银行系统中运营，他们从银行汇集现金，投资于银行间小额贷款，从而实现期货转换，实际的资金流动很难监测，因为它超出了监管和监督的范围。

目前金融市场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短期内要保持稳定抵御潜在的外部冲击，同时需要在中期内提供新的增长来源。在此背景下，政策应该在促进数字创新和应对金融领域风险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科技的全部潜力，监管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监管框架尤其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金融环境，以便保持对金融体系的信任。监管应该确保与金融科技相关的潜在风险得到有效的监控，并以不会过度抑制创新的方式加以应对。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的反应需要与潜在风险成比例。

此外，监管范围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法律框架需要与时俱进，以确保面对新风险时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及透明度和隐私之间的平衡得到适当的调整。金融科技也能让监管者受益，金融科技可以支持和促进法律的遵从性。比如说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快识别可疑活动，生物识别和元数据可以帮助验证所有者的身份。作为加密资产基础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用来改善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同样，监管者可以利用金融科技来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有效性。由于每个国家经济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政策的优先次序可能也不同，但是考虑到这些技术固有的全球影响区域和国际合作，将是制定有效政策反映的关键。

金融科技的全球影响及治理

■ 李东荣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李东荣

近年来，世界各国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对金融科技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最初的审慎观察逐步变得更加积极包容。同时也更加重视金融监管如何及时跟进适应的问题。

目前，金融科技已经日益成为各国各地区金融竞争合作和金融资源布局的焦点领域。以下就金融科技的全球影响及其治理谈几点个人的思考和体会。

首先，金融科技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金融科技作为以现代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正不断地影响着金融功能的实现形式和金融市场的组织模式，展现了深刻变革金融业的潜力。站在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我认为金融科技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促进全球金融业转型升级。

人类金融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伴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的历史。比如冶炼、造纸和印刷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使得货币流通从最原始的实物货币逐渐向金属货币、信用货币转变。从而提高了货币流通的速度、规模和便利性。近代社会电报、电话等通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跨区、跨地域的资源配置。尤

其是 20 世纪的后半叶，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传统手工操作的金融业实现全面革新和升级换代提供了根本支持。而在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的今天，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取得突破，又为金融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提供了更加优异的技术条件。

二是有助于促进全球普惠金融发展。

经过各个国家多年的探索实践，全球的普惠金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传统服务模式和技术条件的环境下，普惠金融面临的成本高、效率低、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共性难题依然是个难以逾越的屏障，短期内还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约有 17 亿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全球发展中国家受信贷约束的中小微企业达 6500 多万家，占中小微企业总数的 40%，而融资的总缺口超过 5 万亿美元，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状况。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数字技术在一些国家普惠金融领域的尝试应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解决上述难题方面开始取得一些突破。中国、肯尼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移动支付、网络借贷、网络保险、网络理财等金融创新应用，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高了效率。这些普惠金融的实践证明，依托金融科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可以帮助受惠主体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成本可负担性，以及供需的可匹配性。从而为破解全球普惠金融的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较可行的思路。

三是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

从更加宏观和系统的层次去理解金融科技，我认为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科技创新对金融的驱动作用，还体现在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业所具有的资金筹集风险管理等功能，它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融资服务，并分散科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其次，金融业作为知

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它本身就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从全球来看，金融业都是信息科技成果大规模应用的最主要用户。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金融电子化乃至金融信息化，正是使中国的金融业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所以金融科技的发展为其他产业领域提供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科技应用示范。从这个方面讲，金融科技能够促进金融、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强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其次，金融科技给国际金融治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金融科技作为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型模式，还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站在全球金融治理的角度，我认为应该高度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数字鸿沟挑战。

当前，世界各国信息化建设水平不同，网络的终端普及率和居民素质能力差异明显。不同国家的网络、网民的情况，网络的基本设施情况都展现了一些差异。根据世界银行《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近 20 亿人没有手机，近 60% 的人没有互联网连接。即使有互联网的地方，互联网的使用普及率也有明显的差异。各国国内的数字鸿沟可能与各国之间的差距是一样大的。数字鸿沟的存在将导致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从金融科技发展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而面对数字科技创新应用带来的风险，不同群体的承受能力和防御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到。

二是监管套利挑战。

不同国家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环境有所不同，金融风险判断和管控的能力也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在金融发展优先的政策导向下，可能会引发监管竞次的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打着金融科技创新旗号的机构，从强监管的国家地区迁往相对宽松的监管洼地。中国的金融实践中也存在监管洼地效应问题，就是说一个地方监管严了，可能就往监管稍微松一点的另一个地方转移。所以我们认为，在资本技术人才流动更加频繁和便捷的今天，金融科技跨境监管套利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三是风险外溢挑战。

随着全球各国金融市场开放性和金融基础设施连通性的不断增加，金融科技可能会带来业务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的叠加效应。从而使得金融的风险外溢得更快，波及面更广。而且风险外溢与数字鸿沟、监管套利三者还可能相互交织，形成更加复杂的风险结构，这会提升金融风险全球治理的难度。

最后，共同推动全球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金融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上述机遇和挑战。在态度上积极拥抱，在行动上则审慎稳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趋利避害，共同推动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更充分、更安全地实现其经济社会价值，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一是倡导国际基本共识。

根据这些年来各国的观察和探索，国际社会对金融科技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首先，金融科技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应该通过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的直销和普惠水平，将小微企业、三农、贫困人口以

**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金融科技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
市场空间，我们期盼各国金融监管部门、
从业机构、行业自律组织以及学术研究
团体的同仁们加强沟通，共同努力推动
全球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在建立现
代金融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
进普惠金融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适当的方式纳入经济金融体系。其次，金融科技应该是负责任的创新，应该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和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促进金融机构履职尽责。再次，金融科技应该具备可持续性的创新，因为金融业是一个长周期的行业，金融科技的发展不能够只是关注技术应用的

短期效应，而忽视金融风险发生的滞后性。

二是促进各国特色发展。

条条大路通罗马，发展金融科技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最佳模式。各国应该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明确自身的优势、资源禀赋和目标诉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金融科技。不必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颠覆式技术和模式创新。比如在智能手机并不普及且缺少高速移动网络的条件下，非洲肯尼亚通过手机短信来发展移动普惠金融服务是非常务实的，效果也是好的。而中国由于有一个很广阔且有深度的市场，可以通过发挥市场规模和技术应用的优势，在移动支付、互联网借贷、在线供应链金融、金融精准扶贫等



方面进行大量的实践探索，目前也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英国、新加坡等国家注重监管制度的创新，通过监管、创新加速器等方式，为金融科技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是加强国际监管协调。

可以依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平台，加强对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评估与风险监测，统筹解决跨境监管竞次和监管套利的问题。同时应该深化各个国家金融监管的合作，探索建立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制度的融合。从而不断地提升各国金融科技跨境监管的能力和合作水平。

四是开展多元的交流合作。

积极通过国际论坛、国际培训和同业学习等方式，交流推介金融科技发展的典型经验和良好实践，加强政、产、学、研等多层次的交流，鼓励各国具备条件的机构按照市场化和可持续的原则，通过联合实验室、合作研发中心、行业自律组织民间交流等多种形式拓宽各国金融科技合作的渠道。使国际交流合作、信息共享能够更加普及，更加针对有效。

五是推进国际标准建设。

这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通用语言，同时也是很好的转换工具。可以考虑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总体框架下，以金融基础设施的联通、金融消

费者的保护、金融科技风险的防控为切入点，通过现行国际标准等同采用、双多边标准互通互认、先进标准输出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各国金融科技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金融科技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市场空间，我们期盼各国金融监管部门、从业机构、行业自律组织以及学术团体的同仁们加强沟通，共同努力推动全球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在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普惠金融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西班牙对外银行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探索

■ 夏乐 / 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

目前传统银行受到新金融科技浪潮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我所在的西班牙对外银行面对新金融技术的快速发展，主动寻求自己的数字化转型，以期能够争取在未来与新金融公司、互联网巨头形成一个共存的局面。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金融会继续存在，但是银行可能不会继续存在了。作为一家银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力在未来的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做数字化转型中的小插曲、小事件。2018 年 4 月，西班牙对外银行发行了第一个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国际银团贷款（银团贷款亦称“辛迪加贷款”，是由获准经营贷款业务的一家或数家银行牵头，多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参加而组成的银行集团，采用同一贷款协议并按商定的期限和条件，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融资的贷款方式）。这是西班牙对外银行和其他银行联合发行的，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贷款。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区块链技术呢？因为区块链技术允许多方同时在同一个区块链上进行操作，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以前银团贷款要分成不同的工作模块，一个工作模块做完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工作模块。采

用区块链技术后，参加银团贷款业务的多家银行可以同时在这个区块链上进行合作。这个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国际银团贷款项目的完成周期，保守估计比传统银团贷款项目节省了 60% ~ 70% 的时间。因为这是西班牙对外银行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国际银团贷款，所以还有较大进一步提高效率的空间。

欧盟现在有一个监管法案叫做 PSD2（支付服务修订法案第二版），PSD2 要求银行在 2019 年 9 月之前，要对其所有的支付接口以及所有的银行整合数据，在欧盟区进行开放。这就给欧盟区内的所有银行带来了一个挑战，也就是说，你的数据未来要和你的竞争对手共享。我们西班牙对外银行当然也必须服从 PSD2 的相关监管要求。于是西班牙对外银行自己开发了一个网上的 API 市场，这个 API 市场大概有 60 多个应用。如果大家有好的想法，可以与我们进行合作。你提供商业建议，然后来到我们的 API 市场，告诉我们你想做什么。在符合监管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就把我们的客户数据拿出来跟你分享，你可以自己去做，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一起合作，毕竟我们有很大的客户群。在美国，西班牙对外银行也在开发 API 市场，但应用相对少一点，大约有十几个。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对于金融的监管，美国其实要比欧洲宽松。

通过开发 API 市场，我们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讲，监管可以通过对银行提出要求促进金融的发展。随着 PSD2 之类政策的推出，银行业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开放银行。开放银行实际上是一个基于 API 的系统，旨在共享开发金融产品和服务所需的金融信息。未来银行将与金融公司共享数据，也就是银行的用户也将拥有金融公司数据的使用权和分享权。

关于金融科技的 三个观点

■ 杨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



杨涛

第一个观点，我个人认为金融科技的最终使命不仅仅是金融自身。说到技术给金融带来的变革，首先是为了提升金融的效率，更好地进行风险控制。在下一阶段，可能是为了弥补原有金融服务当中的短板，实现普惠水平的提升。而金融科技的最终目的我觉得还是要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增长。

为什么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呢？从历史上的重大变革都可以看出来，历次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背后或多或少都有金融资本的力量。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寻找新动力的问题。所以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核心就是增加技术在未来经济新动能当中的核心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科技带动技术进步是有可能性的，未来赋予了金融科技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观点，当前我们需要对于金融科技这一概念的边界、理论范畴有更清晰的认识。从互联网金融到历次新金融变革当中，热热闹闹到最后经常会发现我们在基础的概念、边界方面没有形成共识，以至于后来盖的大厦的地基就不牢固。要更好地分析金融科技这一概念，主要有两个视角，一个是谁来提供金融科技的活动的，另一个是提供什么样的金融科技。

就后一个视角来说，大家慢慢都接受了，就是把技术给金融产品和业务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分为四类，投资管理类跟市场设施类等等。前三类都是典型的金融业务活动，最后一类是具有技术属性的。我们可以分析技术给这些金融产品和业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是非常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当前痛点问题，有一些是为面向未来的计划做准备的。比如说区块链，我观察了国内很多区块链的企业和机构，到目前为止 80% 的合作都不是不可替代的创新。也就是说，对原有的系统是否具有绝对的替代性还不确定，更多的是为未来做转型准备的。

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谁来提供金融科技。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监管的角度来讲，大多都要确定一个业态的边界。我个人理解，起码有四个方面的边界。第一类，主流的金融机构大规模地利用金融科技进行创

把技术给金融产品和业务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分为四类，投资管理类跟市场设施类等等。前三类都是典型的金融业务活动，最后一类是具有技术属性的。我们可以分析技术给这些金融产品和业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是非常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当前痛点问题，有一些是面向未来的计划做准备的。

新，理论上也是金融科技的重要主体，全球来看都是这样。比如说银行，我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和数据是，大约在 2014 年中国推出手机直销银行 APP 的只有 22 家，到 2018 年推出手机直销银行 APP 的达到了 144 家。第二类，就是从事新技术的企业，它服务的客户主要是金融机构，这些新技术肯定是着眼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并不仅仅是早期给金融机构提供一点 IT 支持。



第三类，可能就是类似于 BAT 这样大的互联网企业，有一些大的平台经济模式，可提供金融的技术支持，也做持牌金融类业务。第四类，就是互联网的类金融组织，如果它风险可控、合规又能有效地利用新技术改良其业务流程，甚至做技术输出，理论上也是业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理解的金融科技起码可以从以上两个视角来进行归纳。

最后一个观点，就是当前讨论金融科技的时候，确实离不开金融科技与风险管理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讨论这个关系的时候，涉及到金融科技相关的一些活动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这是需要有更精准的理解和判断的。我觉得起码要分清楚哪些是系统性风险，哪些是非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要回答，这些技术涌入到主流金融体系并带来一些新模式的时候，会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当然，我们做了相关的研究，整体上认为这些技术在系统性风险上没有达到所谓的冲击程度。所以面对包括 P2P 等新现象的时候，要一分为二来看，不要过于夸大它在系统性风险中的影响。

另外就是局部的非系统性风险。一方面是传统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中国特色的风险问题，比如非法集资等，这就不仅仅是金融监管要做的事了。如何把新技术应用到风险管理当中？理论上讲，要利用在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监管当中，其实难

度是挺大的。过去各国的监管部门都用复杂网络技术等新技术，试图做一些突破性工作。更重要的，监管科技还是在非系统性风险层面来解决原有的监管难题。比如说从早期的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挪用，到后来支付备付金监管，到 P2P 的资金监管，核心难题就是缺乏现场监管能力。我们能否利用新技术解决这种监管的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这才是重要的着力点。

关于征信领域改革发展的三点思考

■ 唐磊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处长、百行征信有限公司顾问



唐磊

目前，征信领域应该是金融科技应用中最基础的一个领域，同时也是金融科技应用最前沿的一个领域。我从个人征信领域的改革发展做分享。

第一个观点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个人征信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整个金融领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服务人群的扩大，线上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风控能力要求的提高。2017 年，中国的线上信贷规模已经超过了 10 万亿元。这种变革不仅发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同时也发生在传统的金融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金融机构现在对于数据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对信贷数据的重视，以及资金投入的不断提高。我们发现征信数据信息掌握的数量、准确度、及时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和服务的半径及其金融服务下沉的力度。并构成了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背景下，它对于征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金融机构希望进一步扩大征信服务的覆盖人群。目前国家金融信用信息技术数据库的覆盖人群不到 5 亿人，也就是说中国还有 9 亿人大概是属于征信白户。这些尚未覆盖到的人群主要是农民、学生和老人，这也是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但是他们因为缺少征信记录，难

以有效地获取金融服务，所以把征信服务覆盖到这些人群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需要进一步扩大征信服务的覆盖机构。目前中国传统的征信服务主要覆盖机构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但是传统金融机构之外还有大量的机构从事类金融业务，或者叫准金融活动，包括小贷公司、P2P 等等，这些机构也非常需要征信服务去为他们提供服务。

第三，需要提升征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现在的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金融机构对征信产品和数据的广度、深度、维度，对征信服务的速度、准确度和体验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现在大家都特别需要信息推送服务、联合建模服务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的征信体系要拥有强大的包容性、扩展性和可定制性。

第二个观点，目前中国“政府+市场”的征信体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征信体系是以政府为主的征信体系，主要是由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征信服务，而未来要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2018 年 5 月 23 日，百行征信在深圳正式揭牌成立，百行征信是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指导、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牵头组建的全国第一家 and 唯一一家拥有个人征信牌照的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其定位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和方式，为推动互联网和消费金融领域的信用信息共享合作，提供多元化、实时性的征信产品和服务。百行征信与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定位是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目前百行征信已经与三百多家金融机构签订了协议，正在积极推进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电商、支付机构等等的合作。力争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全面、有效和安全的征信服务。2018 年年底之前，百行征信将面向社会推出个人信用报告、身份信息验证、特别观众名单等产品，争取解决目前市场上的多头借贷、多头骗贷等问题。

第三个观点，金融科技和征信行业的发展需要高度重视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

2018 年数据和隐私保护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第一件大事，就是 2018 年 5 月 25 日，全球保护力度最强的数据保护条例 GDPR 正式生效，



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将更加透明和更具实操性。第二件大事，就是 Facebook 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数据泄露事件，这个事件甚至影响到美国总统选举的走向。当前对中国来说，由于市场对于数据的需求特别巨大，而目前征信有效服务供给不足，所以征信市场出现了一些乱象，一方面是少数不法分子和机构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窃取征信信息，提供给一些信贷机构。其中一些征信信息甚至被用于非法目的，比如诈骗，这对信息安全造成了很大挑战。另一方面，部分商业机构滥用权限，过度采集个人信息，对个人隐私造成了严重的侵犯。

我们始终认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是整个征信行业和数据行业的生命线，关系到征信行业、金融科技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信息安全要做到“疏堵结合”。一方面我们要开证明，这个证明就是要扩大征信服务的供给，要让有需求的机构能够合法地去使用征信服务，压缩数据。另一方面我们要堵泄露，要加强机构使用信息的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管理，同时我们还要对泄露征信信息和个人隐私信息的机构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惩处，这样才能够行稳致远，防患于未然。

IFF 峰会 (4)

- | | |
|--|-----|
| 碳定价机制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市场工具 | 102 |
|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IFF 副主席、法国前财长、欧洲 50 集团主席 | |
| 技术变革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 104 |
| 叶燕斐,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 | |
| 中国绿色金融的进展与展望 | 106 |
| 周诚君,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 |
| 中国气候投融资的发展和展望 | 108 |
| 丁 辉, 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综合处处长 | |
| 创建中国—东南亚绿色产业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的意义 | 110 |
| 王 毅, IFF 学术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 |
| 中国与东盟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111 |
| 胡卫平,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 | |
| 广州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的思考 | 112 |
| 邱亿通, 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 |
| 农业银行关于绿色金融的实践与思考 | 114 |
| 王兆阳, 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业务创新部副总经理 | |

碳定价机制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市场工具

■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 IFF 副主席、法国前财长、欧洲 50 集团主席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气候变化及其有效应对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也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气候变化给全世界的社会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知道中国也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在“十三五”规划以及十九大相关文件中都有具体体现。

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中重要的一部分，是造成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世界和中国都在积极进行能源方面的变革，努力减少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使用，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此外，我们在积极进行能源转型，努力降低能耗过高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尽量确保不因能源转型替代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总之，无论是二氧化碳减排还是能源变革，亦或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作出巨大的努力。

碳定价可能是目前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促进减排、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措施。所以建立碳交易体系、推行碳定价机制、实施碳定价不仅在能源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应得到有效实施。

我们在进行能源转型，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时，也不能忽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迫切和巨大需求。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比较推崇的做法是，通过阻止公共开支进入能源密集型产业，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和依赖，进而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比如德国给家庭发放补贴，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但是这个补贴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其实给全球带来的福利也是有限的，所以最好的做法还是要采用市场的机制。

相对来说目前只有制定碳交易市场能够有效确保，不管能源的消耗发生在哪里，污染发生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个公平的市场当中有效地实现减排的目标，并且能够实现碳额度的公平交易。

欧盟碳市场启动于 2005 年 1 月，是全球建立最早的碳市场，在市场框架、法律法规以及交易和监管等方面

碳定价可能是目前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促进减排、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措施。所以建立碳交易体系、推行碳定价机制、实施碳定价不仅在能源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应得到有效实施。

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发展经验。中国现在也已有不少碳市场的试点区域。英国采用了“地板碳价”机制，也就是设定最低碳价，一旦碳价低于设定的最低价，英国政府就通过税收弥补差额。我们看一下欧盟碳定价情况，1990

年的时候，碳的价格大概是 30 欧元每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下子跌到了 3 欧元每吨。在 2013 年，碳排放价格又上升到 20 欧元每吨，2018 年又降到了大概 18 欧元每吨。我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可预测性的碳价格提升才是最重要的。这对于生产商和消费者而言非常关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从高碳强度的生产降到低碳生产。



常识告诉我们，更高的碳定价才会降低碳排放，这与经济理论是相符的。唯有减少碳排放，才能够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而碳定价是有效减少碳排放的重要市场工具。更高的可预测性碳价格，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而且可以在中短期内提高每个国家的竞争力。有效使用碳定价工具，还可以提高碳排放的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

碳定价是我们应对碳排放的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也是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能够让我们走上减排的最佳路径，而且可以减少减排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当初为了鼓励欧盟采取碳定价机制，我们欧盟一些政要联合发起了倡议。中国目前也已在考虑建立碳定价机制，并且已经实施了相关试点工作。今天能够在国际金融论坛 (IFF) 年会上讨论碳定价这个议题，我很高兴。我希望能看到中国有更多论坛讨论碳定价相关议题，推进碳定价机制的普及和实施。相信欧洲和中国愿意共同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重大挑战。

技术变革 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 叶燕斐 /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



叶燕斐

技术变革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金融资产的配置应该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全球化新趋势。

现在能源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从能源的生产、运输到供给、使用都在发生变化。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过去 20 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尤其是近 10 年下降得特别快。其中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 93%；风力、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也大幅度下降。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其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据统计，目前印度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已经达到 10%；中国 2017 年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是 13.8%，2020 年将达到 15%。预计全球 2050 年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可达 40%。

技术变革也给交通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不再赘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2017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达到 70 多万辆，在燃油车销售同比下降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销售却在高速增长。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2018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有可能达到 120 万辆，占整个汽车销量的 40% 左右。

物联网领域的技术变革给工作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比如说将来可以居家办公，这点在中国不太明显，但是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很多人开始在网上办公，每周去办公室一两天就可以了。这样大家可以居住得更分散一些，交通成本、居住成本都会下降。

技术变革带来的变化，对金融资产的配置是非常关键的。中国走过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是传统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随着信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走的将是新型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具有比中国更好的后发优势。能源转型以及互联网、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极大影响能源、通讯、物流、基建等领域，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消费方式发生巨变。比如煤电行业将来可能会快速衰退，现在中国最新的发电机组正常情况下要运转二三十年才能实现收益平衡。如果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那么煤电资产将面临很大风险。也就是说如果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一带一路”的煤电厂很可能还没能收回投资成本，就要被迫报废。如果这样，上游的煤炭开采、铁路运输，下游的煤电汽轮机组、发电机组以及相应的加工技术和设备等资产都可能面临风险。因此，金融资产的配置一定要考虑技术、能源变革的因素，特别是中国金融机构的中长期贷款比较多，更要注意这一点。在长期资产较多的时候，可以开展敏感性因素在不同情景下的压力测试，以确保战略资产配置的安全。监管部门也要考虑金融资产的风险，对可再生能源等可持续性比较好的资产，降低其风险权重；对高碳行业资产，要提高其拨备、增加其风险权重。

科技变革与政策的支持紧密相关。比如 20 多年前光伏领域的引领者是欧洲，欧盟宣布针对光伏的关键零部件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 2012 年出台了大幅度补贴政策，有力推动了光伏制造业的发展并大幅度降低了成本。

从全球的建筑领域来看，缺乏一些可持续、强制性的引导，政府的补贴和激励措施没到位；市场化的



措施，比如碳定价机制也没有建立。欧洲有很多老式建筑，政府没有好的引导性措施来提高建筑的能源效率。中国在这方面也不够重视，现在材料、供热等技术已经有了，但是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以及行政、公共政策上的鼓励。如果将来这方面的技术进一步发展，那些高能耗的建筑，比如一些办公写字楼的商业回报就会非常低，这也是银行在进行资产配置时需要高度关注的。

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发展将大幅提高物流效率。比如今年“双十一”物流集中配送的时间比去年下降了 60%，就是因为通过 AI 分析提前备货减少了物流时间。人工智能技术将对物流设施和网点的布局产生巨大影响。所以金融资产在物流领域的配置也应充分考虑 AI 的因素。

总之，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金融机构，在考虑金融资产长期配置时，一定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看清技术变革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更好地配置资产，如果能让资产配置引领技术变革趋势，那我们做的贡献就更大了。

中国绿色金融 的进展与展望

■ 周诚君 /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周诚君

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研究局负责牵头绿色金融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银保监会以及其他部委指导，共同统筹绿色金融相关工作。全世界第一部由中央银行组织撰写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在广州正式发布，报告里面涉及到了绿色金融的方方面面。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其他部委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改革中的考虑，理解政府的立场以及推进绿色金融工作的逻辑和思路。

总的来说，绿色金融之所以有别于其他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色金融有比较典型的外部性。绿色金融在给一些产业项目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支持的同时，更关键的是它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过去传统框架下，这些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很难被量化的，很难被内化为金融机构的财务收益，甚至反过来是财务成本，体现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里。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因为绿色金融或绿色金融服务，有非常典型的外部性，所以绿色金融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在提供公共产品的

时候，它的消费者或者使用者可能会产生搭便车的倾向，这将影响公共产品，比如绿色金融服务以及相关工具的供给。所以中央银行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想办法把绿色金融产生的外部效应具体说就是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内部化。

经济学的原理还告诉我们，把公共产品正的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基本方法就是补贴或者税收。我们对于产生正外部性的绿色金融服务、绿色金融产品，通过各种方式对它进行补贴；对于产生负外部性的产品，我们对它征税，甚至对它罚款。制度经济学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应对公共产品比较好的途径是有效地界定产权。如果我们能够对产生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进行准确的计量，同时界定产权，然后让它可以进行市场交易，得到均衡的价格，通过这种价格机制实现将外部性转化为企业的财务收益或者财务成本，体现到它的损益表或者资产负债表当中去，这是另外一种思路。

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更好、更准确地界定产权提供了非常好的手段，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有能力去界定、去明确计量这些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所有权得到准确界定以后，对它进行交易定价，这样有助于解决公共产品被搭便车的问题。

目前，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央银行不仅想办法把外部性进行内部化，同时还在全国设立 5 个绿色金融的改革试验区。在试验区内，我们会更加积极地在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监督管理方面，进行一些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工具创新和服务创新，帮助商业银行把外部效应内部化。通过中央银行、监管部门、财税部门特殊具体的政策支持，让金融机构降低绿色金融的成本，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或者说进一步降低它的不确定性，提高绿色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回报率。

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央银行在推进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中不靠行政手段，不靠政府干预，更多的是依赖于市场化的机制。也就是说不通过监管或者宏观



管理等手段去强迫银行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想办法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帮助银行，降低他们的成本，提高他们的回报率，最终实现商业银行有持续加大绿色金融投入的内生动力。就是要尊重绿色金融的市场化特征，实现绿色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

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对于商业银行的绿色资产，中央银行在再贷款再贴现的时候，对它进行优先评价，在进行评级的时候对这部分绿色资产进行优先考虑。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也在考虑，是不是可以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绿色资产包括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等等。

中央银行在推动绿色金融工作方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尽快实现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目前绿色金融最大的问题是标准不清晰、不统一。实际上标准问题就产生于要对外部性进行准确的界定。我们要对外部性进行计量，要把它内部化，而且要对其进行奖惩。既然要界定，要内部化，要奖惩，那就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旦明确了标准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在推进标准工作的时候就有了明确的思路。要搞清楚哪些有利于市场的公平，哪些有利于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哪些是当前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服务时所必须的、急迫的。最近人民银行会同监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成立了一个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对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进行梳理，试图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特色又跟国际接轨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中央银行在推动绿色金融过程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国际化。一方面我们在激励标准、监督管理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上尽可能对标国际，跟国际接轨；另外一方面，中央银行会同其他监管部门和政府部门，一起在绿色金融领域加大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沟通交流。

在金融市场，绿色金融在开放度、国际化程度上做得相当不错。目前中国的绿色债券当中有 20% 是由境外机构发行，在国际绿色金融的合作领域，比如 G20 场合，比如中央银行的绿色金融网络，再比如绿色金融的标准制定领域，应该说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社会的同行一道，正在发挥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推动作用。中国绿色金融在积极改革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瞄准国际标准，争取做国际绿色金融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中国气候投融资 的发展和展望

■ 丁辉 / 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综合处处长



丁辉

根据初步测算, 2018 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6.8% 左右, 单位 GDP 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比下降 4.3% 左右,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基本上实现了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多赢。2018 年下半年, 预计国家的经济仍然能够保持稳中有进的主基调, 绿色低碳领域新的增长点 and 新能源的加快培育也持续影响和引领中国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产业结构低碳化的进程有望持续深入。

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 中国面临着气候资金的严峻挑战。能不能有效利用财税、金融、投资等经济手段来不断完善资源配置的正向激励? 在新型能不能投融资方面, 能不能创新开展气候投融资工作, 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低碳领域, 大力抑制高排放的投资? 应该说指导地方开展气候投融资的实践, 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气候投融资的发展起步还比较晚, 应对气候变化庞大的资金需求与气候投融资之间发展不充分的矛盾也十分突出。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气候投融资的稳步发展, 我个人认为有六个方面的工作需大力开展。

第一个方面, 推进投融资机制改革与国家中长期低碳发展目标的更好衔接。我们国家已经提出了 2020 年、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国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投融资政策的支持, 气候投融资工作要与国家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紧密结合。以实现国家中长期低碳发展目标为导向, 充分考虑国家低碳转型和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要求, 探索与之配套的国家投融资体制机制, 充分发挥战略规划、产业政策、行业标准等一系列政策性的条件对于投融资活动的引导作用, 推动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 引导资金从高排放的行业逐步退出, 更多投向气候友好型的企业和绿色低碳产业, 使之形成叠加的效应, 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

第二个方面, 推动气候投融资的标准化建设。气候投融资工作是从 2015 年开始正式推进的, 我们看到气候投融资在属性的认定、在产品界定、在业务管理规范、在信息披露等方面, 亟待进一步的统一和规范。气候投融资标准化建设过程当中, 要进一步强化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 推动形成跨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 统筹做好气候投融资的政策出台、修订、实施和推广的工作。气候投融资的标准应该突出通用性和统一性, 为不同的金融产品提供普遍参考和依据,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气候投融资的适用范围和支持重点。

第三个方面, 推动信息披露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目前已经有部分的国内企业主动披露了生产经营和投融资过程中的气候风险。但在气候信息披露质量和总体方面仍然还是偏低的, 下一步我们会鼓励更多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率先向公众披露气候相关的信息, 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展气候投融资活动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要开展气候投融资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对金融机构的气候友好型表现进行科学的评价, 进一步强化国内金融机构对于气候投融资工作的认知和综合的评定。

第四方面, 推动地方开展气候投融资的实践。国务院“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工作方案, 明确提出要创新区域低碳发展试点示范。以投资政策引



导强化金融支持为重点, 推动开展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工作。在 2017 年我们充分做好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地方气候部门完成机构改革以后, 要进一步推进部分地方参与试点的各项前期准备, 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创新组织形式、融资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 营造有利于气候投融资的地方政策环境, 持续推动地方投融资结构的调整,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和经验做法。

第五个方面, 适度有序地推进碳金融的工作。碳金融的发展前提是碳市场的可靠运行, 全国碳市场已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启动。今后全国碳市场将逐步扩大参与范围和交易主体, 增加交易的品种, 提升市场的活跃度, 但同时也要防止过度的投机和过度的金融化,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充分发挥碳市场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的作用。我们支持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上, 开展适度有序的碳金融创新, 但需要强调的是, 全国碳市场本质上也是一个政策性的市场, 碳金融的发展也需要服务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个主要的政策目标。

第六个方面, 推动开展能力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我们下一步会推动国家气候投融资研究机构的建立, 持续开展气候投融资基础性的研究, 进一步提升气候投融资的决策水平, 也会推动筹建气候投融资的专家

库, 培育和培养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加强智库的建设。同时组织开展气候投融资专题培训, 切实提升地方气候投融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持续加强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国际对话和交流, 借鉴国际气候投融资的实践经验, 进一步扩大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合作规模, 不断创新合作模式。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结构改革的决定, 全国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投融资工作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要求我们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作为, 要以新的面貌、新的气象推动气候投融资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创建中国—东南亚绿色产业投融资合作 伙伴关系的意义

■ 王毅 / IFF 学术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王毅

我们为什么要签约中国—东南亚绿色产业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将来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第一，签约中国—东南亚绿色产业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是因为中国跟东南亚关系越来越重要。所谓新全球化，一方面是中国迅速崛起并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另外一方面是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引发全球经济重组，或者叫贸易再平衡、资源重新配置。在这一新形势下，东南亚地区对于中国具有“三重安全”叠加的意义，即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从政治上讲，中国正在从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变，而亚洲是中国的根基。东南亚有多个受儒教影响的国家，并且有各自的文化，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形势非常重要。从经济上来讲，毫无疑问，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一带一路”，都绕不过东南亚地区。从生态上来讲，国际河流、生物多样性、非法贸易、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说明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要。

第二，现在绿色金融领域正在成为国际投资热点。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影响力投资，对绿色金融的投

资都在不断增加，ESG 即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另外，一般性捐款、南南合作、双边发展援助，以及多边银行、私营企业等如何落地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保障社会安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处理环境外部性和气候外部性的问题。东南亚有它的优势，也有很多劣势。东南亚的不同地区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区的环境资产收益率、损益率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金融资产的标准化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而且很多绿色金融项目的利润低、负债高，且具有长周期性，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绿色金融项目就很难推广。所以这个时候不同资金相互配合发挥作用非常重要，比如利用捐款进行担保，同时吸引其他资金介入，这就需要建立不同资金相互撬动、发挥作用的平台。

第三，需要建立一个平台或者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机构把资金管理好，否则将来会有很多风险。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发展特点，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把中国的经验跟这些国家分享，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些国家面临的新环境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所遇到的场景。通过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帮助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的承诺，这是中国考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目的。通过治理机构的改善，使资金能够更好地相互配套，发挥更好的协同作用。

理论上可以这么讲，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很大挑战。所以未来几年，中国的资金在东南亚地区汇集的时候，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让它们既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也能够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中国与东盟合作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胡卫平 /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



胡卫平

作为国家发改委指导下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一直从事与中国产业境外投资和发展相关的服务工作。协会积极贯彻落实走出去的战略，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努力为中国企业在境外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协会与国家开发银行在 2009 年 11 月共同发起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我们称之为“外洽会”。外洽会每年举办一次，搭建了一个对外投资合作的专业平台，为各国引进中国的资本开启了一个重要门户。2018 年是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成立 15 周年，也恰逢中国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 15 周年。15 年来中国与东盟之间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东盟连续 7 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向直接投资累计 2 千亿美元，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合作中最为成功以及最具活力的典范。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老挝万象发表了《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鼓励中国和东盟之间开展以商业原则为主导的产能合作，使中国—东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务实而深入。未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我

们也应该看到还有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境外项目一直存在着风险偏高而投资回报率不稳定的情况。鉴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和对项目所在国情况的不熟悉，境外投资项目往往面临着不易管控的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和汇率风险，同时，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我们很难找到具有较高商业价值和投资回报的项目。

其次，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日益涌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既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投资方面已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并已经成为境外项目投资决策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还是存在着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企业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希望金融机构能够通过金融创新和风险管控，有效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境外拓展。

为了有效应对上述挑战，更好地帮助和支持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非常荣幸地和国际金融论坛 (IFF)、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共同发起和建立了“中国—东南亚绿色产业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的建立将有助于汇集各方面力量，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和经营，推荐优质项目、对接投融资需求、防范环境风险。

同时，中国海外发展协会将积极地参与伙伴关系的建设和发展，发挥协会境外产业合作的优势和经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对接，建立起东南亚国家绿色项目库，为推动绿色的“一带一路”做出我们的贡献。

广州开展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实验的思考

■ 邱亿通 / 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邱亿通

利用这个机会把广州开展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的工作以及我们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做个汇报。

我主要汇报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广州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做法及特色。2017 年 6 月份，广州获批成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在人民银行的工作指导下，现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理念和氛围已经在日益形成，政策支持体系在不断完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初步建立，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探索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是着力建立绿色金融的标准规范和技术设施。发展绿色金融的目的是实现金融资源的绿色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绿色节能、环保的企业和项目。建立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的标准是个重要的前提，因此我们从试验区获批之日开始，就高度重视绿色标准体系的建设，探索建立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认证标准。

第二是完善机制，提高绿色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广州在开展绿色金融试点工作中，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

这个前提下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支持，鼓励探索商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方面是建立激励引导机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出台了绿色金融“1+4”政策。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也利用再贷款、再贴现的手段支持扩大绿色信贷的投放。另一方面是建立对非绿色项目发展的约束机制，就是激励跟约束机制并行。

第三是依托市场，激发绿色金融创新的内生动力。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匹配绿色项目的融资需求。我们积极探索，通过机构、制度、组织方式、市场模式、金融工具的创新，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各金融机构将支行升格为绿色分行，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绿色金融创新中心，发行绿色金融债务、绿色保险产品，企业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绿色中期票据，市里也在探索发行绿色债券市场来支持一些绿色公益性的市政项目，股权中心也设立了绿色环保板块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创新绿色金融的产品和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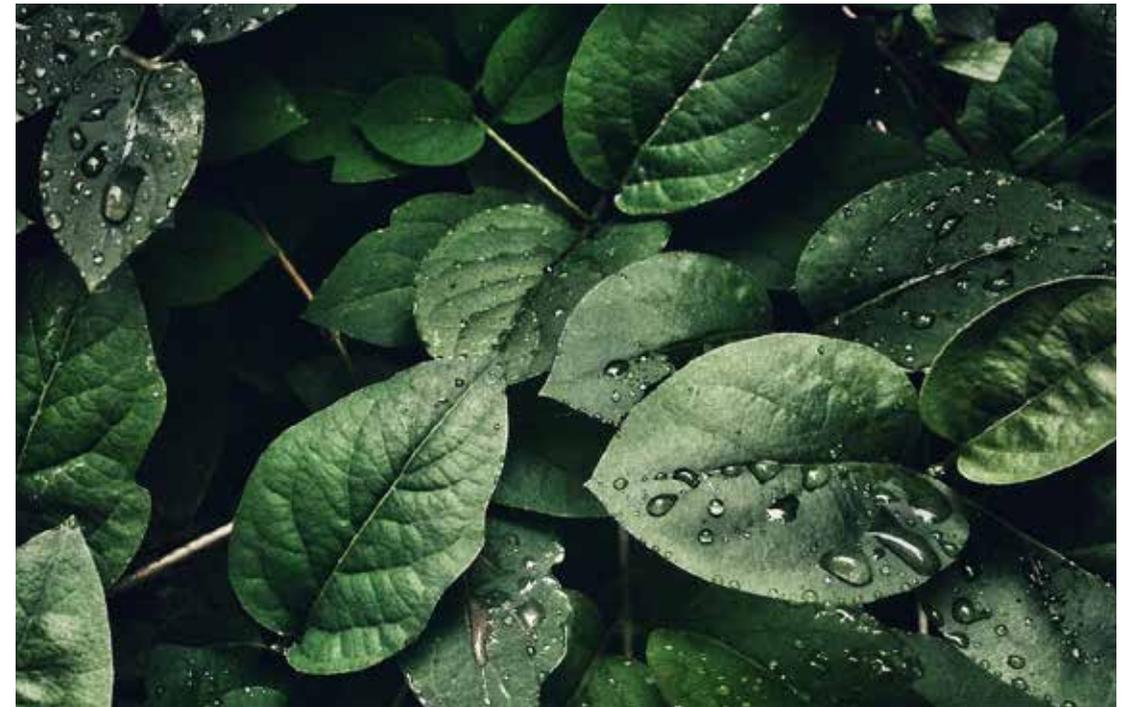
第四是防范风险，提高绿色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我们积极构建绿色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加强绿色信贷的跟踪监测评估，建立区域性的绿色金融同业治理机制，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我汇报的另一个方面是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第一是继续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深化改革创新。继续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完善激励机制，制定统计指标体系，定期发布项目信息，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

第二是探索统一大湾区内绿色标准。我们积极推动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探索形成大湾区绿色标准共识，并进一步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接国际的优势，促进内地标准跟港澳、跟国际的共识接轨。

第三是推进大湾区资金和市场互联互通。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澳门是对接葡语国家的重要平台，广州、深圳是境内重要的区域金融中



心，必须充分利用大湾区内两个市场优势，利用境内境外资金支持绿色发展，拓宽绿色项目的融资渠道。

第四是推动大湾区金融机构深化绿色金融合作，进一步完善绿色项目库和绿色金融融资对接系统项目，让项目信息向港澳地区的金融机构开放和共享。同时推动大湾区金融机构，通过银行贷款合作形式为大湾区绿色企业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服务。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设立创新型期货交易所，建立以生态产品、碳排放交易作为交易产品的新型期货交易所，利用期货交易这一金融工具来推动绿色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产融的深度融合。

第五是加强大湾区绿色金融宣传交流合作，增强大湾区绿色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将探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加强大湾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和行业自律。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工作刚刚起步，各方面工作都处于探索和创新之中，希望大家关注支持、参与试验区的工作，给予我们工作指导、建言献策，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

农业银行关于绿色金融 的实践与思考

■ 王兆阳 / 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业务创新部副总经理



王兆阳

简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农业银行绿色金融的服务实践；第二个是关于绿色金融工作下一步的考虑；第三个是推动绿色金融工作中的几个建议。

一、关于农业银行绿色金融的服务实践

这些年农业银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在创新信贷产品、绿色债券、服务模式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我们注意让发展绿色金融和服务“三农”相协调，着力打造具有农行特色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我们主要抓了五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是强化工作制度设计，构建绿色金融的体系。农业银行根据国家的要求，先后下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的发展规划》《绿色银行的建设方案》《贯彻落实七部委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三农”和县域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的行内文件和制度，明确全行绿色金融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提出了加快构建绿色银行、打造绿色金融品牌的目标。

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推动绿色信贷健康较快发展。绿色信贷是农行绿色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长

期以来农行将绿色信贷作为业务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充分发挥绿色指标在客户准入、结构调整和风险控制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绿色指标和信贷政策、国家行业政策的深度融合。一是把绿色指标纳入了信贷政策指引，明确绿色信贷发展的方向、重点领域和管理要求。二是制定信贷工作制度规范，从多个维度对绿色信贷的流程进行规定。三是构建指标体系，构建涵盖五大类指标的绿色信贷指标体系，作为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依据。再就是建立风险识别体系，建立客户环境风险多维度识别体系，坚决执行环境和社会风险的一票否决制。

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农行的绿色信贷规模到 2017 年末已经达到 7500 亿元。法人贷款平均增长了 8%，个人贷款平均增长 15%。

第三方面是突出农行特色，推动“三农”与绿色金融的协调发展。绿色金融的需求更多是在县域，这也是环境生态最薄弱的区域。因此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农行立足本身的优势，出台了服务“三农”和县域绿色发展行动方案。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七大行动之一，我们用绿色金融的发展行动，来推动服务“三农”与绿色金融的协调发展。在具体工作中，农行与农业部、工信部、水利部加强衔接，重点支持县域的绿色农业、节水灌溉、高标准农田，还有江河流域的生态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四方面的工作是创新绿色债券产品。例如债券发行方面，2015 年农行在英国伦敦交易所上市了绿色金融债券，用来投放清洁能源、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项目。在绿色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2016 年农行创新发行了国内首单交易所市场的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在发展绿色产业基金方面，农行通过制定绿色的“一带一路”海外合作基金方案，支持央企和有实力的企业开展绿色的“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设立千亿元的雄安绿色基金，完善对中美绿色基金旗下张家口绿色发展基金的方案设计，支持绿色奥运和张家口国家级



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建设。2017 年农行运用多种投行产品、债券产品，为绿色行业 and 客户提供融资将近 700 亿元。

第五方面工作是加强国际合作。一是农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了绿色金融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在绿色金融、碳金融、环境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合作；二是农行与法国的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成立了中法绿色产业基金，提高对国际绿色产业的支持；三是农行建立了中银绿色金融政策机制。

二、绿色金融工作下一步的几点考虑

在推进绿色金融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的预期目标与国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我们下一步准备在体制机制、产品创新、绿色“三农”和县域建设领域入手，继续强化政策的支持，推动绿色金融继续向前发展。

第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行内绿色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加强有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借鉴同业先进的经验做法，进一步细化重大绿色项目的标准和口径，推动绿色金融政策制度的落地。

第二方面是把“三农”和县域作为重点服务领域。农行一半的网点、一半的职工，都在县域，而且服务“三农”也是我们的固定动作。从各个方面来说，大中城

市各个方面比较强，他们比较容易得到融资，国家的环保督查重点在三四线城市以下，因此我们通过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把这个工作做好，按照已经制定的绿色实施行动方案，全面支持农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绿色资源开发、县域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还有县域工业绿色智能化发展。我们去调研发现县域工业和以前不太一样，它的生产、商业模式都在发生变化。河南一个县生产的垃圾清扫车，现在它也不卖了，租给政府提供服务。还有企业是生产水力搅拌机，也不卖，而是提供租赁服务，解决以前用人单位买了以后造成的很大浪费。民营企业，尤其是县域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要支持他们，进行绿色化的改造、智能化的改造，真是大有潜力，这是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加大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综合应用现代、投行、消费等金融工具，加快产品创新，丰富绿色金融的产品。第四个方面是全力做好国家要求的绿色金融实验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工作。农业银行一定按照国家要求，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

三、推进绿色金融工作的四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要加快绿色金融关键标准的建设。

现在绿色金融标准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绿色信贷标准相对滞后，目前适用的绿色信贷标准是 2012 年发布的，适用范围相对较窄，而且是对公客户，没有将个人客户纳入。虽然相关部门已出台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目录和绿色项目债券的指引，但都是各自确定

绿色项目的指引。第二是不同产品标准之间缺乏衔接，特别是现行的绿色债券标准在支持项目和分类方法上存在差异，部分可纳入绿色债券投资范围的项目没法纳入绿色信贷的范畴。因此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继续加大

绿色标准、金融标准制定的力度。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已经将绿色金融标准化建设工作列为了“十三五”时期的重点工程，未来这个标准让银行有个抓手。

现在国家涉农贷款 30 万亿，占全球信贷接近 20%，而农业增加值 GDP 占比每年都在降低，只有 8%~9%。因此建议能不能有区别于小“三农”、大“三农”，涉及绿色标准的建议按照国际标准，对碳排放降低及各方面发展切实有直接影响的，建立严格的小口径标准。凡是促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能够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包括产生间接效应的，都纳入大的绿色金融标准，这样可以调动金融机构扶持的积极性，也符合经济绿色增长要求。

第二个建议就是要为绿色金融服务提供一些政策支持。比如鼓励金融机构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不仅支持金融机构发展绿色信贷，还要支持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 IPO、绿色租赁等金融产品的发展。要尽快打造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体现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环境价格的约束机制，用市场化的手段推动生态环境成本的内部化。

同时也要创新发展，加强绿色金融配套机制的建设。各级政府要发挥作用，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加快探索推广绿色金融风险补偿基金、绿色担保基金，建立风险的缓释机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建立绿色金融的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信息和统一数据共享。

第三个建议是加强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在政策支持方面，建议国家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发展的正向激励。因为绿色产业投资数额大、周期长，农业银行和三农、小微打交道比较多，市场

主体资质不高，因此希望国家在货币、金融、财政各个方面能够给予一些正向激励，比如说人民银行能否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的评估体系，加大绿色信贷的考核权重，参照三农和小微的模式对绿色金融领域适当定向降准。

要尽快打造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体现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环境价格的约束机制，用市场化的手段推动生态环境成本的内部化。

第四个建议是能否适度放松绿色金融不良资产处理的要求，进一步降低绿色金融的风险成本。

广州南沙开发区（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推介会

- | | |
|--|-----|
| 加快建设内外兼修的新南沙 | 118 |
| 蔡朝林，广州市常委、南沙区委书记、
广州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 |
| 南沙的五张“名片” | 119 |
| 曾进泽，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
广州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 |
| 从世界及中国发展大趋势看广州南沙的发展机遇 | 121 |
| 甄 勇，澳门大学蔡继有书院院长 | |
| 尚乘助力南沙金融科技发展 | 122 |
| 蔡志坚，香港尚乘集团主席兼总裁 | |
| 南沙在粤港澳金融合作中的定位和措施 | 123 |
| 孙晓琴，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 |

加快建设 内外兼修的新南沙

■ 蔡朝林 / 广州市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广州南沙开发区 (自贸区南沙片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蔡朝林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永久会址落户南沙, 这是 IFF 对南沙的认可和关心。国际金融论坛是南沙承办的第三个高水平的论坛, 之前还有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和粤港澳大湾区港口与航运论坛。南沙这么做的目的是内外兼修, 就是“外塑形象, 内强素质”。

何为外塑形象? 因为南沙对北方的朋友们来说, 它的知名度不高。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论坛, 通过参加一系列的国内和国际重要的活动, 让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地知道南沙。知道南沙, 我们才有合作的机会。老实说, 对南沙我有充分的信心, 就怕你不来, 来了你就舍不得走。这是我对南沙的自信, 对我们团队的自信。所以我们首先要外塑形象, 让社会各界了解南沙。

其次是内强素质。光靠对外吹牛是不行的, 合作一定要实实在在。我们要利用好两个核心优势。第一就是区位优势, 南沙是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的几何中心。我们计划通过三到五年的时间打造半小时交通圈, 区位优势随着交通的便利,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 南沙的区域优势将转变为强大的发展动力。

第二个优势是政策优势, 南沙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沙是国家级的新区, 国家级的自贸区,

广东最大的自贸片区, 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 还是广州市唯一的城市副中心, 广东省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国家、省、市确实对南沙厚爱有加, 政策的优势非常明显, 老实说我想不出来全国还有哪个城市哪个新区有这么多的政策优势, 包括上海的浦东、天津的滨海新区等等都没有。

当然南沙还有其他优势, 比如说南沙还有土地承载发展的能力优势, 就是南沙的城市开发强度还很小, 空间还很大, 发展潜力也很大。南沙正在着力打造两个环境, 一个环境就是人居环境, 另外一个环境就是营商环境。我们一定要让南沙天蓝、水绿、城美, 南沙的空气质量、水质显然是最一流的。我们引进香港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等一批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目的是让企业和人才到南沙落户以后能够舒心地工作, 安心地生活。营商环境的优化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在政府的“放管服”改革, 在投资贸易的便利化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比如说上市制度改革, 企业注册登记。总而言之, 我们希望通过发挥优势, 优化两个环境来发展南沙。

在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 有位女士说天河 30 年前还是一片荒地, 经过 30 年建成了现在的样子。她问南沙需要多久能建成天河的样子? 我不说天河, 我说深圳, 改革开放 40 周年, 40 年前的深圳人、广东人、中国人, 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得出深圳今天的样子。南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 作为南沙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大力度去发展我们的南沙。所以我说一定不会 40 年, 30 年太久, 只争朝夕!

南沙的五张“名片”

■ 曾进泽 / 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 广州南沙开发区 (自贸区南沙片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曾进泽

广州的未来之城——南沙新区, 位于广州市最南端、珠江出海口、珠江三角洲,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 是广州市唯一的出海通道, 也是连接珠江口两岸城市群的重要枢纽。南沙总面积 803 平方公里, 距香港 38 海里、距澳门 41 海里。

南沙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1279 年, 南宋名相文天祥途经南沙, 写下千古名篇《过零丁洋》; 178 年前, 这里打响了鸦片战争的第一炮,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今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南沙正在高标准建设国家新区和自贸试验区, 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下面, 我用五张“名片”给大家介绍一下南沙。

第一张名片是“湾区中心”。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之地, 人口规模超 6800 万, 2017 年经济总量达 1.58 万亿美元, 未来将发展成为比肩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地处大湾区中心的南沙, 是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 被定位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方圆 100 公里范围内聚集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湾区全

部 11 座城市及五大国际机场, 随着广深港高铁开通, 以及虎门二桥、深中通道、地铁 18 号线等项目陆续建成, 未来三到五年内将形成以南沙为中心的大湾区“半小时交通圈”。

第二张名片是“开放门户”。南沙是南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 正在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南沙于 2012 年和 2014 年先后获批国家战略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 被国家确定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 开放创新发展优势突出, 营商环境优越。

比如, 率先将一般企业商事登记核准制改为确认制, 实施商事登记“境外营商通”, 推出企业专属网页, 实现了企业注册 1 天内领到营业执照, 企业开办便利度比肩全球效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又如, 推出了功能集成度最高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口岸通关效率全国领先。这源于南沙的全球进出口商品质量溯源体系得到市场高度认可, 形成“好货走南沙”的品牌效应, 推动跨境电商保税进口额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再如, 组建了南沙国际仲裁中心等专业仲裁机构, 率先实现企业自主选择香港、澳门和内地三大法系进行商事仲裁, 落户了粤港澳大湾区仲裁联盟, 国际化法律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市场活力不断激发。自贸区挂牌以来, 新设企业近 8 万家, 已落户 120 多个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

第三张名片是“枢纽大港”。南沙是世界第六大港口——广州港的主力港区, 航运网络通达全球。南沙港区自 2004 年开港以来发展十分迅速, 已建成南中国最具规模的集装箱、汽车和通用码头群, 航线通达全球 200 多个港口城市, 2018 年 1-10 月集装箱吞吐量 1290 万标箱, 同比增长 12%, 预计 2020 年集装箱吞吐量将突破 2000 万标箱。全球运力最大的中远海运散货全球总部落户南沙,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际贸易、航运交易、航运金融、海事服务体系, 正加快建设世界级枢纽港区, 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广阔区域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

第四张名片是“创新高地”。南沙是广深港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枢纽节点, 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化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南沙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海洋科技等特色创

新产业。人工智能方面，聚集了腾讯、亚信、云从科技、科大讯飞、小马智行等120多家业内顶尖企业投资项目，率先出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指导意见，成为人工智能产业新兴集聚地。先进制造方面，正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集聚了恒大纯电动汽车、广汽蔚来新能源汽车总部等一批重大项目。海尔空气生态华南中心、精雕高端数控机床华南总部等先进制造项目也即将开工建设。海洋科技方面，南沙已经落户中科院南海生态环境工程创新研究院，正在建设国家级可燃冰总部基地，重点推进可燃冰开采和产业化，加快建设国家深远海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形成了中科院系列、高校系列、国际合作系列等研发集群，建设运营华南技术转移中心，正打造国际化人才特区，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新高地。

第五张名片是“宜居城市”。南沙是联合国“全球最适宜居住金奖”城区，生态人居环境一流。南沙山、城、田、江、海交相辉映，2018年PM2.5平均仅26，空气质量十分优良，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城市生态底色。引进了香港科技大学、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中医院等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正加快建设大湾区教育医疗高地。南沙也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邮轮出入境旅客量全国第三，正在建设亚洲顶级的国际邮轮母港。这里将建成“AI+智慧城市”的优质样本，打造成绿色智慧宜居的广州城市副中心。

2018年10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高标准建设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特别指出“要强化现代金融支撑，引导金融活水更好浇灌实体经济”。自贸区南沙片区挂牌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国家和省、市金融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在金融界的积极参与下，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加快发展创新金融，逐渐形成了以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商业保理、航运金融等为特色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集聚方面，目前南沙已落户金融及类金融企业6013家，比自贸区挂牌前，也就是2014年增长了49倍。汇丰全球培训基地、越秀集团的国际金融中心、中交集团等企业金融总部项目纷纷落户南沙。

金融业务创新方面，已开展跨境人民币直贷、跨境资产转让、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等跨境金融创新业务。实现了全国首单境外船舶租赁资产境内美元交易业务，跨境租赁、离岸租赁等创新租赁业务已落地，成为华南最大的飞机船舶租赁集聚地。“珠江航运运价

指数”已纳入交通部的全国航运指数体系。成功发行华南地区首单绿色债券。金融平台建设方面，国际金融论坛（IFF）的永久会址落户南沙，正加快建设国内首个国际金融岛；落户规模超过1500亿元的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入驻广东省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省级政策性三大基金，集聚1400多家私募基金，加快建设国际风险投资中心，打造面向国际的风险投资机构集聚区。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商业银行、创新型期货交易所等重大平台落户。建立广东省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平台，已有超2万家金融（类金融）及涉众敏感企业纳入监控。金融政策支持方面，出台了覆盖面广、力度大的金融业专项扶持政策，对持牌法人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投资控股公司、金融要素交易平台、融资租赁等各类金融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并对港澳和外籍人才按照税负差额给予奖励。

本届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主题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探讨金融发展的未来之路。本次分论坛的主题是“携手共创湾区未来——南沙与港澳金融合作展望”，主要目的是为南沙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建设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开拓思路、提供借鉴。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机遇，高标准建设国家新区、自贸区，努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期盼有更多的朋友们到南沙投资兴业，共同打造南沙这颗璀璨的“湾区明珠”。

从世界及中国发展大趋势看广州南沙的发展机遇

■ 甄勇 / 澳门大学蔡继有书院院长



甄勇

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我想这可以作为思考未来南沙发展的一个思路。何为全局？我认为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世界发展的趋势；第二是在世界大趋势下中国的国家战略。在以上基础上再看南沙金融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

目前世界趋势比较突出的是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化实际上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崛起带来的世界格局包括世界贸易规则的改变，这对中国的金融和产业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还有一个世界趋势就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将改变金融产业的游戏规则，它是一个机遇，将产生革命性、颠覆性的竞争结果。在这两个大的世界趋势之下，再来看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万世”是指未来，那么未来要实现的愿景是怎样的？未来的愿景就是世界实现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实现“中国方案”新型全球化。在全球趋势与中国趋势两个大背景下看“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实际上是“中国方案”新型全球化的一个实验区。具体到南沙金融业的发展，有两个巨大机遇：

第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比如建立人民币在岸结算

中心、人民币产业基金等。

第二是期货市场的建立。期货市场是全球的定价中心。中国要持续发展，对世界资源能源以及大宗商品的需求就会不断增长。而保障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安全是中国发展的基础。很遗憾，现在大宗商品定价权不在中国。过去将近10年中国的期货交易总量位列世界第一，但没有什么影响力。主要原因就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不在中国手里。美国期货品种大概有400多种，中国大概只有60种，因为中国的期货市场不是国际化的。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参与的品种就几个而已，大多数不是开放的。大湾区可不可以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的一个国际化实验区，这与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我们希望未来的国际期货市场是以人民币定价，从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另外，中国现在非常缺乏期货方面的人才，是不是可以在南沙搞一个国际金融研究院或者是学院，专门培养期货方面的人才。中国还缺一个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我个人觉得这个交易所应该放在南沙区，为什么呢？因为南沙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港口可以做很好的期货交割仓库。

关于产业发展，我有三点建议：第一，借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趁势改造升级现在的一些产业。第二，支持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第三，培育未来的产业。

概括来讲，我个人希望南沙能够建设成为人工智能岛或者是智慧岛，或者是以期货交易为特征的，包括期货相关产业集群的国际金融岛。

尚乘助力南沙 金融科技发展

■ 蔡志坚 / 香港尚乘集团主席兼总裁



蔡志坚

尚乘集团是一家以香港为总部基地的综合性金融机构, 辐射亚洲, 聚焦湾区。尚乘集团创建的时候, 希望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建立金融机构, 利用数据更加便利地推动金融, 现在致力于在金融科技领域用人工智能能做一些连接。尚乘集团是香港金融科技论坛的独家战略伙伴, 也是全球新加坡金融科技周的合作伙伴。尚乘集团不只是希望深度拥抱金融科技变革, 也希望通过投资连接世界的发展, 让尚乘集团变得更具有竞争力。

尚乘集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保险、投资。

尚乘集团是亚洲最大的独立民营金融机构之一。现在活跃于全球范围的投行, 在粤港澳可能还没有。从整个全球投资银行的格局来看, 北美其实有一些非常大的独立投行不归属于任何金融集团, 也不属于大的财团, 是独立团队构建起来, 然后逐步做强做大的, 每一家的市值体量大约是 50 亿到 100 亿美金的规模。亚洲目前还没有过这样的投行。

香港近年来在极力推动整个湾区创建更多有活力的科技创新公司, 能够连接到海外的资本。我们要打

造的其实是区域中的基金流动、人才流动和市场联动。对于金融机构本身来说, 政策的便利、持牌合法许可, 以及能够在新的地区或者更广阔的地区从事金融服务, 当然是最关键的, 因为金融机构从事的是监管业务。南沙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香港联交所推出同股不同权后, 尚乘集团操刀两家同股不同权公司的上市, 一家是小米, 一家是美团点评, 都是到香港成功上市的案例。还有华兴, 聚焦于新经济 TMT 领域, 最近也成功在香港上市。对于尚乘集团来说, 现在以体量规模发展, 下一步在市场上还是会比较活跃的。除了聚焦于新经济以外, 过去三年, 在香港上市的区域银行几乎全部都由尚乘操刀。尚乘集团作为牵头行、作为独家操作顾问, 还参与了广州农商行、郑州银行等等的上市。

粤港澳地区里有很多优秀的企业, 尚乘集团致力于打通上市平台, 让粤港澳企业利用国际市场, 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能够融通更多的基金, 能够助力他们更好地发展国际化。尚乘集团作为投资银行, 代表这些企业在海外发行优先股、发行高级债, 融通市场、打通资金。努力让优质的企业不受地域的限制, 能够走到国际, 走得更远。

对于尚乘集团来讲, 南沙是我们的不二之选。在未来希望能够借助南沙地域的便利, 拓展更广阔的内地事业, 也能够配合南沙, 立足粤港澳, 助力内地更多的企业走到国际市场, 打通在同行端市场的连接, 打通中外的联动合作。

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推荐下, 尚乘集团跟香港理工大学签订了十年的合作。我们提供更多的资金, 提供更多的业界场景, 成立了香港第一所金融科技学校。未来希望金融科技学校不只是落户香港, 也能够落户大湾区, 落户南沙。下一步尚乘集团也会往这方面去推动, 先从整个底层的人才培育推动, 再打通南沙跟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连接。然后尚乘集团发挥投行本身的功能, 作为渠道连接南沙, 把更多优秀的科技创新企业带到香港资本市场。

南沙在粤港澳金融合作中的定位和措施

■ 孙晓琴 / 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孙晓琴

从金融合作的角度来看, 南沙实际上是站在粤港澳金融合作的黄金点上。下面从三个方面简单说明这个判断。

第一方面, 对于南沙的功能意义和定位, 我总结为以下几组关键词。第一组关键词是吸收和溢出。吸收, 就是吸收企业, 吸收资金, 吸收人才, 吸收概念, 吸收创意。溢出的是国家的战略导向、招商引资政策的意向, 以及和谐宜居宜业的意境。第二组关键词是窗口和前沿。南沙是广东对接港澳、走出去的前沿, 同时也是吸纳外部资源的一个窗口。作为前沿窗口, 南沙既有宣传者的使命又有引入者的使命。这是第二层的功能意义和定位。第三组关键词是通道和平台。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通道、资金通道、企业通道、文化通道, 实际上是重任在肩。南沙打造了很多的平台, 未来南沙一定会在企业人才培养, 机构之间交往的通道、交流的平台, 做出相应的安排。

第二个方面, 关于南沙与港澳金融合作的实践, 我归纳为“六容”。首先, 从时间节点上来讲, 要把握时间的节奏, 前期做好“扩容”, 也就是说要用试点的模式、负面清单的模式, 去聚集各种要素做到扩

容。在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基础上, 希望在准入、准出细则上能够压缩一些限制。这样才能够有利于资源的集聚, 这就是前期希望做到的扩容。其次, 在中期希望做好“兼容”, 这个兼容就是机构之间、企业之间、金融和产业之间的各种创新合作与协同融合。需要强调的是产和融的对接, 这非常重要。第三, 就是后期做好“包容”, 前期南沙出台了非常多的政策措施, 吸引、吸纳了非常多的机构和人才, 后续希望更包容。包容性的金融生态使得一些小众的、特色的、能够兼顾社会各层次的金融机构, 甚至辅助性机构也能够落户到南沙。这样可以使南沙整个生态更完善, 更齐备。

从具体举措的安排上, 我们建议三个“容”。第一, 政策要包容, 就是设计的政策要包容各种业态的金融机构, 或者说让金融机构能够尽早地在南沙落地和运转。第二, 所有举措要做实内容, 就是说无论是激励措施、“一企一策”, 还是一些差异化的政策设计, 要更具可操作性, 从企业的层面来说, 能更及时更快地兑现, 让企业和人才更直接更快地感受到激励。第三, 建议规划做实政容, 金融规划是全体系的, 所以顶层合作规划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建议政府、研究机构, 包括各类高校、相关企业, 甚至全球性、区域性的组织能够联合起来, 形成合力, 进行充分论证。希望这个规划的政容能够再扩大一些。

第三方面, 说说产融结合的问题。在湾区的实践当中可以看出, 不管是哪个湾区, 最后都落实到金融和产业的对接。比如纽约湾区, 是华尔街+医药+先进制造+汽车; 旧金山湾区是风投+科技; 东京湾区是银行+先进制造业+汽车制造。粤港澳大湾区同样看到了现实的业态, 就是金融资源+高端制造+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等, 所以产和融的结合才是真正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非常好的渠道。

而产和融的对接, 包括前面所说的吸收也好, 溢出也好, 它的载体就在于企业, 政府政策扶持的对象也在企业, 经济能够运行的最基本的单元也是企业,



所以服务企业很重要。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公司就是一个民营的投资平台，是省工商联发起设立的，有 48 个民营企业做我们的股东，他们出资，我们的注册资本金达到了 400 个亿。

从一开始成立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践行国家的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融结合、服务湾区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成立半年来，用产融结合的方式去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困境。我们不论是用参股、控股方式，用股 + 债方式，还是用直接的产业投资方式，或者先组成基金再安排基金来投资，用各种方式帮助我们的民营企业走出了困境。

同时，我们也希望拓展境内、境外的互联，让大湾区产融公司设海外分公司，能够走出去，能够服务更多的境内境外的企业，能够打通跨境的国际平台，为南沙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黄金边界上的闪亮明珠做贡献！



中朝经济合作对话会

- | | |
|----------------------------------|-----|
| 朝鲜改革开放可借鉴中国经验 | 126 |
| 祝 宪, 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 |
| 珲春立足自身优势, 推动中朝加深合作 | 127 |
| 彭树海,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 |
| “一带一路”和国家产业扶持政策 | 128 |
| 王 燕, IFF 学术委员、世界银行前高级研究员 | |
| 朝鲜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措施及中朝合作 | 130 |
| 李铁石, 朝鲜对外经济省经济开发指导局局长、朝鲜经济开发协会会长 | |
| 朝鲜经济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 | 132 |
| 金铁龙,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18 号室副室长 | |

朝鲜改革开放 可借鉴中国经验

■ 祝宪 / 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祝宪

很高兴有机会与朝鲜同仁一起讨论，我是新开发银行的副行长，在此之前长期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的财政部工作。所以我的经验可能更多是来自于一个国家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包括参加国际金融组织。我个人也是非常关注朝鲜的经济发展。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朝鲜政府如果决定推行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我认为朝鲜今后经济发展的潜力将是不可限量的，特别是朝鲜和中国作为邻邦，在经济上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朝鲜是一个资源和劳动力都非常丰富的国家，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我相信朝鲜与中国、东亚地区的合作将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当然，改革开放不可能一步到位，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可以看到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可以向朝鲜的同志介绍一下自身的一些经历和感受。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对外部的了解也比较少，对改革开放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其实

心里也不是太有数，所以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摸着石头过河”。今天朝鲜的改革开放有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可借鉴，不仅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而且有像越南这样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的经验。朝鲜可以在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本国国情进行改革开放，作出自己独立的决策。

同时我也想向朝鲜的同仁介绍一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如何加入国际多边金融组织的，特别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本人曾经亲身经历这一过程。我觉得金融领域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实是可以考虑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新开发银行是一个新成立的多边金融组织，是由 5 个金砖国家组成的，本身就是一个南南合作的典范，目前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国中并没有发达国家。

朝鲜可以把加入国际金融组织作为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过程需要朝鲜根据本国的国情做一些踏实具体的工作。这一金融领域的改革举措，将会给朝鲜改革开放带来国际上的支持，带来新资金的流入，另外也会带来新技术和新的管理经验。

相信如果朝鲜领导层和政府坚定决心进行改革开放，这将给朝鲜今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我也相信作为邻邦——中国不仅可以提供与朝鲜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机会，也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经验作为参考。

珲春立足自身优势， 推动中朝加深合作

■ 彭树海 /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彭树海

很高兴受邀参加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5 届全球年会和大家共同学习和交流，我先简要介绍一下珲春的情况。

第一是区位优势。珲春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之地（就是祖国鸡嘴最尖端的位置），与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和朝鲜罗先市相连，是一个边疆县市、民族县市和口岸城市。珲春市与朝鲜有 246 公里的边境线，与朝鲜隔图们江有 130.9 公里的边界线，有 4 个国家级口岸，其中对俄有两个，一个是陆路，一个是铁路，对朝有两个口岸。

珲春市总面积 5149 平方公里，居住着汉、朝、满、蒙等 11 个民族约 30 万人口，在区位、生态、资源、政策、人文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珲春市位于祖国边境，素有“一眼望三国”之称，是中国通向东北亚的窗口和欧亚大陆桥的起点之一，也是通过陆海联运到达日本海的关键连接点，将来也可能是通过陆海联运到达北美的连接点，珲春还有高速公路和高铁与祖国的腹地相连。

第二个是生态优势。珲春森林覆盖率达 86% 以上，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珲春还是候鸟的天堂，每年春秋两

季有几十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珲春是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零上 7 摄氏度，整个夏天平均气温 21.2 摄氏度，是一个避暑圣地。

第三个是独特的资源优势。珲春有亚洲最大的钨矿，年产能达 1200 万吨；珲春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5 倍；珲春还出产人参、灵芝、鹿茸等名贵中药材。珲春的生态环境优美，牛羊在山上吃着中草药、喝着矿泉水，变出来的就是“六味地黄丸”。

第四个是政策优势。珲春享受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以及少数民族等优惠政策。因为珲春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又拥有边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以及中国图们江国际合作示范区。吉林省还出台了支持珲春发展的 19 条意见，集全省之力推动珲春的发展，应该说珲春的政策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第五个优势是独特的人文优势。珲春市人口中有 36.5% 是朝鲜族，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珲春也是满族的发源地之一，有 9.7% 的人口是满族。因此珲春的人文特色非常明显，走在珲春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客人。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地域相邻、隔江相望，是好邻居，也是好朋友。中国的朝鲜族，特别是延边的朝鲜族与朝鲜人民文化相近、语言相通，民族交流非常活跃；中朝两国人民还有用鲜血凝固的友谊，所以中朝合作的基础坚实、前景广阔，必将能为双方国家人民带来财富。

进入新时期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向好。2018 年 9 月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以及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都给图们江下游，甚至整个东北亚的开发带来了发展良机，也为中朝进一步加深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因此我坚信中朝合作具有非常广阔、良好的前景。

“一带一路”和 国家产业扶持政策

■ 王燕 / IFF 学术委员、世界银行前高级研究员



王燕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 20 多年，退休后与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起在中国对外援助与合作领域做了一些研究课题，还合著了一本书——《超越发展援助》，是关于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方面研究的专著，其中关于中国经验的阐释，相信对于所有关心“一带一路”的人都会有一些启发。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结构转型就是从农业转型到制造业，再升级到高层服务业，这种结构性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是非常迅速的结构转型。1984 年，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50% 的出口产品都是原材料和农产品，包括石油、原煤等等。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结构上不断转型升级，现在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的占比已达 90%，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出口大国。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追赶式的发展，林毅夫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决定了其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决定了其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如果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就可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获得可观的利润，从而扩大投资，产生自己的竞争优势，

进而从比较优势上升到竞争优势。

中国有什么样的自然禀赋呢？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就是生产出来的资本），以及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或者说智能资本）。中国人力资本一直就非常丰富，但是知识、技能水平较低。从 2005 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从 40% 增长到 60%，说明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人力资本丰富，或者说知识、技能水平比较高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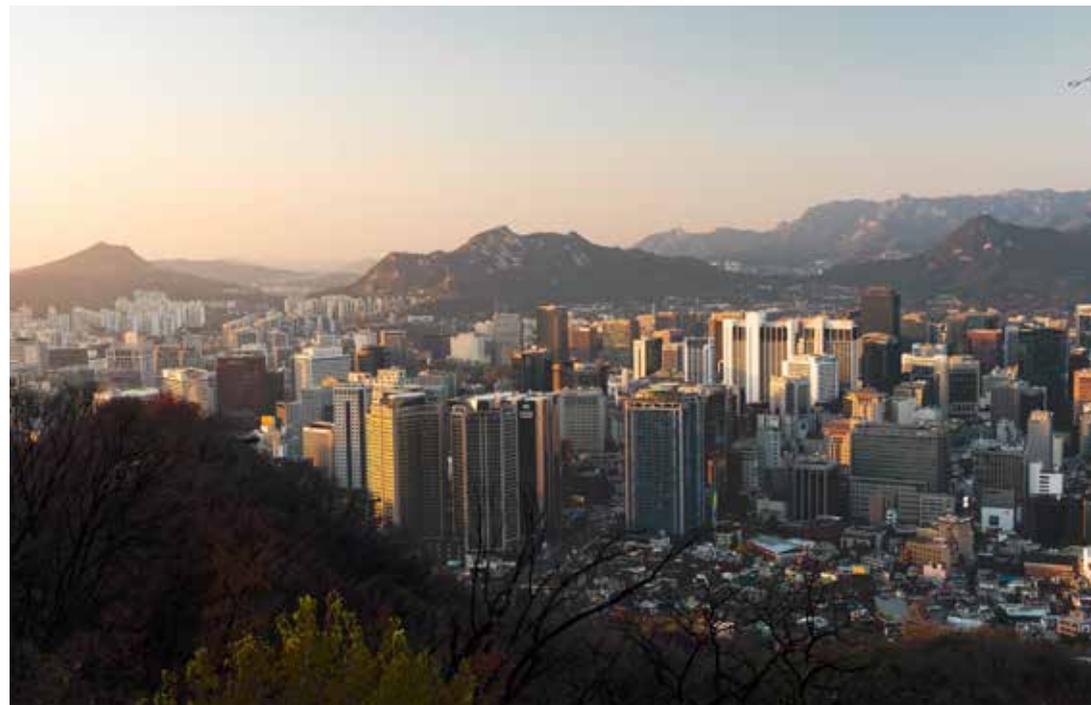
深圳特区 1980 年刚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贫穷的小渔村，人均 GDP 只有 88 美元，现在深圳的人均 GDP 达到了 27000 美元。从“北上广深”排序来看，原来深圳排在最后，现在深圳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第三大城市。深圳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国家领导层的正确决策。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到耗子就是好猫”。改革开放进行下去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创建了深圳经济特区。除了深圳经济特区之外，中国还发展了大量产业集群，集群可以促进互相学习、基础技术转让，像深圳有很多高技术产业，东莞有很多制鞋、制袜产业，河北白沟有很多制包产业，它们都形成了巨大产业集群，每一个集群都有成百上千个企业，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

二、“一带一路”有目标的产业政策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进行有目标的产业政策呢？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充足的预算可以投资，所以要选中一些重点产业由国家进行优惠政策扶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的就是有目标的产业政策，除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要建立不同类型的经济特区，像中巴经济走廊等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韩国类似。当时因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以在韩国的很多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搬往中国，比如纺织厂、制衣厂、制鞋厂等。现在中国面临着当初韩国同样的问题，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



很多在中国的企业正在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搬过去，所以目前中国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已经在逐步下降了。

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成立经济特区，希望吸引中国的企业去投资。比较成功的就是“一带一路”项目里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合办的工业园，有一家中国制鞋企业去投资，4 个月就建成了制鞋生产线，几百名工人到中国来培训，现在已经扩大到 3500 多个工人，生产的皮鞋大部分都出口到了欧洲和美国。麦肯锡分析，中国企业用这种对外投资的方式，已经创造了上百万的工作岗位。这类案例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的优越性。

三、为工业的发展筹资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储蓄和投资额，现在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储蓄和投资额。为工业筹资最主要的不是依赖官方的发展援助，而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 (FDI)，还需要有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长期贷款，包括多边发展银行、多边发展基金。比如中非基金、丝路基金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援助，而是一种投资，所以投资的概念要扩大。

中国 2018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增长到 1800 多亿美元，而 2018 年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 (FDI) 下降了 41%，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最大输出国。

原来美国是 FDI 全球第一，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一，英国排名第二，美国位列第三。

四、耐心资本——超长期资本

耐心资本也就是超长期资本，包括 10 ~ 20 年以上的产期资本，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结构转型和发展中国家。耐心资本是比较难得的，包括多边发展银行的资本也很难得。耐心资本与热钱、快钱等快进快出的资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吸引耐心资本，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多边发展银行的长期性投资，只有这些资本才能真正有助于经济发展。

朝鲜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措施及 中朝合作

■ 李铁石 / 朝鲜对外经济省经济开发指导局局长、朝鲜经济开发协会会长



李铁石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年会, 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朝鲜在经济开发区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以及中朝合作的相关内容。

一、中朝两国在经济开发区领域的合作

中朝两国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 就罗先、新义州经济开发区等地的经济开发签署了政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 双方政府在 2011 年、2012 年举办了三次政府间的会议, 深入探讨罗先、新义州经济开发区的共同开发事宜, 为共同开发、共同经营设立委员会, 签署了一系列具体协议, 并积极落实协议的相关内容。朝鲜两个经济开发区的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共同利益, 今后将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推动下去。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 2013 年 3 月份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出决定, 设立 1~2 个经济开发区, 然后根据当地的情况发展下去。2013 年 5 月 19 日, 朝鲜颁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开发区法》(简称《经济开发区法》), 随后又颁布了相关实施细则。到目前为止, 朝鲜已设立包括平壤在内的 20 多个经济开发区。

2018 年朝鲜半岛整体形势和平稳定, 所以很多海

外投资者对朝鲜表现出了较浓厚的投资意愿。为了保障经济开发区投资者的利益, 帮助他们快速推进经济开发区的项目, 尽可能快地得到投资回报, 朝鲜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适时修改、补充了《经济开发区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并加大了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我相信朝鲜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制定颁布更多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经济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在朝鲜经济开发区, 目前企业所得税降低到了 14%, 而在经济开发区以外的地区, 企业所得税是 25%。为了给投资者提供便利, 在土地开发使用方式、土地租赁期限、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建筑物的买卖等方面, 朝鲜都努力提供相较于周边其他国家更有利于投资者的优惠政策。

目前朝鲜经济开发区的土地优惠政策包括可以租赁土地并以独立经营或多种形式合作经营的方式开发, 租赁期限最长 50 年。投资开发的建筑物或者土地, 可以租赁给其他企业, 这些企业的独立性和利益受到朝鲜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经济开发区的管理机构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独立制定经济开发区内的政策, 也就是说经济开发区实施的是特殊的、有别于经济开发区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如果外国企业投资于朝鲜鼓励的产业领域, 在土地使用或者选址方面可以获得优先权, 还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免除土地使用费或者企业所得税。如果外国企业把获得的利润再次投资于朝鲜开发区内, 则可以获得 50% 企业所得税的退税, 还可以在旅游和酒店领域获得优先经营权。

在朝鲜经济开发区进行投资的外国企业的员工, 在出入境、居住、通信、进出口等方面, 也能够享受到相较于经济开发区以外地区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三、经济开发区的管理制度

我是朝鲜对外经济省经济开发指导局局长, 朝鲜对外经济省相当于中国的商务部, 是中央所属机构,



负责管理经济开发区业务, 推动经济开发区建设。朝鲜对外经济省下设经济开发指导局, 负责吸引投资、指导开发方向、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选定开发企业等比较宏观的工作。朝鲜的每一个经济开发区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 这些管理机构负责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入驻企业设立许可、提供服务等。

四、经济开发区的人才培养体制

经济开发区需要大量人才, 为此我们制定了人才培养体制, 不仅可以在朝鲜国内进行培训, 也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培训。我们积极学习外国经验, 尤其是中朝两国政府签署了经济开发区协定后, 每年有相当数量的人员被派遣到中国, 学习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经验。

对朝鲜来说, 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 以及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经验, 都非常具有学习借鉴价值。朝鲜还积极与其他国家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合作, 希望能学习到外国的先进经验。

今后, 朝鲜将继续积极开拓国际领域的合作, 让世界更了解朝鲜投资以及经济开发的政策措施。

朝鲜经济面临的 重要发展机遇

■ 金铁龙 /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18号室副室长



金铁龙

在朝鲜劳动党的带领下，朝鲜经济已经迈入了新时代。2016年5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总结了朝鲜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朝鲜在自主经济方面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业结构也得到大幅度改善，

也就是说现在朝鲜可以利用自己的原料生产商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体材料。

新世纪产业革命热潮之下，各种设备和工程实现了现代化。朝鲜自主开发了80马力的拖拉机、5吨载货量的汽车，以及CNC数

控机床、移动通信网络等等。互联网发展已经是全球性的热潮，朝鲜也在积极建设信息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在电信领域已取得大幅度发展。在农业领域，

朝鲜通过推动种子革命、整治土地、治理水利等措施实现了谷物生产量的大幅增加。

朝鲜劳动党第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经济五年（2016年-2020年）发展规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为推动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几个重要领域制定了目标性的发展指标，并制定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各经济部门也都制定了各自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利用太阳能或者潮汐能进行电力生产，建立主体的钢铁生产基地，利用铁矿石和钢铁生产产品。在化学领域要生产主体的肥料以及朝鲜人们生活所需的各种化工产品。在高新技术领域要紧跟全球的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尖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我们制定了综合生产体系，推动自动化，全面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努力提高工业商品的产量和质量。

朝鲜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建设民用住宅，改善人民生活。现在朝鲜的民用住宅都是国家进行投资、建设，免费分配给老百姓，所以朝鲜不存在没有房子可住的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

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化，所以民用住宅的规模以及住宅内部的装修装饰水平也需要加以提升。这些民用住宅项目付诸实践，将能极大提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

朝鲜经济开发区的一些经济建设新战略为新义州市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机会。

从2013年6月份开始，朝鲜基于外部局势的要求，提出了核武力建设和经济建设并进的路线；2018年4月份提出要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

我们要利用太阳能或者潮汐能进行电力生产，建立主体的钢铁生产基地，利用铁矿石和钢铁生产产品。在化学领域要生产主体的肥料以及朝鲜人们生活所需的各种化工产品。在高新技术领域要紧跟全球的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尖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我们制定了综合生产体系，推动自动化，全面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努力提高工业商品的产量和质量。



水平，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朝鲜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

目前朝鲜的很多原材料和成品仍需要进口，我们要努力实现国产化。这些原材料和成品的国产化，能增强朝鲜在各个经济领域的能力，建立自主的经济结构。过去朝鲜的投资重点是国防科技领域，今后要积极转向民生领域。在经济管理领域，我们要加强国家统一领导的能力，加强国家经济组织者的功能，实施适合朝鲜经济管理的办法，让企业能够在主体思想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

朝鲜在工业领域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责任管理制度，所以工厂或者企业要自主制定经营发展战略，主动推进自身的发展。现在国家提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经济环境发生了迅速转变，这将给朝鲜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金精不朽 融通天下



- 传播交流成果，探索学术前沿，扩展国际视野，发表权威观点，服务金融事业，满足读者需求。
- 以服务中国经济界、金融界，服务广大读者为使命，致力于 IFF 信息的全面、及时、准确传递，与社会共同分享 IFF 的研究成果。
- 为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搭建顺畅的信息平台，使对话交流中的重要思路、观念、观点得以传播，服务中国经济和金融业。

着眼宏观大局·关注金融动态·探寻内在规律

《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是反映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的高端学术刊物，面向广大经济界、金融界的读者，以传播中国金融国际合作交流成果，提高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宗旨。《国际金融论坛》会刊具有天然的国际信息渠道、丰富的信息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将国外金融信息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成为中国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国内、国外双重信息资源的优势，以全球化的视野解读本土的金融事业，站在中国的角度对话世界金融市场，为读者展示一个完整的金融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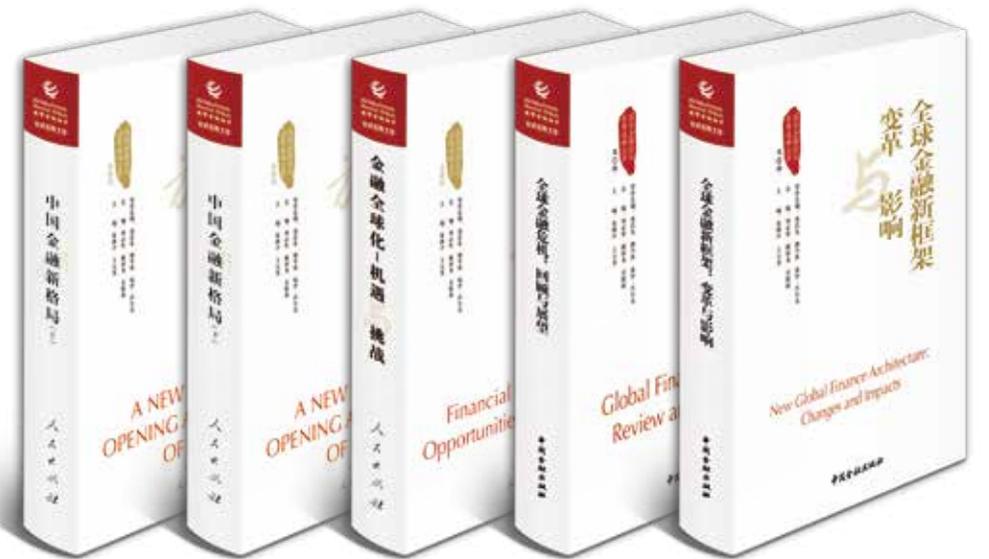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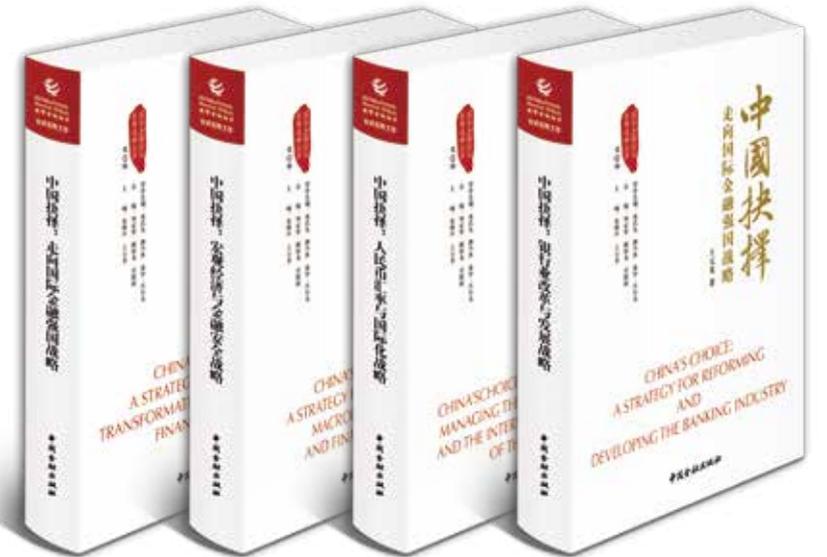
扫一扫加关注
微信：IFFweixin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战略文库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战略文库是集研究成果、演讲文集、金融领袖及国际金融论坛成员著作为一体的系列出版物，根据每年 IFF 全球年会和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IFF 全球战略文库坚持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对全球金融经济问题深入研究。



出版声明:

- * 本刊仅供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得有任何商业用途
-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而成，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复印件、复制品或收入检索数据库系统。

General Statement:

- * This publication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commercial use is prohibited.
-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materials.
- * Views in the article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original opinions from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dat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whatsoever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written consent from the editorial team. Violators may be subject to legal proceedings.



We are dedicated to broader and more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based in China with a global vision. We are devoted to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y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nd main financial cities worldwide.

我们致力于开展更广泛、更包容的全球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携手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架起中国金融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桥梁，建立全面、广泛的全球合作与对话。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Global Finance F20 (Finance 20)

北京·廣州·上海·香港·華盛頓